

杜润生简历

1913年7月生，山西省太谷县人。1929年考入太原国民师范，1932年加入抗日反帝同盟会和社会科学家联盟。1934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文史系。1935年在著名的“一二·九”运动中，任学联代表，参与和领导学生运动。1936年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宣传部长，下半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中，1947年随刘邓大军南下，主要从事农村工作，领导所在地区的土改。

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南区军政委员会土改委员会副主任。

1953年初，调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兼国务院农林办副主任。

1956年调中国科学院任秘书长，参与制定了影响深远的《科技12年发展规划》工作。

1961年主持起草了著名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的14条意见》，被誉为“科学宪法”。

“文革”期间，受冲击迫害，下放“五七干校”劳动。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调任国家农委副主任，为“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倡导和推广做了大量工作。1983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多次主持中央、国务院农村政策文件，特别是五个“1号

文件”，对推进农村经济的市场化改革，作出积极的贡献。

杜润生是中共第十二、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并曾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中国农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农业经济学会理事长，中国合作经济学会会长，中国国土经济学会理事长，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农业大学名誉教授。

主要代表著作《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中国农村的选择》、《中国农村制度变迁》、《杜润生文集》。

问：尊敬的杜老先生，能在您 90 华诞之际拜访您，感到非常荣幸。众所周知，您作为我国老一辈著名的经济工作者，对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国家建设，尤其是农村经济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据说您早在青少年时期就投身革命，并且是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能否先请回忆一下您早年的人生经历？

答：我 1913 年 7 月出生于山西省太谷县的一个中农家庭，祖父原来是经商的好手，但家业传到我父亲手上时，已日渐式微，几笔失败的生意使得家道中落，更悲哀的是，我 14 岁丧父，13 岁丧母，小小年纪就饱尝到了丧亲之痛。

面对生存的压力，我发誓好好读书，将来重振家业。1929 年我考入了太原国民师范，这是一所具有革命传统的学校，当时正值北伐战争结束，三民主义未能在中国实现，我曾寄希望于国民党改组派，但当我看到“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对日帝采取不抵抗政策，大失所望，经过冷静观察，我感到真正能拯救中华民族的只有中国共产党。

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我与其他青年自发组织了一个“九一八读书会”，开展抗日宣传，并把斗争的锋芒对准国民党反动分子。1932 年 10 月，我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群众组织——抗日反帝同盟会和社会科学家联盟。

1933 年我来到北京，考入了当时的北平师范大学文史系，我一面学习，一面继续从事学生运动。记得在 1935 年的一次大规模学运中，我曾被同乡告密，遭到逮捕，关押数月后释放出狱，但这也磨炼了我的意志。

在后来的“一二·九”学运中，我被选为学联代表，任民

族解放先锋队区队长、总部宣传部长，由于我坚定不移地拥护共产党，在抗日及反蒋斗争中经受考验，1936年夏季，我的入党申请获批准。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我曾任太行山区党委宣传科长、太行行署副主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委员、教育厅秘书长。

问：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风起云涌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毛泽东曾点名批评邓子恢和您的态度“像小脚女人走路”。但他又肯定地说“杜某是个好同志”，请谈谈其中的缘由。

答：在解放后，领导中南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我依靠总结过去经验，提出了分阶段进行土改的主张，即普遍发动群众、建好农会组织、进行反霸斗争、再转入分配土地，与此同时，我还建议下乡参加土改的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选拔积极分子以更有利于党的基层组织的建立。

毛泽东主席曾充分肯定了我提出的方法，1951年2月，他在中央起草的批语中指出：“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土地改革的正确秩序，本来应当如此。”

我于1953年初被调到北京中央农村工作部，参与组织全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

但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不断地思考和探索，因而，当我面对不断变化的新形势时，思考也常常面临着种种冲击。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初期，按中央决议推进农民的互助合作，邓子恢部长和我提出的一些意见毛泽东开始是支持的，但后来农村建立合作社的发展势头非常迅猛，我和邓子恢的

思路已跟不上毛泽东决策的变化，因而产生了分歧，主要表现在：（1）毛泽东主张发展农业合作社的速度要快，而我们主张慢一点，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要控制建社的一定数量。（2）在土改结束后，一定时间内我们提出过给农民经济活动的自由，即商品交换的自由、借贷自由、雇工自由和租佃关系的自由，简称“四大自由”。但毛泽东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主张，缺乏清算。（3）关于合作化的形式，我们主张搞多样形式并存。毛泽东主张把重点放在高级社。因此被毛泽东视为右倾错误。1955年10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毛刘周分别点名批评了邓子恢和我，认为我们在“社会主义高潮到来之前，像小脚女人走路”。

当时我和邓子恢听了毛泽东的批评后，由于大规模合作化运动刚刚开始，既缺乏进一步的理性认识，也没有实践经验可借鉴，我们还是虚心接受了批评，否定了自己的思路，并作了自我检讨。就在这时，党内有些人提议要严加追究我的责任，毛泽东主席肯定地说：“杜某是一个好同志，土改是坚决的，对于合作化，对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经验，到下边实践一段时间就好了。”之后，为统一全党思想，毛泽东还编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他在书的按语中强调，大家都要重视调查研究，为社会主义改造找出一条光明大道，当时他的这种抓改革关键认真精神，使我深受感动。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本着对历史和人民的高度负责，对历史问题作出了重新评价，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对邓子恢和农村工作给予了肯定，曾经加在我们身上的一些不实之辞，予以推倒。

问：中国科学院在 1956 年制定著名的“十二年科学规划”时，据说当时各方争议较大，而您作为规划的协调者和构思起草者之一，做了大量的工作，最终圆满完成了规划任务。请谈谈这段不平凡的经历。

答：说来也巧，在土改时期，中央出于对我的关心和爱护，曾提议我到地方上工作一段时间充实经验，但一个偶然的机缘，改变了我的人生安排。

1956 年初，时任中组部长安子文找我谈话，他说：“先不要下去，国务院最近要成立一个科学规划委员会，准备选几个同志抓具体工作，你是大学生，先留下工作一段。”我表示服从组织安排。

1956 年 3 月 14 日，国务院正式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主任是陈毅同志，副主任是李富春、李四光、郭沫若和薄一波，张劲夫任秘书长，范长江和我为办公室主任、副主任。

规划开始时，专家们畅所欲言，议论纷纷，与会的科学家从各自比较熟悉的科学领域，提出了大批量课题。但作为一个科学落后的国家，要由农业国转化为工业国，科技工作与经济结合，选择什么发展战略，这是必须明确的问题。如果齐头并进，很可能费力大而收效不佳。所以我建议提出以“重点发展，迎头赶上”作为 12 年科学规划的发展战略，这个方针的主要内涵是要在现有国力的基础上选择重点项目，加快培育新的人才，集中人力物力，限期完成。只有把握重点，才能后来居上，我的想法得到了周恩来总理和李四光副院长的赞同和支持。

但科学规划是项繁复而又系统的工作，参加规划工作的

科学家有几百名，差不多每人都有一条思路。但大体上分成两种主张，研究所和大学主张按学科规划，而产业部门则主张按技术任务规划。双方又争论不休。

当时，面对这种情况，我参阅了许多相关书籍，特别是美国和苏联制定有关科学规划的资料，明白了组织科学研究的两种方法。一种按学科组织，这是多数国家的做法；另一种按任务组织，这是政府参与科技事业做法中的一种选择，它利于迅速发展新兴技术领域。典型的例子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的原子弹研究和苏联的导弹与人造卫星研究。其特点就是：打破学科限制，取得政府强力支持，组织科学家合力完成好一个中心任务。于是，我提出了“以任务为经，以科学为纬”的整合方法，简称“任务带学科”，这一思路冲破了横亘在大家面前的难关，使几百位科学家的思想统一起来，最后归纳出 13 个方面 57 项国家重要的科技任务，绝大多数科学家都在其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综观这十二年科学规划，不仅使得国家一次技术革命顺利完成，也使得相关学科找到了新的生长点，而且更重要的是第一次把科学家组织到国家建设中去，推动了中国的科学走上现代科学轨道，直接推动了国防工业的发展，在较短的时间内就有了“两弹一星”的成就并由此带动了计算机、电子学、半导体等新技术领域的建立和发展。

问：邓小平同志曾把家庭承包制的建立称为中国农村的两大飞跃之一，而在许多人眼里，您是家庭承包制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之一。请回顾一下相关情况。

答：农村改革事业中，如何对待土地家庭承包制的建立和稳定，一直引人注目。家庭承包制是由包产到户演变而来的地权体制。改革前的几十年中，这种体制，曾引发过几起几落的争论。最初本是农民的自发行动，目的是用它去替代人民公社式的集体统一经营。农民这个主张的合理性，早在60年代困难时期已为一些县级以至更高级领导同志所承认，并支持在一些地区试行。不料：这些同志却因此而受到批判，被斥之为走资本主义道路。那时，别说倡导包产到户，就是说几句赞同的话都会冒很大政治风险。可是历史偏偏出现戏剧性变化，80年代的经济改革，恰好在这个方面找到了制度转变的突破口。实际上，所以产生这种变化，乃是全国从农民群众到最高领导人在实践中集体学习而得出的结果。当然，这并不等于说所有的人都保持一致见解，出于种种原因，反对这一政策的人准会有的。事实上，就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将近十年，在农村生产发展状况业已证明其可行性之后，也曾一度出现不算小的反对风浪。此时，有一些支持包产到户的同志也顺风转舵附和了反对者。但一些同志能深入民间，倾听群众呼声，传送给领导机关一个讯息：“农民怕变”、“呼唤政策稳定”。它和来自各方的反应一起，引起领导重视并做出正确决策。

邓小平同志曾讲，农村有两个飞跃：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承包制是一次飞跃，要长期坚持不变。将来还有一个飞跃，是实行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我们领会小平同志这个讲话，绝不可忽略下边这个涵义：第二个飞跃是在第一个飞跃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绝不是简单复原过去已经废除的形式。小平同志所以强调家庭承包制“要长期坚持不

变”，是预见到第二个飞跃“是很长的过程”，需要在一段很长的时期内，让农户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自主决策，独立经营，发展商品生产。

此时的农户经济是在商品平等交换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生产关系，是对旧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中存在的主宰与依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否定。本来，新中国成立，在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土地改革已经把这种关系彻底扫除掉，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可是，土改之后，由于在经济条件尚未发育成熟的时候，就用几年时间全面地实现公社化和统购统销制度，并对农民个体经营和市场商品交换也同时予以废除，结果商品生产受到抑制，未能实现原来高度发展生产力的预期，而后者正是社会主义制度赖以确立和巩固的必要条件。因而，在80年代发起了自我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事业。以往的历史发展昭示人们：社会制度的变迁是不会停止的。农村改革，恢复了家庭经营，必须长期保持稳定。但家庭的经济功能，一定会随着社会生产的分工与专业化，出现分解和变化。一个自留地政策，曾在困难时期呈现增产效应。主张家庭经营拥有独立自主权利，决非倡导孤立化经营，固守小农自然经济。不论现在还是将来，农业经营方式，一定是既有分散又有联合，产权既要专有化又要社会化，其具体组合形式一定要从实际出发，由群众去探索，去创造，但不能违反客观经济发展法则，凭主观愿望办事。

问：据说早在20世纪80年代，您曾和邓小平同志就粮食和农业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并达成了高度共识，如今面对各方面情况都已发生了较大变化，您又是如何看待粮

食和农业问题的？

答：我记得是 1987 年，邓小平同志召集几位中央负责同志到他住处开会，听取农业问题汇报，小平同志问我为什么粮食一下子能增产那么多？我说首先是因为生产承包责任制，其次是 70 年代末引进的十套大化肥厂。制度好加上物质投入，才出现了好收成，小平同志当时连连点头。我又对他说，沿海地区不少农民到乡镇企业就业，成了兼业户，田地就种不好，所以有的地方，就让农民自找对象，把耕地转给种田能手经营，后者变成了农业大户，但对这种做法有些人表示反对，邓小平当即说，只要能增产，避免荒芜，没有什么不好，种草养鱼有专业户，种粮也应有专业户。这番话使我深受鼓舞。

现纵观中国农村改革之路，基本上是改了两样东西，一是改革所有制，主要是找到一种土地公有制经营形式，即土地所有权归集体，使用权给农民，由家庭承包经营；第二是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原来农产品剩余的部分归国家收购，即由国家垄断，不允许私人出售，农民没有处理剩余产品的权利，而现在对农民逐步开放了农产品市场，赋予农民较自由处理农产品的权利，但改革之路还很长，我心中最大的目标，就是要使农民彻底走出封建社会和自然经济残余的阴影，农民应是一个有主权的“自由人”。我认为，提倡家庭经营，就是要使农民自己能依托一块地权和社会交往，自负盈亏，自求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一种自主权的联合。过去集体农庄式的联合，实际只有联合，而没有自主权，农民应该既有自主权，又能相互合作，共同抵御外部的各种

侵害，共同参与市场的竞争，要避免孤军作战，弱肉强食。这个过程就是先让农民具有独立性，变一个“自由人”，之后，应变成为“自由人”的联合。另外我认为近年有两个较突出的问题应强调。

第一，近年农民收入增长过慢。各地正在遵照中央部署进行结构调整。这是战略性调整，有别于适应性调整。产品结构调整重点，宜放在发展种草养畜，发展畜牧业，尤其是养牛业上，以适应国民对奶类食品的新需求，并取得较好收益。水果蔬菜有生产过剩趋势，沿海地区已建立起销售市场，又有冷藏设备，可完善产品品质，继续发展。各地区均可试办股份制公司，或利用乡镇企业搞好产品销售和食品加工业。发展食品加工业，可延长农业生产链条，提高产品技术含量，提高农产品附加值，这也是当前阶段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途径。

第二，全部农业生产应该从强调数量，转向强调质量。到本世纪中期，预计人口将达到 16 亿，粮食供给还需继续增加，决不可放松粮食生产。如果出现缺口，还须利用进口解决。我国农业贸易方针将是有进有出，以出养进，如果产品质量上不去，不合国际标准，出口必然受阻，进口也受影响，导致在本国市场和国际市场上降低甚至丧失竞争力。所谓质量不只是指营养品质，还有绿色安全标准，这与保护环境有关，必须及早统筹规划抓紧解决。可以说，加入 WTO 对农业部门来说，将是一次重大考验，重要任务是解决产品质量问题。

问：杜老，您作为中国农村承包制的倡导者之一已是众所周知，但实际上您还是小城镇发展战略的构思者和推动者，

早在十年前的 1993 年您就开始呼吁了，这事就鲜为人知了。请谈谈近几年来您的小城镇发展构想。

答：我是在研究农村改革的过程中，发现了小城镇建设对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作用。

其实早在 80 年代中期，我就和费孝通同志搞过这个课题，当时我看到中国经济二元结构，一方面是先进的大城市，另一方面是落后的农村，这样就导致了城市越来越大，而乡镇企业虽发达但缺聚集度。所以我当时就设想，如果能把经济较好的地区发展小企业，同时发展小城镇，势必将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小城镇是大战略，而城市化是更大的战略，因而要把小城镇问题放在城市化的总体战略中来考虑。

从总体上说，中国的城市发展落后于工业发展水平，也落后于世界同等工业化程度的国家，90 年代初期，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是 47%，而我国则不到 29%，这就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带来不少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积累太多，使得劳动—土地密集程度超过了通常所允许的范围，土地经营的平均规模是世界超小型的，这就把农民难以摆脱贫困，又由于城市化落后，第三产业就缺乏载体，而第三产业恰是消化劳力最多的产业，一旦落后，必将会影响第一、二产业的发展，造成结构病。

要消除上述负面影响，我提出要把城市化提到大战略的高度。发展小城镇，不光是有助于扩大内需，而且是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不可避免的过程，而乡镇企业由于太分散，成本高，建成小城镇，就会形成共同的服务业，优势互补。小城镇的重要性更表现在它是城市网络的节点。

总之，要把建设小城镇当成战略性的历史任务看待，这件事不是短时期能完成的，也不是一次性能搞好的，小城镇建设代表了一种趋势，一种历史的必然性，小城镇建设恐怕需要很长时间，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农村人口的转移和产业分工等变化，恐怕要有二三十年的时间，才能把此事大体完成。

然是战略性的规划，所以各项政策制度一定要精心、周密地设计。新体制的小城镇，一定要把各方面的利益调节得各得其所，尽量使得各方面都较满意，不要遗留重大的问题和隐患，我认为必须注意和解决好以下几点：

1. 建城建镇的选址。选对选好，要按照市场交换网络的需要进行选择，如选不好，城镇还是长不大，交通不便的地方绝对不行，应选在交通方便的集镇、县城，以便于招商引资。

2. 要有一个整体规划。每个省、每个地区要有自己的规划，然后由建设部搞一个总体规划，规制虽然是可变的，但必须要尽量减少和避免浪费，把百姓的钱用好。

3. 关于经费问题，不要靠等国家出钱来扩大投资规模，更不能搞乱摊派，增加群众负担，而应采取新的筹资办法，如搞共同投资机构、合作金融组织等，使得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关于户口问题。不要直接卖户口，可搞一些中介服务项目，解决户口问题，可发行长期居留证，通盘考虑如何解决好农民工。

4. 关于小城镇与社区的关系，对于资源转移，企业如愿进城市的要为其提供条件，而农产品或农副加工业宜集中的

应集中，另外，服务业大部分愿进城，这个工作也要做好。

最后，我认为在城镇建设中，浙江温州地区的经验是值得借鉴和推广的。如温州有个闻名国内的纽扣市场，这个市场逐步带动了周边的各乡各村，发展成为一材一品一乡一业，逐步形成了轻工制造业基地，由此不断自发扩展，既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又发展了一批小城镇，从而带动了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

问：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都大放异彩，堪称中国地方经济的杰出典范。但近几年来，“苏南模式”进行改革重组，而温州模式的生命力却长久不衰，您老与吴敬琏等一批知名学者一样，对温州的经济模式非常关心，不止一次地去实地考察调研，颇有研究成果，请与我们的读者朋友分享一下。

答：温州的发展历程和主要经验，引起了社会各界、特别是经济学界的广泛注意。温州经济确实值得研究。这里谈一点我个人的学习心得。

第一是温州有一个自发秩序。

温州经济，民办、民营、民有、民享。它是自发的，又是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秩序。

历史表明，在自发秩序下，市场发挥作用出现先行者的实践样板，产生诱导作用，通过相互博弈，不断扩张完善，形成新的体制、新的制度，这正是一般性规律。

温州经济就是一个实证。

温州能有今天，我以为最值得注意的一条是，当地政府

职能简化。政府对微观经济及其日常经营，始终不去直接干预。而把主要精力都用来改善宏观环境，搞好建设规划，制定游戏规则，依法实行社会监督，兴办公益事业，提供公共服务，完善税收制度，充实财政实力，搞好基础建设等方面。从前看到的那种荒凉、脏乱的景象已不复见。

中共浙江省委明确地提出了“三个放手”：放手发展市场经济，放手发展多种经济，放手发展比较优势。“三个放手”从宏观政策高度，肯定了自发的发展秩序，使之成为全浙江省的经济发展取向。现在大家都已看到浙江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同那里的个人经济收益协调均衡发展的新格局。可谓市场繁荣，社会稳定，前景广阔。

第二是城镇化和聚集效应。

温州人先是把个体经济组合成多种形式的联合体，有股份制、合作制、合资经营等。联合体的出现，一方面体现生产力发展引起生产关系的社会化，另一方面，也为了体现节约，而使交易费用内部化。此外，适应小商品扩大交换规模的趋势，进而建立集散中心：小商品专业市场。

过去中国社会有一种流行做法，叫做“扎堆”。做买卖的人找一个地点，同行同业扎在一块，能便利客户。温州有闻名国内外的纽扣市场，就是从扎堆长大的。

小城镇的重要性不仅表现在“小”，更表现在它是城市网络的节点。城市作为网络结构，发展了不同于农村的一种新的人际关系，对于加入者，有利于取得某些自己缺乏的生产要素，能够比较轻易地学会经营、生产、服务。所以，聚集到城镇不单有购买服务的便利，同时便于收集信息，据以安排自己的生产、分工，还能利用互联网络发布信息，争取社

会认同本公司业绩，并得到社会认同与合作。

只靠家庭分工，没有社会分工，经济是难以充分发展的。城镇能够促进生产的社会化，而生产社会化又能促进生产关系的社会化。城镇化、工业化、社会化乃是一个事物的多维表现，是社会赖以取得进步的必备条件。

人们向城镇聚合，取得聚集效应。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又产生对周边的辐射作用，从而把周围的乡村经济带动起来，实现城乡一体化。温州人每到一地就相互扎堆，到了北京就创造了浙江村，有一个，就带出多个，到了意大利又创造了许多浙江村。温州现在有 100 多万人在全国，30 多万人在国外，创造了一个大网络。它为温州人互助互学，相互策应，协调对外交往，在异城经营事业提供了诸多便利。同样一个人，离开网络，就会失去一切既得利益和机会。这正反证了网络存在着强有力的凝聚力。

第三，温州经济属于混合型经济。

温州经济的主力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分属乡镇所有、个体所有、合伙及个人所有，是混合型所有制。它们已在全市 GDP 中占到了最大份额。产业革命兴起时，人们都说企业“大的是好的”。今天信息革命兴起，应当说“小的也是好的”。小企业把物质劳动和经济决策统一于一身，利于萌发创新意识；而创新机制又接近生产单位，利于提高技术更新速度，争取市场先机。在温州，50 万块钱就可以办个小企业，这利于吸纳分散于全社会的人才和资本。小企业为数众多，每个企业又是一个小学校，可以培养大批的企业家。这既能实现经济增长，又能实现充分就业。

大企业具有规模经济效益，也不可缺少。温州也生长了

一批民营大企业。鉴于国内大企业规矩很多，阶层等级严格，行动僵化，办事迟缓，形成路径依赖，很难改变。温州为避免这些弱点，正在探索建立现代企业的新途径。例如天正集团，调整股权结构，成立董事会、监事会、企业管理委员会，形成企业法人治理秩序。

第四，温州经济具有增长的新动力——创新。

温州过去在国内竞争中是很有力度的，今后要接受国际竞争的考验。必须主动地、有准备地接受这一考验。加入WTO既不是一个陷阱，也不是免费午餐，而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现实。面对现实必须加紧工作，工作的总目标就是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因此，我建议：

（一）更新产品质量。现有产品的现有技术需进一步提高，使质量升级，成本降低，创造品牌，打进国际市场。为此，要成立一个技术服务中心，开辟一个产品目录，更新生产技术，更上一层楼。

（二）树立创新意识，更新生产技术。为此，一定要大批引进与培育人力资本。温州工业，从个体经济起步，以家庭经营为主，有优点，也有弱点。优点是具有广泛的经济起动力；弱点是被血缘关系所束缚，妨碍多方引用新的人才。为引入人才，必须向五湖四海开放。今后的经济将向知识经济演变，知识经济不是消灭物质，而是改进生产投入品比例，把产品中的知识含量不断提高，把人力资本作为主要生产要素。为此，必须把教育事业建设提到应有的地位。政府办学，民间也要办学。正泰集团、东方集团办学校是很有眼光的举措。

（三）知识经济需要进行风险投资，开发高新技术。美国

的新经济以硅谷为代表，企业都是小企业，但它们的创新能力很强。硅谷还有一批风险投资组织，专门支持正在研究和发 展当中的科技项目。现在那里的风险投资已在 120 亿美元以上，并且还在增加。温州市政府与企业界都应该考虑设置风险投资，支持一些正在创新之中的项目，准备迎接知识经济时代。

问：在 2000 年春天，湖北省乡村干部李昌平所著《我向总理说真话》一书，指出我们欠农民太多，反映了当今中国“三农”问题的严峻性，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您在阅读了此书后，为此书作序并提出给农民国民待遇，您对李昌平及其著作如何评价？

答：李昌平同志不是第一个提出“三农”问题的人，但以一个乡党委书记身份，系统提出、用数据说话、用切身经历讲话的他是第一个。他告诉我们：除了在走向繁荣文明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方看到的中国，还有另外一个中国是乡土中国。

我国农村农民生产生活状况，比解放前大有改善，这是肯定无疑的。但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业投入不足，农村发展滞后，由此而衍生出自然灾害、环境保护、盲流、高犯罪率、内需不足等问题；如果不解决“三农”问题，必将影响国家社会发展和稳定。

解决“三农”问题涉及中国深层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个系统工程，不要指望毕其功于一役。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是给农民以国民待遇，给农民以最基本的权利。在他们已尽

到公民义务的同时，应享有公民权利，可惜这一点尚未做到。有人说农民其实成了这个社会的二等公民，这个说法是不确切的，但反映了部分真实存在，值得关注。

我记得林肯在签署《解放黑奴宣言》后，有人问他：你怎么敢将成千上万的黑奴从奴圈里解放出来呢？你不怕天下大乱吗？林肯很平静地回答：政治家做很多事情需要的仅仅是勇气而已！可怕的是对一些不确定性的恐惧。

中国的农民问题也到了如此地步。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将他们从土地和其他约束下解放出来，并不是有些人想象的那么可怕的事情。城市不论大小都要向农民开放，让他们可以在城市安家落户。《宪法》要加上一条：中国公民有迁徙的自由。不得对农民工设置歧视性的管理。外来民工本来就是弱势群体，你再歧视他们，他们只能更加弱势，甚至成为一个被主流社会抛弃的边缘群体，变成一种暴力犯罪分子的供应体。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我国人多地少，就农业来解决农民问题，潜力即将耗尽，在大批量农民转业到城市，使中国的农村居民比重由现有的70%降到20%的时候，“三农”问题也就不是大的问题了。农业这样一个弱质产业要养活70%的国民人口是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的。

为此必须破除实行了几十年的城乡二元结构，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实行专门立法，明令废除原有的歧视性法规制度。

与此同时，城市的公共服务系统，像规划、绿化、环卫、自来水、电力、电话、有线电视、道路等，都要做出规划延伸到农村，要启动一场新农村建设运动，实现城乡一元化。

截至今天，农民没有自己的组织，政府听不到他们的诉

求。工人有工会，也要允许农民成立农民协会，使农民依靠它行使已经拥有的权利，即进一步在政治上充分发挥应有的民主权利。这些政策实施会遇到阻力，因此应推进民主改革，先办村民自治，进而实行乡政权直接选举，直至县政权的民主重建。农民应具有谈判地位和自我保护的权利，有自己的代表或代理人。我们欠农民兄弟太多！重新审视“三农”问题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我也曾提出给农民完全的国民待遇，对李昌平同志这本书里提出的一些见解抱有同感。

问：早在两年前的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的前夕，据说您在《农村工作通讯》创刊 45 周年暨“十五”农村经济发展座谈会上，曾列举了中国农民没有得到“国民待遇”的十个方面，具体是指哪些？

答：农村杂志必须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与此同时，还要作为农民的喉舌，反映农民的要求和呼声。不但是杂志社，其他部门对这个问题都应该重视。

有的同志提出，农民占我国人口的 70%，中央重视农业，重视巩固工农联盟，提高农民地位，是一贯方针。但和市民相比，农民还没有取得国民待遇，有些方面还受到歧视。这个问题呼吁了多年，还要不断呼吁。

现在很多现象可以作为农民没有取得国民待遇的注解：

1. 几十年来，农民没有自由迁徙的权利。想离开农村，改变身份，非常困难。这种情况全世界少见。

2. 受教育的权利。本来应该所有国民都一样，但农民人口占全国人口 70%，而在大学里却只占 30% 的份额。30% 的

城里人占 70% 的份额。

3. 社会保障制度未在农村建立。农村失业人口不叫失业人口，也没有失业救济。但农民却承担我国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任务。我国长期实行统购统销，低价收购农产品，农民作了很大贡献，粗略估计大约有 6000 亿~8000 亿元。

4. 现时农民税负非常重。对此中央非常重视，但禁而不止。乡机构太庞大，农村建设任务多头下达，怎么能减轻农民负担。

农村医疗卫生保障不够健全。每千人才一个卫生员。以前还有个合作医疗，现在也没有了。

5. 农民就业难。城乡差别近年还有扩大趋势。据调查，种田收入低，仅够维持温饱。有 8000 万农民徘徊在城市乡村之间，来回流动。他们到城市找不到职业，找到也是又脏又累的活儿。所有城市的单位招工都写明要城市户口。农民工领的工资还是 10 年以前的水平，付了房钱，工资就所剩无几，只好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小房子里住。8000~9000 万人生存成本高，收益低，心理不平稳，国家又缺乏制度安排，是一个不安定因素。已有少数人铤而走险，走上犯罪道路，不可忽视。

7. 土地制度。党重视土地问题，改造了集体经济，实行家庭承包制度，农民表示满意，符合他们的利益。但有些村对土地是一年小调整，三年大调整，农心不定，他投资的愿望就不会很高。经营时间 30 年不变缺乏法律规范，也缺乏法律咨询组织。

8. 贫困人口大部分在农村，虽然现在解决了 2.5 亿人口的贫困问题，还剩 3000 万人口，但返贫现象到处可以见到，

脱贫不可以估计过高。

9. 和城市人相比，农民种田需要成本，但贷款非常困难，国家规定土地不能抵押，而银行里规定贷款必须有抵押品。

10. 社会主义时代农民翻身了，废除了封建压迫，但民主制度建立不够完善，干群矛盾激化事件时有发生。村民自治尚欠规范化，乡自治还没提到议事日程。

农民还缺乏自己的政治组织，保护自身的权利。过去几位老同志曾给中央写信，呼吁成立农民协会。小平说：原则上可以，再看三年。如有需要，就组织。后来由于多种原因没有着手解决。全世界农民都有自己的团体，都有农民协会，只有中国农民没有。

我粗想了一下，列举以上十条。这都显示农民和市民相比，所享受的国民待遇也有差别。而且这些问题存在不是一天，存在几十年了，得不到纠正。经济学上说有一个“制度惯性”，形成路径依赖。谁也不敢动，甚至没有人去反映。即使反映，长期得不到解决，也习以为常。这样下去会带来社会问题，希望“十五”能有所解决。

难度在什么地方？农民太多了。国家财力照顾不过来，人口向工业部门转移过慢。70%的人口搞食品，供30%的人去消费。库存过量，粮价越来越低，提高农民收入谈何容易。现在见到一线曙光：中央决定废除户籍制度。户籍制度废除后，在农村要成立一些中介机构，让流动的农民能在正常的秩序底下找到就业机会。

另外，必须大力发展城镇，将1亿~2亿农民转移到城市，只有减少农业人口才能提高农民收入。现在有人提出农

村家庭规模太小，怎么办？再回到原来的集体吗？搞集体，人减少不了，劳动生产率上不去，规模经营谈不到，所以要大力提高城市化水平，发展中小企业，繁荣城市。应建立法治秩序，重视立法问题，一个承包法，一个税费法。

问：在世纪之交的 2000 年元月举办的一次关于“农村土地使用权立法和制度安排”的国际研讨会上，您作了较长的大会发言，强调要尊重和保护农民的土地权利。那么，应该怎样尊重和保护农民的土地权利呢？

答：在当前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不主张用行政手段给农民调整土地，即用平均主义的办法，如生一个人给他一份，死一个人取消一份，这并不是好办法。为调动亿万农民的劳动生产积极性，急需给农民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其中，土地制度是第一位重要的。近期中央规定，土地承包期延长 30 年不变。如果农民愿意可继续延长，这样就形成产权制度长期化，对稳定整个农村的持续发展大有好处。现在又提出进一步给予法律保障，发布《土地承包办法》激励农民把土地种好，并在农业外创业。这些举措必将引起各种有利的历史性变化。

家庭承包制最早叫包产到户，前者是个学名，后者是个乳名，1956 年诞生，至今已有近 50 年的历史。前 30 年不合法，后 20 年合法，如今到了立法的时候。这个历史性的飞跃证明，凡符合生产力发展需要的政策都会给自己的发展开辟道路，任何人都阻挡不住。从非法到合法这个变化过程中，有人为它付出了很大的风险代价。举个例子，当初最早搞家

庭承包的有两个地方，一个是环江县，一个是永嘉县。这两个地方的县委领导，有的被撤销工作，有的下放劳动，有的被打成右派，但后来都平反了。我之所以再提这件事，是让我们不仅要感谢当前研究支持它的人，也要记住原来为它付出过代价的人，尤其要珍惜这个早期自发的改革成果。

在家庭承包成为合法以后，还需从政策层面转到法律层面，建立法律保障，就是要把承包给农民的使用权肯定为一种物权，按私人财产，给予保护。这种使用权，包含经营权、抵押权、入股权、转让权等多种权利。尊重这些权利应成为人们经济交往时必须遵守的“游戏规则”。

我们说要稳定是因为有不稳定因素，所谓调整。

当然，我们强调稳定，也要鼓励流动，以优化土地配置。市场经济没有要素的流动就不成为市场经济。尤其今后 30 年之内，我们国家要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会有大批农民转业进城，离开土地。农村想要富裕，非得减少农村人口不可，因此，我们的土地立法不但要界定稳定的一方面，还要界定流动这个方面。要让基层组织遵守 30 年内不搞大调整的原则，同时，又规范上级政府的行为。比如说，部分农村土地转到非农用途，如转到工业、交通等建设项目，此时政府介入征收土地，先变成国有，然后批租出让。转让的价格是市场价格，而实际上给农民的只是这个市场价格的一个部分，政府得大头，农民得小头。这个小头又由集体和农民两个方面分，到头来农民得到的更少。少一亩土地，就多一个农村失业人口，必须从别人那里划来一份土地。

农村土地使用权长期化，法律界定要很具体。它的功用在于不影响农民向土地投入的兴趣，使农民能够根据这个法

律抵抗一切外来的对其自身权利的侵犯。

随着农外产业有了发展，形成新的就业空间，农民收入有了新的来源。同时，土地作为一种自然资源的作用降低了，资本化程度提高了。农民生产的提高是靠资本化，而不是仅仅靠哪块土地的自然赐予。这些情况提示我们，除要稳定土地使用权以外，还要从提高土地生产率方向着眼，在其他相关制度安排方面多想一点办法，以代替那种频繁的调整。

问：保护土地权利应解决哪些问题？

答：1. 我们主张建立有偿转让的土地市场，以市场调整来代替人为调整。某些地区受人口增长的压力太大，农民又缺乏农外就业机会，可制定一些限制措施，防止过度频繁、大幅度的调整。如数量限制，在大约 10% 的土地范围内调整；时间限制，必须稳定 5~10 年后才可调整；人口类型的限制，生小孩不调整，媳妇如转户可调整。对这些限制方法，还没有最终的意见。我看限制是必要的，无论如何不能使农民因为调整而不愿增加土地投入，实行掠夺性经营。

2. 解决侵犯土地收益权的问题。土地作为非农用地，要先由政府批租，是为了控制耕地过量减少。我们建议批租土地，要把报酬大部分归还给农民，补偿费不要过多扣留。

3. 土地所有权归属问题。一种意见认为是归村民小组，其好处是给农民的自主权大，缺点是要增加编制，增加财政人员，而农村是不宜增加管理人员编制的；一种意见认为是归村自治组织，其好处是自治组织是农民选举的，代表性、民主性大一些。另一种意见是土地国有，交农民永久使用。

4. 建议法律规定给农民拥有土地抵押权。如果把抵押权解决了，农村可能会出现很大的内需。但是抵押权的前提是使用权长期化，如果使用权不稳定，抵押权就有风险，银行就不愿承担。要找到一种既能保证农民吃饭，又能使银行规避风险的办法。

5. 必须调整城乡关系。要改变原来的户籍制度，允许农民迁移流动。有些大城市可以管制严格一点，建议中小城镇先把户口放开，有准备、有计划地转移一批农民农外就业。

问：众所周知，乡镇企业在 80 年代的国民经济中曾经异军突起，一支独秀，为国家作出过重要贡献。但是近几年来，由于种种原因，不少地方的乡企发展不太理想，有的甚至陷入困境。面对加入 WTO 后的大环境，您能给他们提出哪些良策和建议？

答：对于乡镇企业如何应对入世后的竞争，我提几点建议：一是要进行集体所有制的改造，企业间可以在自愿基础上相互兼并，增加企业资本规模，有利于竞争；二是要把农村金融市场搞活，使乡镇企业的发展得到金融支持，扩大乡镇企业的融资范围；三是乡镇企业兼并重组之后要准备进城。过去城乡隔离严重，乡镇企业过于分散在广大农村。从经济规律来看，发展工业必须有第三产业提供的服务，如销售服务、财务服务、法律服务、金融保险服务等，这些服务业分散部署于乡村，成本太高，宜于在城镇发展，乡镇企业进城，便于利用第三产业的服务。乡镇企业进城可能会失去一些东西，如原来社区的支持，低价的土地资源，就近吸收劳动力

的便利等，但是经济发展的实践告诉我们，工业长期滞留农村会慢慢走向萎缩，利害相比，还是进城较为有利。

问：杜老，您作为研究“三农”问题的资深专家，内心肯定清楚配套改革的重要性。据我了解，最近您根据经济全球化以及国内经济的变化，又重提配套改革的重要意义，我们很想知道的是，您重提配套改革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答：针对全球化带来的新变化，我认为中国能采取应对措施有：首先就是要把改革深化下去。而且要加大配套改革的力度和广度，不能单打一。

第一，要把经济因素的改革和非经济因素的改革相结合、相配套。要给我们的市场经济一个法制基础。现在要特别提倡这一点。所谓法制，最要紧的一条叫做保护民权、保护财产权。我们说公共财产绝不许侵犯，私人财产、个人财产也绝不可以侵犯。要把这一条定下来。这一条不定下来，市场经济是搞不好的。如果“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搞成“我的不是我的，你的不是你的”；或者“你的变成我的，我的变成你的”，弄得互相侵犯，这样，市场经济和商品交换就没有基础了。

第二，建立民主制度和法制秩序，保护政府的公平、公正，要设计一种能够相互制约的机制。一个企业有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可以互相制约。国家的各级政权也要有横向制约的机制。这些都是一种民主机制。

第三，我们一定要发展非国有经济，通过发展非国有经济，解决就业和增长问题。对国有经济改革，中央已经抓得

很紧了，我很赞成。我想说的是，只搞国有经济改革还不够，还要加上非国有经济的发展。非国有经济，大多是中小企业。有了中小企业的发展，才能够把全社会的民间资本动员起来，才能够针对社会每个人的需要，发展多样化的产品。

中小企业不仅是一种经济力量，还是一支创新的力量。现在我们发现，世界上很多新技术是由中小企业搞出来的，美国的硅谷就是个样板，它能够吸收志同道合的人力资本。很小的企业，十几个人，但都不是普通工人，都是具有人力资本的各种人才。有了这样一些人，企业就能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现在，有这样一个潮流，有些大公司的机构已经虚拟化，公司里人不多，没有太多的机构，它拥有的是自己的资本、技术并用它们来扶植中小企业发展，然后用贸易手段获取回报。比如耐克球鞋，它总厂的机构很小，但是它能够让全世界生产和销售耐克运动鞋。我们也要适应这种趋势。

问：杜老，最后请您老人家对中国农村的发展取向提些建议和展望。

答：在可以预见的时段，农村发展取向，我认为下述几点应受到重视：

1. 土地使用权长期化。我们主张应使现行土地制度法律化，允许农民拥有土地的长期使用权。与此同时，应对土地使用权转让市场制定法律程序。

2. 新的整合方式。应该依照市场竞争和国家政策取向，引导农民打破小农经济的封闭性。在自愿的基础上，以

合作组织或股份制公司等形式建立服务共同体。这种联合或合作是自由农民的联合和合作。农民受自身利益驱动，既需要独立又需要整合，既要拥有个人财产也愿意发展集体资产和公共产品。沿着这个趋势加以引导，将找到适合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特性的整合形式，实现第二次飞跃。

3. 市场发育和农业保护。我国政府历来是强调保护农业的，但由于受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还没有使农业完全走出“负保护”和“贸易歧视”环境。目前农业比较利益低于应达到的水平，农业收入不断向非农业部门转移，抵消了政府对农业的各种财政支持。

国家对农业的支持，应着力于发展文化教育、改善水利、交通通讯等基础建设，拓宽就业门路。更有效的措施是加快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过程，以便利用均衡价格讯号的激励作用，使不同地区各类经济主体从粗放型经营转向集约型经营，并发挥比较优势，取得比较利益。同时，防止各地区和各部门低水平竞争、大量重复建设和相互封锁，人为地放大市场波动幅度。现在国家正开始粮食收购制度改革，如果能朝着培育统一市场方向前进，定会取得积极效果。

就农业部门说，不但要利用国内市场，还应学会参与和利用国际市场。贸易自由，会提高农业经济的绩效。比如，利用劳动密集型高附加值产品换取土地密集型谷物类产品，扬长避短，平等交换，在市场全球化的演变中避免损失，收到开放市场潜在利益。

4. 科技进步和可持续发展。已经有很多学者预言，历史正进入知识经济进代，知识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性投入品，使生产力构成发生质变。

中国农业将受益于知识创新和生物技术、新能源开发、海洋生物利用，以及水资源开发和节约技术（此项最紧迫、最重要），突破资源短缺的约束，开发富有而闲置的资源。一旦信息技术广泛普及，将利于发挥人们学习的潜力。我深信人类的创造性是无穷无尽的，科技进步这个环节必须抓紧抓好。

当前最应注视的事情是，浪费资源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必须停止。以破坏环境的高昂代价谋求经济增长的思维和实践，必须抛弃。

5. 民主与法制。有准备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精简机构、转变政府职能，完成公有制企业体制转型，强化司法系统权能，建立社会监督，扶持各类社会组织，吸引群众参与公共事务。同时，也为反腐倡廉打好制度基础。村自治事业进一步依法进行推广。

6. 前景光明。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曾在农业方面有过辉煌成就，对世界做出过重要贡献。20多年的改革已经取得一些成功经验，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为党的活动指明了路向。但从整体看，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国走向现代化，还要经过艰苦长期的探索路程，还将遇到许多新的困难和问题。必须保持头脑清醒，绝不能自我满足，固步自封。必须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努力创新，踏踏实实地工作。可以完全相信：中国农业发展的前景一定是大有希望的。

《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对话(第六辑)》

南开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谷书堂



谷书堂先生近照

谷书堂简历

谷书堂教授，男，1925年10月出生于山东省威海市。1945年中学毕业于烟台市立一中，高二时曾一度转学北京九中（即汇文中学）。1946年考入南开大学经济学系，1950年毕业于获经济学学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51年参加高教部政治经济学研究室研修一年，后一直在南开大学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1979年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第一副所长并主持工作。1983年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重建后任首任院长并兼任经济研究所所长，直至1994年、1995年先后辞去上述任职。1987~1991年曾任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执行主席。

谷书堂教授现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并兼任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市场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天津市政府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天津市经济学会会长等职。他还担任南京大学、山东大学、西北大学、兰州大学、河北大学、河南大学、长春科技大学、河南财经学院、山西财经学院、河南金融学院等十余所高等院校的兼职教授。

谷书堂教授从1986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迄今在校内已招收博士生51人，其中有41人已获得博士学位。在他名下有5名博士后进站，都已期满出站。他们毕业后，在社会不同领域都做出了比较好的成绩，不少已成为专业学术带头人或已走上行政领导岗位。

谷书堂教授的著作（含合作）包括教材共 23 部，文章 100 余篇。其中主要著作有：《价值规律及其在资本主义各个阶段上的作用和形式》（合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合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中国市场经济的萌发与体制转换》，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社会主义经济学新论》，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谷书堂选集》，山西经济出版社 1996 年版；《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北方本”，主编之一），陕西人民出版社 1979 年、1982 年、1985 年、1988 年、1992 年、1995 年、1998 年、2003 年共计 8 版；《劳动力经济研究》（合著），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中国转型期经济问题研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列为研究生教学用书，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路径之探讨》，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究》主编，中国审计出版社 2001 年版。

谷书堂教授 1991 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5 年获全国优秀教师称号，并曾多次被收入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IBC）美国传记研究所（ABI）出版的名人传记。

问：谷老师，您好！作为资深的政治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专家，您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这与您青少年时期受过的美好教育是密不可分的。特别是在南开大学，对您的学术进步影响是很大的，能否回忆一下您早年的生活和学习情况。

答：我生于山东威海，它是一个置于大海环抱之中的小城，我从小就生活在这个环境之中。我爱海的广阔无垠，爱在大海中游泳。我的父亲在小机轮渔船上干活，常要出海打鱼。我跟随母亲，住在她所在的绣花手工厂里。因此，父母的谋生，除了给我一个温饱的生活外，还把我带到社会中下层人士当中，而不是局限于一个狭小的小城市的家庭之中。在海边，每逢大风天气，渔民家属盼望亲人返航的情景，常在我当时的幼小脑海中浮动。大约在我上初三或高一的那一年，我16岁的二姐不幸病逝，这使我年青的心灵蒙上一层伤感。常常想，人活着好好的，为什么会死？人活着究竟为什么？傍晚我常到海边漫步，也由此开始了我对人生的朦胧思索。这种思索又促动我去寻求答案，去追求知识。

回顾我青少年时期所受的教育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父母教育我为人要忠厚老实，讲求仁义道德；二是从学校受到的感染和教育，则是急公好义、平等博爱的人性论，这些教育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甚至影响着我的一生。中学时期，我喜欢照着画片描画水浒传中的英雄人物，巴金等名家的作品对我影响很大，使我开始了对人生的朦胧追求，憧憬未来，并萌发了攻读大学的理想，立志成为一个有学问的高尚的人。

1946年，我考入南开大学经济系，大约读到三年级时，

脑子里已积累许多关于人生和社会发展的各种问题。例如，社会究竟是为何发展的，社会是非曲直应如何判断，等等。当时在课堂上所学的知识，还不能满足我求知的渴望，也不能回答我的许多问题。正在这个期间，学生自治会办了一个“新书亭”，其中不少书籍都是市场上少见的进步书。我在课余一有空就到那里看书。读过的一些书，给我留下印象较深的有尤金主编的《哲学词典》，罗申塔尔著的《唯物辩证法》，普列汉诺夫的《唯物论的一元史观》，以及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我在脑中初步树立起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特别是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第一因素的观点。我当时就好像找到了一把分析社会问题的钥匙似的，使自己观察社会问题的能力有了提高。这一段的课外自学所得，在我以后的学习和社会科学研究中，奠定了一个较好的思想基础，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不再是漫无头绪了。

另外，我还读过里昂惕夫的《政治经济学》（因为那时政治经济学还没有社会主义部分），我正式学习政治经济是1949年，季陶达先生来到南开大学首次开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而我正是这个班的四年级学生。1951年，我被选派到高教部组织的、苏联专家授课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班”学习了一年，使我对当时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了一个较为“系统”的了解。从北京学习结束回校后，我便成为在南开大学第一位系统讲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专业课的教师。

问：据说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您就提出过关于价值决定和价值实现等问题的观点，曾引起较大范围的争议，之

后，您与许多正直的学者一样，被打成“右倾”，受到很不公正的待遇，但您却始终没有违背学术良知和真理，不随风倒，这是很可贵的品质。请谈谈您对这段经历的感受。

答：早在1955年一次科学讨论会上，我和魏埙教授合写的并提交大会的《价值法则及其在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各个阶段的作用及其形式》的论文，并在南开大学的学报上发表之后，195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魏埙同志和我合著的这本书，其中提出的“决定价值的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问题，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较大的反响。对于这个观点，有的赞成，有的反对。以后围绕这个问题我又写过几次文章，也引起过争论。1962年、1963年在《光明日报》与吴宣恭、林兆木合作发表《论价值决定与价值实现》和《再论价值决定和价值实现》两文，又引起争论。1982年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价值决定与价值实现的再探讨》，再度引起争论。我逐渐发现，争论中，各方都是引经据典，都是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寻找根据。这样的研究方法可取吗？对于马克思主义，要通过学习去掌握其精髓，而不应当把它当做教条。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我是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所以，从1982年发表了那篇《再探讨》的文章之后，就没再进行这种研究了，也没有再写这方面的文章。我的研究工作也随之转向了现实中的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例如《计划体制改革研究》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等文章，都反映了我1982年以后的研究重点的转移。

大约在50年代初期，我就开始了对物质利益原则和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的研究。大量的生活事实说明，物质利益原则、

价值规律商品生产都是客观存在的规律，不能任意否定和排斥。我在这方面的文章，都是我多年调查和观察所得。因此，当社会上没有宽松的条件可以阐述这些观点时，或者阐明这些学术观点往往要冒着被打成右倾，或被戴上修正主义观点之类帽子和压力时，我总认为尽管这些观点我可以在一个时期缄口不谈，但却不能违背科学的良心而随便修改自己的观点。

记得 1959 年春，在上海召开了全国经济讨论会。会议由孙冶方同志组织，200 多人参加。200 多人在当时是一个了不起的规模。因为 50 年代我国经济学研究队伍还很小。这次会议可以说是集中了全国的经济学工作者和主要专家学者的空前盛会，当时全国特别高等院校的经济学教授主要是一些老中年专家，青年人比较少。我当时还是青年人，三十岁多一点。在这个会上，我草就了一篇发言稿，应该说是一篇文章的详细构思，写在一个本子上，主要是谈价值规律在人民公社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在大会发言时我提出：价值规律不能调节生产，这是当时广为流行的斯大林观点，但我个人觉得在人民公社的生产过程中，它还是能够调节生产、或者说对生产有调节作用的。这是因为，国家不可能将人民公社的事情全部管起来或者管死。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农民个人，还是人民公社内部的一个生产单位，都会在实际生产与经营过程中对利益差别产生兴趣，哪种产品的利大，人们就会乐于生产哪种产品。这就是价值规律对人民公社生产过程的调节作用。这个观点在会上讲出来以后，孙冶方先生很高兴。因为，当时他正在极力宣传价值规律对经济生活所具有的调节作用（不过，孙冶方先生关于价值规律的观点与一般人所

定义的价值规律有很大的差别)。似乎他很高兴能够找到“知音”。我记得那天中午吃饭时，孙冶方先生特地来到我的餐桌前，鼓励我说：“你讲的内容很有价值，应当赶紧整理出来，把它收到会议论文集里去。”于是就在当天晚上，我开了一个夜车，把它整理了出来。后来，这篇文章被收进这次会议论文集里。我对这件事一直记忆犹新。因为，它是我从事经济理论研究的一次重要尝试。以后我的学术生涯几乎都是这样进行的：研究工作首先从理论难点入手，在有了对实际情况更多的了解时，再开始动用理论来分析现实问题，并在这种分析中去主动发现更多和更有价值的理论问题。

几十年来，我坚持了一些正确的学术观点，不随风倒。我的研究虽然有时也会修正我已有的学术观点，但那是研究深化的结果，而不是出自唯上或唯书。例如“在社会主义工业中存在生产价格”的观点，1964年曾经遭到批判，但从我的研究中认为它确实存在，所以，在一定时间里我虽然不说话（因为不准说），但观点我是仍然坚持的。再如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我认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不应局限于只研究所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70年代后期，几经探索，我明确提出政治经济学对象“不仅研究生产关系，而且要研究经济的运行和发展”。这一观点提出后，尽管有些人认为是“离经叛道”，而我仍然将这个观点写进我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即北方本）及《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中。

由于我把研究重点放到现实的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上来，便对原有的政治经济学以计划为主体的体系和内容发生了疑问。我认为建立一门适合中国实际

的科学社会主义经济学，已成为中国社会迫切的需要。于是，我从 1985 年起，便开始构思社会主义经济学新的框架体系，并初步确定了它的主要内容应包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微观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运行、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1986 年，这一研究被列为“七五”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于是我便组织力量，研究具体的编写大纲，对全书的基调、重要的理论观点方法，进行了认真深入的讨论。1988 年底，这部 65 万字的著作《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在集体努力下终于完成，并于 1989 年 11 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这部基础理论学术著作中，研究的对象与以往的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不同，并不局限于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我认为作为基础理论的政治经济学，如果把研究对象仅仅局限于生产关系，那就很难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本身提出的多种要求，从而理论也会由于本身的狭隘性而日益失去其存在的基础理论价值。所以在这部书中，我把当代社会主义经济作为全书的研究对象。首先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相应的体制，其次研究社会经济运行方式和运行机制，以及经济运行规律由此形成的条件。不仅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方面，而且在体系结构和基本原理方面都作了大胆的尝试，并相应提出许多新的见解新的观点和新的思路。这些内容可能是不完善的，或有不准确的地方，但我认为这种研究是植根于实际之中的实事求是的创新，是必要的，它可以引起人们的思考和讨论，从而推动经济学不断发展。

问：在 1978 年，由您和宋则行教授主编的“北方本”政治经济学教材，一改过去教材的不少弊端和缺点，无论是

在理论上还是方法上都有较大的突破和创新。因此在较长时期内被公认为“文革”后国内政治经济学的最新版本的教科书。请谈谈当时“北方本”的新内容大体有哪些？

答：1978年6月，在国家教委于武汉召开的文科教学座谈会上，各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的与会同志纷纷呼吁组织编写一本适合政经专业教学用的政治经济学教材。经过酝酿讨论，教委决定以民办公助的形式由中国南北二地各高校分别联合组织各编写一本社会主义经济学教材。“北方本”编写组由北方地区的14所大学组成。后来决定，由我和辽宁大学宋则教授担任主编。在编写过程中，我和宋教授对编写方案的设计和整个理论体系都进行了精心的构思。大家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伴随改革开放的进程，大胆的、认真的研究开始形成风气，真正开始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研究中国的经济理论，并试图写出系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著作。

我对《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即“北方本”的编写确实倾注了心血。该书至今已修订6次出了8版，发行百余万册。“北方本”与我后来出版的其他著作，在理论体系的拓展和创新方面都有较明显的表现。记得是1978年9月1日至9月20日，编写组在南开大学举行首次研讨会议，我作为主编单位代表主持了这次会议。在这20天时间里，与会同志就编写的指导思想、体系结构和主要观点进行了讨论。

之后，“北方本”于1978年12月初首次出版。该书在许多方面都比过去流行的教材有较大突破：（1）把研究范围限定在当前所处的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而不是不切实际地针对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2）较早地提出了有计划的商

品经济的思想，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作了铺垫；（3）把物质利益作为贯穿全书的主线，这与前苏联教科书和“文革”时期的各种版本相比是较大的突破。前苏联教科书中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归结为没有矛盾的同志式的合作关系；“文革”中的“上海本”则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归结为你死我活的阶级矛盾和斗争，这显然都与事实不符。针对这种情况，“北方本”虽仍然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限定为生产关系的条件下，但提出把物质利益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线显然是有积极意义的，把它作为经济关系的本质内容无疑是一个较大的进步。

在体系结构上既突破了专题排列法，也有别于“四环节法”，而采用了生产、流通、再生产的“过程法”。对过去的专题法大家都不满意，有人主张采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四环节法”来安排理论结构，我主张“北方本”采用“过程法”比较好。客观地讲，不论是在当时还是今天看来，过程法比环节法更优越些：（1）“过程法”更适合于动态研究。从静态分析的角度看，采用四环节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但社会主义经济是一个运动过程，必须进行动态分析，而一旦进入动态分析，四环节法就显得不够了。（2）以过程法进行分析，也便于运用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采用了过程分析法，建立起严谨而完整的理论体系。在研究对象仍然定为生产关系的前提下，学习马克思的方法论对体系的建立显然是有积极意义的。（3）采用过程法有利于把社会主义生产组织与管理方面的内容吸收进来，使理论内容更丰富。（4）过程法有利于避免环节法的不妥之处：环节法把分配、消费都作为与生产、交换相

列的独立的经济环节来考察，但实际上分配和消费虽然很重要，却没有在生产和流通过程之外构成独立的过程。因此有关分配和消费的内容完全可以分别在直接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中加以分析。比如把生产资料消费和按劳分配放在生产过程考察，把国民收入分配和个人消费放在再生产过程考察，等等。

很显然，“北方本”较之过去的版本及同时期和稍后出版的其他版本来说，确有一些突破之处。80年代前半期“北方本”修订过两次，每次修订在个别章节上都有调整和完善，虽然基本体系和结构不变，但当时的经济理论界对“北方本”还是给予了基本肯定，特别是对该书的主线和以过程法安排的体系结构给予了肯定。

然而，今天来看这部书的理论体系究竟如何呢？应当坦率地说它有突破，但基本上是在旧体系内的突破；有创新，但基本上是旧框架内的拓展。

问：谷老师，您能取得今天这样丰硕的学术成就，一方面与您个人勤奋、钻研有密切关系，另一方面以经济学科历史悠久而著称的南开大学，为您创造的学习和研究条件，对您也是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和帮助的。请您给广大的读者朋友（尤其是年轻读者）介绍一下享誉中外的南开经济学和经济研究所的情况。

答：在中国经济学研究和教育史上，南开经济学是颇有特色的一个流派。下列事实应该说是无人能够否认的：在中国高等学校最早设立商学院，正式命名于1929年；在中国最

早设立经济学院，正式命于 1931 年；在中国最早成立专门经济研究机构—南开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正式成立于 1927 年，1931 年改称南开经济研究所；在中国最早且成批连续培养经济学硕士学位研究生，从 1935 年至 1950 年共招收 13 届 60 余人……也许还有其他第一，本人未一一考察，但仅从以上所列举的几点已不难看出，南开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的教育史上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

让我们先把目光聚焦在私立时期的南开大学，那是南开经济学最为辉煌的时期之一。说这个时期的南开经济学是中国经济学的一支奇葩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按照南开大学创始人、第一任校长张伯苓先生“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的基本办学思想，南开大学创立之初，即设置有商科。此后不断增聘教员，革新课程，扩充系所，规模渐大，成为南开大学之支柱学科，也是区别于其他大学的最具特色之处。

谈到南开经济学，就不能不提到何廉，因为南开经济学科的繁盛就始于何廉教授来南开任教。1926 年 7 月，获得美国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的何廉受张伯苓之邀到南开大学担任财政学和统计学教授，并先后或同时担任经济研究所所长（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主任）、经济系主任、商学院院长和经济学院院长，而经济研究所则是他的最得意之作，被称为南开大学得以名扬海内外的“两宝”之一（另一“宝”是化学研究所）。

何廉被他的密友和挚交方显廷称为“一个天生的领导者、设计者和组织者”，但他更是西方经济学理论教学和研究中国化的先驱。早在美国读书时，何廉就有一个理想，即按照伦

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模式，在中国建立一个研究所。仅仅在其回国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就初步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建立了中国第一家专门的经济学研究机构，同时也是中国第一家非官方的、私人社会科学研究机构。

何廉主持的经济研究所的研究核心是进行西方经济教学和研究中国化的工作，这一工作在中国首开先河，它不仅树立了何廉在中国经济学界的权威地位，也使南开经济学和经济研究所享誉海内外。

由于聘任的人员兼作教学和研究工作，二者的质量都得到提高。当时中国许多大学的教师，由于教学负担沉重而无暇从事研究工作。有些教师教学内容长期不变，还是在外国当学生时所学的一点东西，就是做些研究工作，也多是从书本到书本，很少有机会到实地去调查。另一方面，由于兼做教学和研究两方面的工作，他们的薪金收入得到提高，一些从国外名牌大学得到学位的中青年学者加入到经济学院的教授队伍中来，除了先期来南开的耶鲁大学博士方显廷外，其他如哈佛大学的丁佑和吴大业，耶鲁大学的张纯明等等。

1946年南开大学自西南联大复员后改为国立，并将战时的法商学院按照英国伦敦大学的制度改组为政治经济学院，该学院在满目疮痍的南开校园中首先站立起来，其中的经济学科汇集了包括当时并未到校的何廉、方显廷、陈序经、吴大业、蒋硕杰、陈振汉、丁洪范、鲍觉民、傅筑夫、袁贤能、余新民、谷源田、杨敬年、藤茂桐、龙吟、巫宝三、藤维藻、刘国光等“驰名国内学者，或为甫返国之新进”、“教授之多、开课之广，颇为一般同学所向往”。当时的学生人数占到全校的约一半，国内各高校无一有此规模和地位。

我们再把目光转回现实。今日之南开经济学又如何呢？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成为中国学术领域中的显学，经济学教学和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格局。在这种环境下，南开经济学在继承和发扬昔日优良的传统的基础上，正在创造着自己超越前人的辉煌。

建国后，南开经济学科的部分教师流向国外。在之后的院系调整中，又有部分教师被分派到国内其他高校和研究机构，南开大学只保留了经济研究所和经济系，但是，仍有一些学界精英留在了南开，他们成为改革开放后重新振兴南开经济学科的中坚力量。

1983年，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恢复设置，成为改革开放后国内最早的经济学院之一。此时校长是藤维藻教授，院长是我，经济学院顾问是钱荣堃教授。在这些著名经济学家的主持下，南开经济学科发展迅猛。到80年代末，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扩展到六系六所，拥有政治经济学、世界经济、国际金融3个国家重点学科，7个博士学位授权点，汇集了鲍觉民、陶继侃、龙吟、杨敬年、钱荣堃、熊性美、易梦虹、陈国庆、陈荫枋、王继祖、魏埏、郭士浩、陈炳富、李竞能、蔡教箴、贾秀岩等国内外著名经济学家，学生人数占全校1/3。这一规模和实力在当时国内综合院校中是十分罕见的。学术的辉煌有赖于学术队伍的建设，南开的老经济学家们深谙此道。为了尽快弥补因多年运动造成的学术队伍断层问题，以藤维藻为代表的南开的老一代经济学家以战略家的眼光，对后辈学人授业解惑，体恤有加，尤其注重在学术研究中锻炼他们的研究能力，并不断选派他们出国进修学习，以使他们系统了解当代经济学的最新发展。经过10余年的努力，到

90年代，在南开经济管理学科中，一支梯次结构整齐、知识结构较新、研究能力强的教学科研队伍逐步形成，一批在国内有一定影响的中青年学者如朱光华、薛敬孝、高峰、张仁德、逢锦聚、陈宗胜、周立群、马君璐、李维安、冼国明、齐寅峰、柳欣、佟家东、李建民、周冰、刘佛丁、宫占奎等，成为南开经济管理学科发展的主力。20年来，这批老中青配置整齐的研究队伍成果累累，其中大部分处于经济学发展的最前沿。目前，南开经济学科拥有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2个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覆盖经济学全部16个二级学科，每年招收博士生120余人，硕士生300余人，其中博士生每年都有文章在《经济研究》上发表；还设有3个博士后流动站（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和工商管理）和3个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跨国公司研究中心、APEC经济研究中心）、1个国家经济学人才培养基地。在同一学校中同时拥有3个经济类国家重点研究基地和1个国家经济学人才培养基地，这在全国高校中并不多见，足以反映南开经济学科的实力。截至2000年，南开经济管理学科拥有教师近300人，学生人数占全校约1/3，此规模和地位在国内综合院校中也是少见的。

今昔对比，以下三点可能是南开经济学的特色所在：

第一，求实。南开经济学研究讲求务实求真，重视实际调查，是秉承张伯苓校长“土货化”教育思想的表现。所谓“土货化”，即“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且不论二三十年代南开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中国化”，即使在紧张的抗战时期，也没有放松要求，其中关于战时通货膨胀的研究、关于中国农村和粮食问

题的研究和关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成果斐然。对物价指标的编制更是一直没有中断，这一工作直至 80 年代末期，由于统计法的颁布，南开物价指数才停止编制。但务实求真的学风并没有停止，祖国的大江南北、海岛荒漠，到处都留下了南开经济学人调查研究的足迹。

第二，沉稳而不保守。分析一下南开经济管理学科毕业生的去向，不难发现，南开的学生，特别是硕士、博士毕业生及博士后出站人员在高校和研究机构从事教学和研究都占了很大比例，这反映了南开经济学人的另一个个性，即沉稳而不事张扬。这种沉稳并不意味着闭塞和缺乏沟通，而是反映着务实的理论学风和踏实的工作风格。北京大学流传着一句“口头禅”：“北大大门朝南开”，意味每年都有许多南开学子考进北大攻读更高一级学位。北京经济学名人圈中也不乏南开人，如桂世鏞、罗肇洪、马建堂、张春霖、常修泽、刘迎秋、蔡继明诸君。南开经济学人的沉稳更不意味着保守，相反我们是相当开放的。不仅对国外开放，首先向国内开放。创新一直被南开经济学人视为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灵魂。私立时期的南开大学，绝大多数教授都曾在国外获得博士或硕士学位，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一直占据最前沿，这在南开指数的编制中可见一斑。今日之南开亦犹当年。享誉国内的“南开—约克模式”，就是中国最早（开始于 1983 年）与西方著名大学联合培养研究生的模式，这一模式还从此拉开了中国自己培养 MBA 的序幕；中国少有的获双博士学位之一李维安（先后获得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和日本庆应大学商学

）在公司治理研究方面处于国内最前沿，其主持提出的“中国公司治理原则草案”在北京刚一发布，就立刻引起广泛

关注：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双周学术讨论会”和经济学院的“南开经济改革论坛”则已成为国内外著名学者和企业家传播信息的讲坛。在南开经济学院和国际商学院，还有常年客座的国外知名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不断向学生传递国外最新的学术信息。

第三，重情。南开人比较重情。南开在最早的 30 年里是私立学校，经费主要靠捐助，教师待遇较国立大学低得多，但这并没有成为南开吸引优秀人才的障碍。南开经济学科的教师队伍，其学术造诣之深，人员之多，当时国内很多高校难以望其项背，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一个“情”字。何廉刚到南开时的月薪是 180 元，远远低于上海暨南大学请他做教授的薪金。方显廷在刚刚踏上祖国的土地时，就同时有三个待遇优厚的工作在等待着他，月薪为 600 元，但何廉与他作了一次彻夜长谈后，他便毅然放弃了这三份工作，同意担任南开大学教授。在南开近 30 年的私立生涯中，曾有多次外校以高出 1 倍以上的高薪来南开挖人的情况，但南开的教授们并不动心。这就是以张伯苓为代表的“南开人”的人格魅力所在。张伯苓任校长 20 余载，从未增过一次薪，拿的是全国大学校长最低的工资——大洋 40 元，而当时北大、燕京等校的校长工资为 360 元。不论学校如何困难，学校对教师从不欠薪（在北洋政府统治下，公立学校经常欠薪），以便为教师创造一个相对安定的教学和科研环境。今日之南开，老教授对新一代南开经济学人精心呵护，热情提携。由于这种人格魅力，他们的周围仍聚集了一批青年俊才，使得南开经济学 80 多年的优良传统得以继续发扬。

另外，我还想特别介绍一下南开经济研究所。她成立

1927年是我国高校中最早成立的经济研究机构，南开经济研究所〔Nankai Institute Of Economics (NKIE)〕是一所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历史悠久的高层次经济研究机构，1997年庆贺过她的七十华诞。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基本宗旨是，立足于中国的现实经济，汲取世界经济学理论的营养，为中国经济的繁荣昌盛献计献策，为经济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贡献力量。历史上南开大学以研所拥有一支学术水平很高的科研队伍，对中国农村经济、财政金融问题的研究以及所编制的“南开物价指数”，在国内外有很大影响。

自改革开放以来，南开经济研究所进一步发展壮大，已成为国内外一流的经济研究机构和经济学高级人才培养基地之一。截止1997年9月10日，南开经济研究所共有37名教职员工，其中专职研究人员29人，教授（研究员）13人（博士生导师8人）、副教授（副研究员）11人、讲师（助理研究员）5人。目前人员有一些流动。在研究人员中具有博士学位和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有13人。目前，设有3个经济学二级学科——政治经济学（国家重点学科）、经济史（天津市重点学科）和区域经济学，均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并没有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

问：作为我国政治经济学教学和研究领域有影响的教授您对政治经济学这一名称中的“政治”一词作何理解？

答：据我的印象，西方一些经济学家从马歇尔之后，它们多数不采用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经济学讲的内容，尽管理论观点有了变化和发展，但范围还是政治经济学的范围。

我们则是学斯大林的，他用政治经济学，我们也就跟着用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并没有说要强调政治，好像用这个词本身没有这个含义，他们也没有作出了这个规定。只是说这个科学是研究生产关系的。说政治经济学是政治加经济，这完全是一种误解。政治经济学有阶级性的，如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但它之所以有阶级性，并不是由于它用了“政治”这个词，为了要突出阶级性才加上“政治”。这门科学是应该有阶级性的，这在阶级社会里完全可以理解。因为人们把这种意识形态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来对待。你要鼓励人们起来推翻一种制度，拿什么样的思想来动员和组织群众？在早一点的封建社会，有迷信，上天旨意。你总得有一个让大家信仰的东西，使他们为之奋斗嘛！无产阶级进行革命，不能靠迷信。到了近代社会，科学发展已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不能再搞迷信那一套，那么就非得有一套理论、意识形态，马克思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矛盾，得出一个结论，就是生产力一定要突破不适应的生产关系，从而把矛盾分析摆在重点位置上。现在，阶级已基本消失了，只是在局部范围、在某个时期还存在。既然整个社会的阶级消灭了，你再强调这个科学的阶级性，就不怎么太好说得通。当然，你现在要公开这么讲，一些人是很难接受的。邓小平的思想就是把建设放在首位，把搞经济建设作为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这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这就要看哪一种思想更符合客观实际。过去，我们翻来覆去讲阶级斗争，斗来斗去经济搞得很糟，并没有通过阶级斗争真正把社会主义搞成。这就涉及到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基本消灭后，不能片面地强调它的阶级性。我的理解是，建设社会主义走共同富裕之

路是最大的政治（虽然邓小平同志没讲到政治经济学），这就是无产阶级最大的利益所在。无产阶级的利益要求我们把经济建设的理论和知识进行整理和升华以及进行借鉴，得以武装人民的头脑，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干出最大的成就。你说阶级性，这就是阶级性！

问：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传统教材认为是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随着我国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否也应该来一个转变？

答：斯密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财富性质和原因的。萨缪尔逊在《经济学》中列了 7 种，如怎样在稀缺的资源中进行抉择，付出最小的代价，生产最多的产品，分配给社会成员或集团享用等。这就表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不是惟一的，是可以变化的，而且应该随形势的需要变化而变化。

对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研究，是我一直关注的课题，前前后后在论文集、《红旗》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以及一些教材的前言中，多处论及。最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从字面上考察了这个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跟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后来碰到一个问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后面讲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好像是重复的。如果说生产方式就是那五种生产方式，是指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统一，那和接着讲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就重叠了。那么，这个生产方式究竟指的是什么？就引出了这个问题。生产方式在德、俄、英文翻译中有好多意思，如生产方法、生

产方式，可翻成很多词。究竟原意是什么？我找了一两个同志帮助核查马克思、恩格斯的凡涉及生产方式的主要著作都查到了，其意思有时讲的是社会制度，有时讲的是经济系统的生产方式，有时讲的是商品生产，有时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时讲机器大生产是生产方式，难以得出统一结论。如果是指商品生产、机器大生产等含义，这就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重复了。斯大林后来把生产方式理解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制度统一。在社会主义时期，生产关系基本稳定了，政治经济学再研究生产关系已没有什么好研究的了。而大量的现实经济问题等待你回答而政治经济学却又不去研究，所以这样的政治经济学没有什么令人关注的内容，满足不了需要。特别是对经济发展起不了什么作用。所以，从那时起，我就一直想突破原来的框框，研究经济问题，不仅是静态，而且是动态。动态的研究一方面是研究它的运行，一方面是研究其总量增长。那虽涉及到技术问题，但不研究技术问题，只是考虑它使生产加快、规模扩大、加快了扩大再生产，这又引出新问题，如投资方向、产业结构等。这些靠一个生产关系肯定容不下来。所以，我那时就提出，生产方式指劳动组织方式，或生产组织形式。这个定义和现在讲的经济运行基本上是一致的。这就是说不仅要把制度性规定搞清楚，而且要把从微观到宏观怎么运行也要搞清楚。因为经济增长是在运行过程中实现的。1988年我主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通论》时，就运用了这个思想，先研究经济运行及其规律，最后落脚到经济增长上面，除了制度及运行外，经济增长还有一些自己的内容也需要研究。这些在《通论》中大体涉及到了。在经济学中，经济问题，包括经济关系、经济运行、

经济组织等都要研究，研究目的以及最后结论：一个是通过此提高效率；二是把利益分配搞得更合理，即在不和效率发生剧烈碰撞的情况下，使公众的利益关系得到协调。这就是说，保持生产的持续增长、财富的持续增长、社会 and 群众的利益不断增加，这就是政治经济学最后的目标。

进一步讲就是要通过经济的运行和合理的组织，来实现财富的增长和协调分配。再者对现有的资源如何更好地利用，一是要效益最好；二是使各集团得到满意的和过得去的消费，这反过来又有利于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我们追求的应该是这种关系。我们研究经济的，就是要提出最好的资源配置方式、方向和分配方法。当然，你提出的理论，肯定不是单凭脑子凭空想出来的，有的是西方经济中行之有效的，有些是我们经验积累得到的，还要受实践的检验，理论上还要不断充实和丰富。人的认识总是不断接近真理的，只要你创造，它就会越来越接近客观真理。我们现在的的问题是，上层建筑的干预太多，因而产生了一种扭曲现象，使本应花力量研究的问题人们却避开它，去研究无风险、无干扰的问题，于是有些问题就迟迟得不到研究和解决，我想这个问题将来会逐步好一些。

问：经济特区是否应该继续办下去，已经成了一个热门话题。早在 80 年代初期，全国范围内对是否建立经济特区和如何建立曾有很大的争议，我们得知，您曾两度率学生南下考察，对深圳特区的情况作了分析，请问那时您主要作了哪些判断？

答：俗话说“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我所从事的是经济学理论研究，但我深知，理论是现实的抽象，离开实际的理论只不过是一堆文字的堆积。面对改革实践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要求我以一个理论工作者敏锐的洞察力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力求站在理论的高度来剖析这些现实问题和矛盾，进而探讨有效的解决途径。

特区经济是一种新型的过渡性经济。

经济特区，特别是深圳经济特区，以特有的速度迅速发展起来，并以其崭新的面貌和旺盛的生命力引起了国际、国内各方面的关注和重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人们可能不会再怀疑，这是改变传统的计划管理方法，进行市场取向改革的成功之作。然而，曾几何时，不少人对这种社会主义国家的某几块地域进行的市场取向改革又是抱有怎样的怀疑和恐惧态度！这对于一些不了解当时背景的青年人来说，恐怕很难理解。

80年代初，经济体制改革尚处于起步阶段。由于我们长期以来处于一种封闭的经济环境中，再加上“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的影响，在人们的心灵上不同程度地患有某种“恐外症”或“恐资病”，不敢同外国打交道，在对外经济交往中缩手缩脚、顾虑重重，说穿了，无非是怕走偏了方向，混淆了界限。这种恐惧症显然与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又密切相关。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最早可追溯到1516年莫尔的著作《乌托邦》，算来已经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却只有不足百年的经历。正确认识经济特区，与其说有利于加速经济特区的建设，勿宁说更有助于剔除人们的社会主义空想，进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

重要课题作出更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回答。

1981年和1984年，我先后两次率领我的研究生南下深圳考察，编著了《深圳经济特区调查和经济开发区研究》一书，于1984年9月由南开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对特区开发建设、经济管理体制、引进外资和技术、计划和市场、对内联合、劳动和工资、产品内销和外销、引进外资银行、物价和人民生活，以及典型企业等多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考察和研究，为特区加大改革力度，进而继续开放沿海地区，开办经济开发区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特区经济到底是什么性质，这是特区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当时理论界主要存在几种观点：（1）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2）新民主主义性质；（3）国家资本主义性质；（4）社会主义国家中的资本主义经济；（5）社会主义国家管理下的、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主要成分的多种经济并存的综合体。特区经济作为一个新生的而又复杂的事物，当它尚未获得充分发展，其内部矛盾还未充分暴露出来时，要找到一个为大多数人所公认的、能概括特区经济性质的新范畴，的确是很难的，因而存在各种不同的认识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绝不是说，这一问题就完全认识不了，从而可将其束之高阁。我认为分析特区的经济性质，最重要的是考察特区的经济成分。深圳经济特区的经济成分主要有：（1）社会主义国有经济；（2）社会主义集体经济；（3）外商独资经济；（4）中外合资、合作经济；（5）个体经济。此外还有各种形式的内联企业。其中有外商独资和中外合资、也有资本主义经济，而在引进外资和技术的企业中，大多数属于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因此国家资本主义构成特区经济的主体。可见，

把特区经济概括为社会主义性质或资本主义性质的观点，都不够全面。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本身从来就不是一种独立的经济形态，它们不是依附于社会主义经济，就是依附于资本主义经济。因此，说特区经济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同样不周全。“综合体”一说虽然比较具体和全面，但欠明确，给人以模糊的印象，甚至可以说，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明确回答特区经济的性质问题。

我当时指出：“特区的经济性质可以表述为：社会主义国家管理下的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主体的新型过渡性经济。”这个表述首先明确社会主义国家创办的特区经济不同于非社会主义国家创办的特区经济，它必须接受社会主义国家的管理。更重要的，这个表述表明了特区经济的过渡性质。特区经济既有社会主义因素，又有资本主义成分，而且国家资本主义居于主体地位，尽管这种格局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保持稳定，但从长远看，它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定要实现两种成分的合一，即向社会主义过渡。不可否认，此表述也有一定的局限性。而我对特区经济性质的分析无疑说明，特区经济具有过渡性。随着全国范围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特区将最终走向尽头，除非出现新的特区频型，否则不会再“特”，但它对内地改革的启示作用不容忽视。

问：众所周知，随着西方经济理论的不断传入和国内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前几年，国内就有不少知名学者在研讨“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大问题，而据说近两年您也正致力于构思中国转型经济学的课题，并且在最近上海复旦大学举办的一次高层研讨会上作了较详细地阐述，请给大家分

享一下您最新的研究成果。

答：在 90 年代中期前后，一场引进西方经济理论的新高潮出现了。这期间引进的不限于西方主流经济科学教科书，包括新制度经济学，新经济增长理论，新贸易理论，宏观经济理论，以及企业经济理论在内的各种流派和各种专门的理论在很短的时间内都一股脑地涌了进来。于是在中青年学者中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被广泛地运用开来。大体上以 90 年代中期作为一个分水岭，它不仅同原有的用传统研究方法分析中国问题的学者分庭抗礼，而且大有逐步取而代之之势。这种具有尖锐分歧的经济理论动向，不可避免地会牵动和引发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对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不同看法和争论。于是一场“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大辩论便断断续续地展开了。

这场大辩论大体上是在 1995 年发端的。

在此之前，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也曾出现过，但那时不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远不及这一次。而且这一次大讨论，是在客观需要尽快地解决现实难题的背景下开展的，因此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这一讨论一直延续到上世纪末。在如何改造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问题上，由于认识上的分歧巨大，至今并未取得共识。

如果把讨论中的各种观点加以粗线条地疏理分类的话，不外乎有下几种观点：一种观点是不需要再创造什么“中国的经济学”。这种观点认为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就是现代经济学，此外没有必要再撰写什么经济学。人们完全可以利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研究中国经济问题，

有什么必要劳而无功地再去搞什么新的经济学呢？第二种持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只能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西方经济学的方法固然有可以借鉴之处，但由于其基本理论观点是错误的，所以是根本要不得的。至于在这里他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究竟指的是什么，由于他没有提供现成的蓝本可供审视，因此很难对这种观点进行准确地把握。目前只有在教学中广泛使用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又很难说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三种观点是：一方面承认第一种意见有一定的道理，另一方面又认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同美英等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有很大的差别。作为发达市场经济运动规律的理论概括的西方经济学即使都是正确的，也不宜不加分析地照搬到中国来，这之间还需要有一个中间环节即适合中国国情的问题。我在几年前发表的文章中基本上持这种观点。而《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尽管还很不成熟，但我却是把它作为实践这一要求的实验品而公之于世的。

近些年我翻阅了一些有关的文献资料，并经过反复的思考，觉得过去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虽然原则上没有大的偏差，但思路还是显得偏窄了些。下面我谈一谈近一年来的思考，供诸位同仁批评和参考。在谈论主要观点之前，我认为有必要把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这两个被混用的概念在本文中使用的角度先做个界定。为了不使所谈问题因概念混淆而纠缠不清，我在这里把马克思的侧重研究生产关系的理论体系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世界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奉行的以研究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为主要内容的理论体系叫经济学。

我认为回答“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问题，可以有两种并不互相排斥的思路。一条思路是循着人们通常理解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路线继续走下去，其中包括按照唯物辩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剖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马克思、特别是列宁在当年的历史条件下作出的某些具体结论事实证明并不完全符合后来实践的发展，这些可以抛弃。但是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基本矛盾所作的科学分析却并未过时，只是由于条件的变化、矛盾的尖锐程度和表现形式有所缓和而已。认真地分析研究现阶段社会阶层之间的地位、利益差别和矛盾及发展趋势，对于我们认识当前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特点以及制定调节矛盾推动社会进步的对策无疑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然而同样不容忽视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一般所谓的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是有差别的。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同样也有必要创建以研究资源配置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学。上述这两门学问可以并存，并互相补充。

另一种思路则是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着眼经济发展和资源配置的经济学融为一体，创建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它既包括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生、发展和变化，又包括这一时期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基本分析框架。这种处理办法表面看起来内容显得繁杂一些，但它的优点却是可以以综合性的经济基础理论的身份面对社会各种重要经济问题并维持它自己在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领域的基础理论的地位。这样，它既可以从上述诸应用经济学科吸取理论发展的必要营养，反过来又可以向各相关经济学科提供理论的支持。

我在这里说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准确地说，就是转型期

中国经济学，它要求从中国当前这个阶段的实际和特点出发，运用实证的和规范的研究方法，抓住转型期一些重大的具有经济理论意义的问题进行深入地分析研究，得出其中具有规律性的结论，用以指导我们继续前进的方向，并逐步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独特理论体系。研究转型期经济问题不仅是现实的需要，而且也具备了可以研究的客观条件。

问：那么，您认为转型期中国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应如何构建？

答：从经济角度考虑，所谓经济转型我认为主要涵盖以下三个方面的转型。第一，经济体制的转型，即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经济制度的调整（由单一的公有制调整为多元所有制并存的混合经济制度）。第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即由粗放的数量扩张型的增长方式逐步转变为集约的以效益为中心的符合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增长方式。这个过程是以技术进步为先导，以经济体制转型为基本保证，以经济结构调整为关键的各种因素转变导致的综合性结果。第三，则是以前两个转型为前导的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并加速城市化过程。这是经济和社会紧密结合的又一个转型过程。具体说，这是由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村生活方式转变为由现代工业支撑的和现代科学文化装备起来的现代城市经济体和生活区。这样一种变革是消灭城乡重大差别的一次飞跃。

此外，在实现经济社会重大转型的过程中，我国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过去经过的途径不同，政府的经济职能不是全

面萎缩，而是在这个过程中处处都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推动。因为单纯依靠市场的自发运作，这种转型期会拖得很久，有了政府的推动则好像有了一个加速器，会大大缩短这个转型。所以，研究政府如何正确的发挥作用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课题。同样不可忽视的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配合功能。一个健康的市场运作机制的建立，离不开市场各个主体之间的诚信活动，先进技术的应用也离不开人们的创新意识，而城市化过程更是需要人们树立共同富裕的整体观念，这一切离开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都是不实现的。所以，在转型经济学的研究中，要把视野更放开一些，不能只局限于孤立地研究经济领域的问题，尽管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是中心环节。

归结起来，政治经济学如果仍按照侧重研究生产关系这个主题，尽管有它的作用和意义，但在经济学科领域中它不再拥有经济学科理论基础的地位，充其量它只是经济理论基础的一个侧面。西方的现代经济学形成的一套研究思路、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对我们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很有启迪的，我们要好好学习和借鉴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并不是植根于我们这种处于发展阶段的社会经济生活，所以它也不能简单地拿来充当我国诸经济学科的理论基础。它如要起这种作用，尚需进行若干修正。如上所述，转型经济学从理论和方法看，它不是原创性的，因为它基本上是从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中吸取营养的。所以，从经济学科大排队来说，它应列入第二层次的经济学范围。但具体对中国而言，由于它研究的对象是从我国当前的实际出发的，它包罗了中国转型期各种重大经济理论问题，从这个角度说，它又是最具基础性质的经济学科。

问：谷老师，请再具体分析一下转型期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及发展经济学等学科的关系。

答：对于以“马克思经济理论为指导”的提法，我认为是不准确的。众所周知，马克思并没有提出一套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列宁虽然主张社会主义社会应该保留政治经济学，但他没有来得及进一步阐述他的主张，而真正提出一整套新经济理论的是斯大林，即他在 50 年代初发表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以及在他指导下由苏联科学院集体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社会主义部分。但是事实证明，这些以计划经济体制为基础背景，并揉进一些主观推导的所谓经济理论是经不起实践的检验的，必然会被社会所抛弃。这样一来，所谓“马克思经济理论为指导”对社会主义转型期来说就没有实际意义。我认为，对于中国转型期经济学来讲还应该提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更为准确地说应该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为指导。这里讲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就是唯物的、发展的、辩证的观点和方法。它对指导我们的研究工作、构建理论框架、提炼理论观点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从另一方面看，现代西方经济学包括非主流经济学，大体上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发达的市场经济运行的轨迹和问题。尽管它没有揭示深层次的社会矛盾，但对于理解经济的运行过程还是很有作用的。对于正在步入市场经济轨道的中国来说，简单地搬用它固然不行，但重视借鉴其某些思路、观点，特别是定量分析的方法，却是很必要的。这些理论虽然与以

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是一回事，但却并非绝对排斥，因此，应该客观地，慎重地处理二者的关系。

发展经济学对中国转型经济的研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许多共同的问题需要研究。但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往往以一种固定的模式来解释发展中国的经济问题，即以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为背景，把发展中国家所遇到的问题作为市场不完善或市场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虽然许多经济学家强调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但主流经济学的最大缺陷就在于其理论基础是技术关系，而不能把社会关系和政府的作用有效地结合到它的理论分析中去，从而不能有效地解释现实。中国经济在过去 20 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制度变革和政府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其经验是值得总结的。强调“转型期经济学”可以使其区别于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即这种研究在方法上与主流经济学是不完全相同的，社会关系或经济制度与政府的作用将作为理论的基础部分和研究的出发点。

因此，转型期经济学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把社会关系和政府的作用纳入到经济分析中，以表明市场经济在不同经济体制下的区别与运行，这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也是当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例如，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通货紧缩表明了目前我国的经济体制存在着某些缺陷，随着中国加入 WTO，经济制度将产生较大的变动，这些问题并不能在传统经济学中找到答案，而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来解释，转型期经济学的研究恰恰在于建立一种解释这些实际问题的理论基础。

另外转型期经济学目前需要研究的两个问题是：经济体

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

当然，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这使得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强调转型期经济学的意义也正在于针对中国经济的特殊性，借鉴西方现代经济理论的研究成果，逐步建立起符合中国现实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问：现在纵观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已实行市场经济，但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作用，它应扮演的角色，以及对经济的干预程度一直有较多的争议。

您对我国市场经济下的政府职能有何见解？

答：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无疑是理论上和认识上的重大突破和进步。但同时必须看到，作为一种改革目标或经济运行模式，仅仅明确其“市场经济”的规定性是不够的。现代市场经济不仅仅强调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调节作用，而且内含有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可以说，政府宏观管理程度和形式的差异已成为各国不同市场经济模式的标志。

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需要一定的宏观环境。政府的主要任务就是保护市场经济的效率，实现社会的安全、稳定、公平和正义。有人曾将现代市场经济比作一架充满活力的飞机，政府则好比飞机的驾驶员，手中握有法律和宏观经济政策的操纵柄。在必要时，政府运用这些手段，控制飞机的运行方向和速度，以达到预定的目标。这个比喻虽不十分确切，但是政府的这些起码的职能，决不是推论出来的，而是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市场万能论”源于亚当·斯密“看不见的

手”的学说，至今才 200 余年，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从 1640 年资产阶级革命算起已有 350 年。资产阶级国家在经济上扮演的角色早已不是“守夜人”了。既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强调政府的经济作用，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有什么理由摒弃政府的宏观管理呢？因为市场机制本身就存在着局限和不足，即“市场失灵”的问题，因此政府的作用是不容抹杀的。

我认为，由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总是“微观经济运行的市场化”与“政府宏观调控”二者的有机结合，而政府的宏观调控又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可塑性和多样性，直接影响经济运行的效率。因此，中国在确定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选择之后，在实践中仍然面对着如何具体选择市场经济模式，进一步明确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和方式问题。惟有如此，改革的目标模式才可以说得到了完整、准确的落实。我认为，就中国的现状来看，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多元化和多层次的格局依然存在，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发育还远不成熟，从这个角度讲，完成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将是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这就决定了中国当前市场经济模式虽从总体上也应该是市场起基础性调节作用，但政府的作用也须认真地加以研究。

政府的角色应该如何定位呢？我认为可以从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经验中得到某些启示。总的来看，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政府一般对经济的干预较弱，而相比之下，亚洲国家（如韩国日本等）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则强烈得多，形成所谓“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经过战后几十年的发展，日本、德国的经济已后来居上，韩国、台湾地区等急起直

追，而美、英、法等国在发展速度上则相形见绌。虽然不应把经济运行的效率完全归结为体制模式的差异，但体制模式所起的作用却是不容否认的。

考虑中国的实际状况，借鉴国外的经验，我认为中国目前一段时期似应选择近似“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我作出这样一个判断的主要根据在于：（1）我国大陆与日本、韩国、台湾地区文化背景相同，历史经历相似，他们的成功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为我所用；（2）从目前来看，大陆与台湾地区、韩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尽管有相当差异，但在50年代经济发展的起点却基本相同；（3）我们是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发展市场经济的，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可以为政府推动、促进和引导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物质手段，我们有可能充分利用政府手中的这一个优势，创造出更高的速度和效率；（4）在我国，政府与企业长期以来就有紧密捆在一起的历史传统，为了不致一放而不可收拾，政府在目前条件下多发挥点作用是有其必要性的。这也许是推行近似“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的一个重要历史背景。但同时必须指出，决不能把“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与传统体制下的行政干预混为一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无论多么强烈，都只能是在维护企业独立地位的前提下，以协商、劝说、诱导以及利用制度法规等方式进行。而且，“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也只能是近似的，不能原样照搬，其具体形式尚有待于结合我国的国情作出进一步的探索和总结。

很明显，政府有必要在“看不见的手”不那么有效的场合下伸出“看得见的手”，以使市场经济运行得更稳定、更有效率。然而遗憾的是，在现实中一些领导者们往往容易忘记

或忽视了“看得见的手”功能的有限性，常常想有所作为却弄巧成拙。我的看法只是应顺应市场经济运动的一般规律：“看得见的手”只有顺应“看不见的手”运行的规律才能驾驭市场；“看得见的手”只有谨慎地使用才能有效地发挥功能和作用；“看得见的手”只有知道哪里应当“无为”才能有所作为。

问：现在举国关注的国企改革又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必须打攻坚战，不少专家学者认为目前国企改革的核心问题在于所有权结构的改革和深化。对此，您有何见解？

答：继续深化所有权结构的改革是解决国有企业现存问题的主要课题。但要完成这一步骤仍需要采取一系列相关的制度安排，以期通过依赖性路径取得报酬递增的结果，并藉此推进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1. 继续降低进入国有企业的门槛。国家所有权结构的根本改变要有多元化投资主体的进入。因此，继续降低国有企业的进入门槛应是一个可行的对策。

2. 健全和深化国有企业的退出制度。目前在国有企业退出问题上需要有一定的观念上的突破和制度创新。首先是在退出范围的领域。其次是国有企业退出的战略步骤选择。政府在国有企业的退出过程中更要注重策略的选择。应在企业或产业发展战略的制定中包含对企业或产业生命周期的预测，及预防衰退，强化竞争能力的战略安排，包括退出时的资金储备。

3. 建立相对稳定的国有财产代理人队伍。

国有企业的改造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改革的政策措施之外，政府的宽松环境、良好的产权市场竞争环境。以及国际的和平环境等都要配套进行。为此，我们必须抓住加入WTO的有利条件，全方位地为国有企业改革深化创造更好的机遇。

问：古今中外，各方人士对科学的经济学应具有的特性有不同的见解，各见仁智。那么，就您看来，经济学的主要特点有哪些？

答：经济学有两大特征，一是科学性，二是致用性。作为科学的经济学理论至少应具备这样三种性质——可检验性、逻辑一致性与可积累性。

根据科学哲学的原理，科学有别于巫术之处就在于它能够满足可检验性。科学的可检验性，不仅要求用经验事实验证理论的结论，而且要求针对理论的逻辑加以检验。显然，一种能够满足可检验性的理论必须首先具备相应的前提与假设。从某种意义上说，缺乏假设条件的理论无论在经验上抑或在逻辑上均无法得到检验；因为对此人们不可能作出“相符”与“不符”、“对”与“错”的明确判断。从科学的意义上讲，并不存在无所不包、无所不适的绝对真理。任何科学的理论，其结论只有在相应的前提假定下才能成立，而且随着假设条件的变动，相同变量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生改变，其结论自然也就有所不同。科学理论正是随着前提假设的变动以及分析工具的改进而不断演进和发展的。如果某种理论自称对于事物已穷尽了认识，则只能证明这种理论并非真正

的科学。同时应当指出，科学理论的可检验性，不能狭隘地理解为仅仅是关于理论结论的经验证实，而且应当将它视为具有可被逻辑检验的属性。假如某种理论在逻辑正确的前提下而其结论与经验事实不相符合，仅靠这一事实本身尚不足以证明该理论的非科学性。经济学家或许正是利用这个契机将科学的经济学理论推向前进的。

逻辑一致性是科学的经济理论的重要特征。当某种经济理论的结论与经验观察不相符合时，人们自然要对以下两个问题作出判断：（1）假设条件是否远离现实；（2）理论逻辑的一致性是否遭到破坏。如果问题仅仅出在前者，则理论的科学性尚未被充分证明已丧失；只要针对假设条件作出相应的修正，结论与事实之间的矛盾便可得以化解。反之，假如理论的逻辑一致性未能得到实现，该理论的科学性就应受到怀疑乃至否定。经济理论的逻辑一致性的获得，必须满足下列若干条件：（1）概念的界定要清楚；（2）基本理论和原理的应用要准确；（3）文献的引用要恰当；（4）概念的涵义要前后保持一致；（5）推理要正确；（6）表述要规范。假如其中任何一项条件不能得到保证，则理论的科学性就应受到质疑。一般说来数学模型的应用能够较好地满足上述条件，因而能够较好地证明和显示理论逻辑的一致性。而这正是现代经济学重视使用数学工具的重要理由之所在。

经济理论科学性的另一特性是可积累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具备可检验性与逻辑一致性条件下经济理论所呈现的必然特点。可积累性具体表现为经济理论之可被引用与发展的特性。某种严格假定下逻辑一致的新理论一经提出，便可成为一种知识而加以应用。当我们在注释中标明某人某作

品的时候，不仅证明了前人的贡献，而且同时说明了重复研究的无谓。更重要的是，某种理论一旦被接受而成为“公共物品”，它便注定了自身要被超越与发展的命运。这种发展并非表现为理论结论的简单否定与贬斥，而是反映在发展了的理论所涵盖的原有理论的某些成分。这样，科学理论的可积累性无疑再现了“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场景。

经济学的另一个特点是其致用性。经济理论的致用性可以表现为两类社会功效——一类是直接的社会功效，另一类是间接的社会功效。直接的社会功效就是经济理论对社会经济现象所具有的解释、预测与评价功能。某种经济事物的客观存在必然会植根于一定经济变量间的相互作用；这种事物内部的本质关系只有通过必要的抽象才能加以把握。而正是科学的经济理论才能为此提供某种可能。一般说来，在逻辑一致性的前提下，理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取决于假定的设置与变量的确立。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假定越贴近于现实，理论的解释力与预测性就越强。若从另一角度来看，假定越具体，则理论的适用性就越窄。此即所谓强假定导致弱定理。

经济理论间接的社会功效，是它对于人们的认识水平以及科学理论自身的发展所发挥的作用。人们之所以需要经济理论，一方面是因为它能揭示经验观察无法导出的经济关系实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它可以为人们观察与分析经济现象时提供相应的认识基础、思维角度与逻辑框架。有了经济理论，人们将会节省思维的时间与精力，并提高思维取向的准确性与效率。因此，某种理论可以因假定条件的历史性局限而暂时丧失直接的社会功效，但它的间接社会功效——理论

价值却不应由此而予以低估。所以，我们必须从总的社会功效视角来理解科学理论的致用性。假如单纯以理论的直接社会功效为尺度，就有可能滑入狭隘的实用主义的泥潭。历史事实表明：在实用理性的支配下，技术性知识往往易受到人们的重视而科学性理论则易被人们冷落。从长远的观点考察，最终的结果必然是技术发展的停滞（因为缺乏科学理论的支撑）。因此，历史的教训应当而且必须借鉴。

问：谷教授，最后请您谈谈建立中国的经济学的基本前提和迫切性及具体措施。

答：从经济学本身的发展逻辑来看，社会实践的需要、经济运行与发展过程的内在矛盾暴露的程度、理论积累的深度，是经济学实现变革的三个客观的基本要素。中国经济学理论落后于改革与发展实践的现实，意味着经济学在中国将要实现理论体系和内容上的大变革。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实践在中国才刚刚开始全面展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过程中的许多矛盾尚未完全暴露充分，转轨过渡时期的经济运行中新旧体制之间的矛盾还交织在一起，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矛盾、规律和机制也很难在短期内有十分清晰的认识，从而适应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需要的逻辑一致的理论经济学体系自然也就难以在短期内完成。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和经济建设的需要迫切要求经济理论的指导，而此时学校也必须满足教学之所急。况且，条件的成熟也是相对的。因此，没有必要等到条件完全成熟后再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学。

那么，目前应该如何做？理论界有两种意见：一是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框架内揉进有关市场经济理论；二是主张就以现行的西方经济学作为基础理论。对于第一种主张，我们认为这种努力虽有可能在现有的状态下取得某些进展，但从基础理论本身的构建看，却难以取得理论体系上的突破。因为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与理论之间的矛盾已越来越显示出，市场经济本身的基本原则和运行规律不会因国别的制度不同而有根本的区别，社会制度的差异可以导致市场经济的特点表现形式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异，而市场经济运行本身的基本规律则不应发生改变，否则即无市场经济可言。但由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是以计划经济为支柱，在大思路上与市场经济理论体系是相对立的，牵强附会地把二者撮合起来显然难以实现理论上的突破和构建起全新的逻辑一致的理论体系，相反，由于逻辑的混乱反倒有可能阻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取得实际的进展。对于第二种主张，我们同意西方经济学应当成为研究我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但简单地以西方经济学作为中国经济学科的理论基础却恐怕难以成立。这是因为，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本身是建立在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既定前提之上的，现存制度或明或暗地作为前提被肯定下来。选择现代西方经济学作为基础经济理论的首要难点是在制度的前提方面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障碍。同时，中国特殊发展阶段的经济结构和历史沉淀，使西方经济学理论尚难以完全与中国经济运行的现实直接衔接，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不断深化的现实已经给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提出一系列难以回答的问题。因而试图简单地直接利用西方经济学代替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来推导出政策性结论，

恐怕也就难免在现实中碰壁。

我们的看法是，在目前条件下，中国经济学重建的关键在于研究重心的转变和新的理论生长点的培植与发展。目前应将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和市场经济运行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上，注意新的理论生长点的发掘，不断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提出新观点、形成新的理论思路，只有在理论上经过相当的积累并形成系列，再来审视已有理论经济学内容和体系，重建中国的理论经济学大厦，这才是获得突破性进展的有效途径，这也是中国的经济学能否为现代经济学发展作出贡献的关键所在。从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看，除了对制度进行定位和进行经济学分析外，重要的是把经济运行（包括微观经济运行与宏观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置于突出位置。在这里，现代经济学、特别是发展经济学所总结出来的市场运行和发展的一般规律都是可借鉴的，只是要恰如其分地把它应用于中国经济的特殊分析中。

从科学的角度看，虽说经济学不应该是“有国别的”，但是由于中国的社会制度、发展特点决定了在汲取现代经济学理论思路的基础上，可以而且需要建立适应中国国情的经济学（或称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现实已经给中国经济学者提供了经济学理论创新和重建中国经济学的历史性机遇。

积极探索，实现理论创新，重建适用于中国的经济学是迈向 21 世纪中国经济学家的光荣使命，但这项艰巨又复杂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经历较长时期和众多经济理论工作者的艰苦劳动过程。

因为就经济学本身的发展逻辑来看，社会实践的需要，

经济运行与发展过程的内在矛盾暴露的程度和理论积累是经济学实现重大创新的三个基本前提。中国经济学理论落后于改革和发展的实践的现实已经提出了经济学在中国要实现理论体系、研究内容和方法上创新的任务。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认为进行理论创新的突破点可以集中于两个方面：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

制度是影响人类经济行为、资源配置与经济绩效的最基本变量。

西方经济学中之所以长期忽视对制度的研究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制度背景——竞争性的市场制度是基本稳定的，制度创新或制度变迁的发生并不频繁和剧烈，因而也就较少被人关注。而中国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可以预计在今后的几十年内，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不断加快，必将伴随着一个制度创新浪潮的掀起。处在这一浪潮中的中国经济学家们既有丰富的材料和案例可供研究，又有大量前人的理论可供借鉴，因此完全可以期待在这一过程中会有大量的理论创新涌现出来。目前，中国经济学界中已经初具规模的关于过渡经济学的研究就是这些创新的发轫。从国际上看，迄今还没有一个国家顺利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国作为一个转型的大国，其制度变迁的经验无疑将具有世界性意义，而从这些经验中提炼出来的新理论也将会产生世界性的影响。

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另一个生长点是经济发展研究。

“发展是硬道理”。实现经济高效快速发展是当前乃至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活动中的主线，改革说到底也是为了促进经济的迅速增长。因而抓住了发展问题，特别是可持续

的发展就抓住了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同样，抓住经济发展研究也就抓住了经济学领域最重要的理论生长点。

总之，时代呼唤着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新，这也是中国经济学家们面临的神圣使命。只要遵循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吸收人类已有的文明成果，一点一滴地积累总结经验，在理论创新上既不要“惟洋人之马首是瞻”而妄自菲薄，又要避免盲目的妄自尊大和拒绝接受世界学术发展的有益营养，若能如此，我预计适用于中国的经济学的全面繁荣与发展就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对话(第六辑)》

斯密、李斯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
集大成者——朱绍文



朱绍文先生近照

朱绍文简历

朱绍文，1915年1月26日生于江苏镇江。1934年9月在上海高中毕业。1935年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1938年毕业于。1939年以优异成绩考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经济学科，1941年底毕业后在大河内一男博士的指导下进入大学研究院攻读博士课程，研究经济理论史。1945年初回国。1946年历任上海沪江大学城中商学院、复旦大学经济系经济思想史教授，上海法学院、光华大学等校西洋经济史、工业政策教授。1950年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专门委员。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78年以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等。1989年起任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社会科学院客座研究员。年获日本创价学会哲学研究所“东洋哲学学术奖”。1989年以来，任北京大学现代日本研究班客座教授，全国《资本论》研究会顾问，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名誉会长。1992年任东京大学经济学部客座教授。1992年由日本 SAI-SON 文化财团东大同学的帮助，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的批准下，设立了“日本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任第一届理事长。曾任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及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政协六届、七届委员、常委等，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中央咨议委员会常委，中华全国日本经济学副会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

主要著作：有《F. 李斯特国民生产力理论的研究》、《马克思货币理论的基本问题》、《日本经济与日本经济学家》、《现代经济理论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成果与课题》（1992年东京大学出版社）、《微观经济分析》（合编，1996年商务印书馆）、《经典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2000年北大出版社）。在主编的季刊《日本市场经济》上，发表研究论文十余篇，翻译有：W. 罗雪尔：《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1980年商务印书馆）；林直通：《国际通货危机与世界经济危机》（1976年商务印书馆）；堤清二：《消费社会批评》（1992年经济科学出版社）；植草益：《微观规制经济学》（1998年中国发展出版社）。并主编：《现代日本社会科学名著译丛》六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日本市场经济与流通》（1995年经济科学出版社）等多种。翻译：宫崎义一：《泡沫经济的经济对策》、大河内一男：《过渡时期的经济思想》、大家久雄：《股份公司发展史论》、金子胜：《经济全球化与市场战略》、菊地悠：《日元国际化——进程与展望》、祖田修：《农学原论》。

问：朱老先生，您是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老前辈之一，又是国内知名的日本经济问题专家，请简单谈谈您早年的生活情况。

答：我生于五四运动的前夜，出身于一个城镇工商业者之家。从小，我就看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残暴，地方土豪劣绅、地痞流氓、军阀对老百姓的欺诈掠夺。记得上小学时，曾上街迎接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声，深深印在心中。国家的现状，我家庭所遭受的压榨，促使我逐步走上救国救民的道路，走上研究社会科学的道路。

15岁的时候，初中还未念完，我就到上海报考高中，住在我三叔店中。这家店铺是当铺，开在上海纱厂集中区的曹家渡。我每天看到女工上班下班，每天看到贫苦工人来当铺典物的情景。一天下午，我在一个书摊上看到一本《独秀文存》，上面有陈独秀与穆藕初的论战文章。陈独秀的文章吸引了我，我当即买了回来细看，并郑重保存。这本书以后随我出国，也随我进东京宪兵队监狱，又随我回国。直到“文化大革命”，我在劳改农场时，家里孩子把这本书和其他外文书当废纸卖掉了。这件事，成为我终生的憾事。因为这本书引导我走上了研究新兴的社会科学的道路。

我的父母并没有对我的学习有过什么指点。因我是长子，从小和父亲相处的时间多，父亲整日忙于“做生意”。我只记得有一次他深有感慨地告诉我说，任何人凡要做成一件事，要像“发疯”那样，专心致志。这是他人生的“总结”，给我的印象和影响也最深。

问：作为当今中国少数的日本经济研究专家，您所取得的学术成就一定与您留学日本 12 年打下的学术功底密切相关。请回忆一下您当年在日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

答：我在上海念完高中后，校长老师们都希望我能学有所成。因为他们大都是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留学过日本的，便鼓励我去日本留学。当时我的家境没有力量供我去美国留学。当时一块日元等于一块大洋，在日本念书和在上海念大学费用差不多。父亲同意我去日本念书，两年后回国。谁知我去日本一念就是 12 年。

日本的学制和我国不同，高中毕业不能投考大学，必须进“高等学校”三年，类似进大学的预科，是一个必须经过的阶段。1934 年夏，我高中毕业后，为了赶上日本学校 9 月开学，就在 9 月初由上海乘长崎丸经过三天三夜到达了日本长崎港，再乘火车去东京，花了整整四天时间。我很怀念在上海三年高中的生活。在这段时间里，英文和日文的基础知识我都学得很扎实，所以后来到了东京，和其他留学生相比，感到轻松多了。在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和研数学馆，学了半年左右以后，很幸运，我考取了在日本被称之为“秀才学校”的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以下简称“一高”）。在这里的三年住宿的学习生活，使我的学习和人生更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当时的一高是在本乡，东京帝大的右边，看上去好像是东京帝大的“预科”，但实际上并不是。1936 年一高迁移到涩谷区驹场。本乡时代的一高，在大门进口处有一棵大橄榄树，树下有一块墓碑：“朱舜水先生之墓”。这使我猛然感到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关系，何其深远。这是我在中国从未有过的

感觉。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我们受的教育总不免“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把英文学好，进海关、邮政、银行，捧金饭碗，是当时盛行的读书风气。但我在刚踏进东京本乡时代的一高大门时，才开始醒悟到中国人和日本人我们都是东方人，从朱舜水先生的墓碑，可以看到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意义是非常深远的。

当时在一高的学习，对日本学生来说，是自由奔放，形成各自“个性”的好时光。对我来说，是埋头苦追苦赶的三年。外文，读的是古典文学。比如学英文，就读莎士比亚的名著；学德文，才学了不到半个月，就硬啃歌德的名著。学日文（在学校称之为国语），要读《源氏物语》、《枕草子》、《方丈记》、《竹取物语》等等日本古典名著，都是“古文”。上课时老师随意指定学生解读。如果读不上来，何其羞愧。特别是，我是中国人。而我是日夜处于苦攻几种外文的追赶苦练的生活之中。但是思想境界提高了，接触到了东西方的文化财富，了解社会历史发展的共有的客观历程。

后来在东京帝国大学的学习也是得益匪浅的。东京帝国大学是明治政府为了“近代化”引进欧美科学的最高学府。学校虽然提倡自由研究，但在军国主义的统治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只好借宣扬古典经济学，从中引进马克思的理论和方法。但在经济学部的教授中，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还是最为深刻。我的老师大河内一男博士是德国社会政策经济理论的权威，又是经济思想史，特别是德国历史学派的权威。在他的指导下，我的研究论文题目是《F. 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和他的生产力理论》。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山田感太郎的《日本资本主义的分析》也是我们在私下所热衷学习的

一本名著。此外，我读希法丁《金融资本论》差不多有五遍。读了这本书，感到看社会经济问题更清楚了。这种感受至今仍很新鲜。

我进东大以后，仍经常参加一高中国留学生的同学会的活动。我们共同提出了三句话：“要沉默、要勤学、要团结。”一切为了回国参加抗日救国运动。当时学校里不可能有党的领导，这些活动都是我们自发的。我在东大第一次接触毛泽东思想是读斯诺的《西行漫记》的英文版。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使我的认识产生了一次飞跃。1944年5月22日凌晨五点，我家四面被东京宪兵队包围，我被逮捕，被押解到东京九段下的东京宪兵队总部，受到严刑拷打，追查我们的地下组织和名单。逼供达三个多月。但除将我的两大卡车书籍运走外，他们什么也没有得到。后来，东大老师出面营救，要求把我们一批学生送交法院，公开真相。一天晚上，我被押上囚车，送往巢鸭刑务所受审。在巢鸭刑务所和别的囚徒一起，又被囚禁了近三个月，最终获“无罪释放”。那时我已不能走，身心已备受摧残。出狱后，经友人帮助，带着我新婚的妻子博昭和刚出世的小孩去乡下。1945年春在朋友掩护下经朝鲜回国。

问：据说您从日本深造回国后，教学研究工作有较多的变动，也曾深受“反右”和“文革”之灾，请述说一下那段时期的经历和感受。

答：回到上海不久，我就在沪江大学城中商学院讲授外国经济思想史。后来又复到复旦大学、上海法学院、光华大学

经济系教书。因为我没有在国内大学念过书，不了解国内大学生的水平，我按我在东京帝大经济学部的传统，或者说按照德国大学的传统，先告诉学生这门学科的历史，以及当代的代表著作和参考书，然后讲我自己的理论体系或者是我自己的学习心得。教了一两个月后，学生们反映，他们没有能力和时间看原著，最好有一本教科书。我这才醒悟，像教中学那样，只按一本所谓“教科书”讲课，学生们没有钻研学习的能力和习惯。我看，这种情况到现在都没有改进。所以要培养高水平的专业人才，教育制度改革的确有认真考虑的必要。

1950年春，我的许多在地下时期一起搞民主运动的朋友，都到了北京。第一任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先生，听了我朋友的介绍，就执意希望我到北京总行搞理论研究工作，并要我即刻成行。在他的盛意召唤下，1950年5月，我结束教学工作到总行搞货币金融的研究工作，同时帮助南行长研究日本问题。那时我才33岁，自以为终于报国有门，可以大干一场了。但又感到组织上总把我们看成资产阶级的旧知识分子，作为“利用”的材料，十分纳闷。我想，我刚回国不久，还是青年，怎么就成了“旧大褂子”？何况我从学生时代起就钻研过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思想从内心拥护。1957年“反右”，我自然被错划为“右派”。到1979年，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拨乱反正，才重获新生。但作为知识分子最可以报效祖国、作出贡献的22年的年华，就在“撤销职务，监督劳动改造”的漫长岁月中流逝了。

如果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实行改革开放，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我恐怕还要在“监督劳改”的专

政下，坐待死神的降临，当然也就不可能有学术成就的形成。我的专业是研究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我的目的是为了寻求一国如何走向“现代化”的人类历史经验。我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不了解人类如何走向“现代化”的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不了解不同国家不同时代如何走向“现代化”的经济史和经济理论的经典著作，也很难胸有成竹、有条不紊地制定健康的发展战略。

但历史的发展总不可能是直线的，往者已矣，来者可追。感谢小平同志领导的党中央，调动了全国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发挥了他们的所长。当时我虽年过“花甲”，但报效祖国之情和青年时代一样，毫未褪色。我努力补课，重新刻苦学习三十多年世界上所发展起来的学问。有幸得到我的老师大河内一男博士和许多同窗学友的帮助，我得有机会多次重返母校，为中日经济学界的友好交流，起到了桥梁的作用。我还按照我的方法培养博士研究生，要他们打好基础，反对华而不实。在我有生之年，我将为祖国现代化，引进人类的精神财富，在经济科学方面作出贡献。

问：您对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深有研究，早在 1990 年，出席了在日本名古屋举办的“纪念亚当·斯密逝世 200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您一直认为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对现代中国来说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您是怎样得出这个结论的？

答：自从《国富论》问世以来，亚当·斯密作为政治经济学之父，经济自由主义的首创者，已经深入人心，对他的尊崇一直是经久不衰，他的著作早已是古典中之古典。尽管在

《国富论》出版之前，斯密就出版了《道德情操论》（1759年），他一直倾注了毕生的精力，加以完善补充，生前就再版了6次，最后一版是1790年，是在斯密去世的那一年。受到了广大的好评，影响很大。然而，和《国富论》相比，知道的人就少得多。在人们的心目中，亚当·斯密只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而从未想到他主要是一位伟大的“道德哲学”的思想家，是具有博大精深社会科学体系的社会科学家。

回顾自从严复1897年始翻译《原富》以来，正当斯密的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已经100年了。但在这百年中，由于种种原因，斯密在中国的影响大多还处在初级阶段。倒是严复的《天演论》在当时唤醒了全国的有识之士，相形之下，斯密的《国富论》（原富）却未能在中国起到应有的作用。过去我们以为《原富》的译文难懂，作为一条理由，但以后又有郭王译本〔《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下）〕，从它的20世纪30年代的译本算起，至今也已有60余年，但仍未见到亚当·斯密的政治学给予我国经济学界有多大的影响，更不用说对亚当·斯密的社会哲学、伦理学、政治学、法学和经济学等社会科学体系的全部思想的研究了。我想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的理论和应用，是建立在市民社会的基础上，是在近代统一的国家、统一的政府都已形成之后，才有可能在这个历史基础上，作为时代课题的理论起到其现实的作用。而过去的中国在政治上却不具备这些条件，1949年好容易全国解放，形成了统一的国家政府，但又由于苏联模式，亚当·斯密反而成了我国经济学界批判的对象，教条主义横行，历史唯物主义受到歪曲，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只能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一的古典经济学的范畴而在学说史中得以

存在，人们根本不可能根据我国的国情，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认识我国的经济水平还处于小农经济、手工业经济和工场手工业时代的历史发展的初级阶段。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改革开放，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使国家重新走上正轨。1992年党的十四大又决定以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发展生产力，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我们已建立起强大的统一的国民国家，有英明有力的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今日的中国，我认为全面、正确地学习和理解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必然有很宝贵的启发意义。

我之所以强调“全面、正确地学习和理解”《国富论》，是因为人们往往停留在书本上，正像严复曾在《救亡决论》中所指出，“盗西法之虚声，而治中土之实弊。”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自己是否站在时代的前面，为时代的历史任务，而身体力行地去学习和理解。在学习和理解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时也仍然要下苦工夫，不能断章取义，自以为是。例如，在我国多年来一直把亚当·斯密看成为经济的自由放任主义的思想家，殊不知在《国富论》中根本就找不到“放任”这两个字，而且斯密所强调的“自由”是“18世纪的人”（马克思语）即社会中下层阶级的人的自由，是中下层阶级的市民争取从封建领主、封建地主、行会等封建体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自由，并不是统治阶级的自由，也更不可能是像现代新自由主义者所鼓吹的跨国公司、金融寡头、投机对冲基金的垄断和操纵市场经济的自由。亚当·斯密的社会哲学、经济理论是从封建统治向近代市民社会过渡时期的理论指南，是向封建帝国主义战斗的理论武器，我们不能用“资产阶级经

济学”的“帽子”而把它作为批判的对象。《国富论》之所以成为经典中之“经典”，因为它的确说明了“诸国民的财富的性质和原因”。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有它特殊的历史的现实意义。

问：朱老师，据我了解，您所最钦佩的三位经济学家分别是亚当·斯密、马克思和李斯特。对于前二位，人们都已很熟悉了。而相比之下，李斯特的知名度就较低些。而您对他则是颇有研究的。请您介绍一下李斯特的经济理论。

答：李斯特在《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的绪论的结尾中，语重心长地告诉人们，“历史教导我们，一国国民如果不能在适当时期培养本国的工业，培养本国有力的产业家和商人阶级，不能在适当时期保证本国的精神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独立，则举国必将灭亡。其例不鲜。”

他将经济学分为“私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后者又分为二种：第一为“万民经济学”或“世界经济”；第二为“政治经济学”或“国民经济学”。他认为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是“万民经济学”，是“教导全人类如何才能幸福的科学”，在那里是以全人类和“诸国民”（nations）为直接的对象。与斯密的经济学相反，“政治经济学”或“国民经济学”是教导某一特定的国民，在特定的世界形势下，如何通过农工商业的发展来获得幸福和文明的科学。它应教导人们认识自己的祖国的实情，祖国的利害关系和所处的历史发展的阶段和地位，同时告诉人民如何努力才能达到发达的经济状况，与其他发展的国家进行联合。“万民经济学”不承认特定的国民经

济的历史发展阶段，主张自由贸易和自由放任。李斯特认为，这是英国产业资本为隐瞒它采取重商主义政策而达到富强的一种狡猾的理论。李斯特只从策略的侧面来解释斯密理论中的自由贸易理论，并没有注意斯密经济学中的理论本身。

李斯特自己特别声明他并不是心胸狭窄的拥护重商主义政策的官房学派。他在序言中说：“我的理论基础——是置于历史和事物的自然的基础之上的，——完全不同于所谓重商主义学派”，“我将由万民主义学派所千万次论证的议论，第一次将它置于事物的自然性质和历史的教训的基础上”。“我所建立的体系特征，与过去的不同之处，是国民的存在。我的体系的基础建立在个人与人类之间的中间存在的‘国民体’（nationalitäts）的利益的基础上”。^①他认为，重商主义政策只是某一种特定国民在其特定历史发展阶段中，对其发展国民经济有利、有用的时期内才应实行。他不同意将重商主义政策看成是普遍有用和绝对必要的政策，他强调“规制”只不过是一种手段，而目标还是在于求得“自由”。不能只看到国民而看不到人类，只看到现在而看不到将来。否则，那就是缺乏“哲学”的眼光了。

李斯特在这里所提出的“国民体”在经济生活方面有二重的含义：一是从历史的发展的观点，从时间上展开的经济发展阶段论，这给德国的历史学派留下了传统的遗产，使李斯特成为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一是他根据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下的“国民体”的要求，建立了他的具有特征的“生产力

^①参阅《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7页。本文所引的李斯特著作的引文，是作者自己根据原文翻译的——作者注。

理论”或“国民生产力”理论。生产力理论是李斯特经济学的核心，是他的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础，他的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是作为生产力的历史发展的理论体系而展开的。李斯特的经济学在本质上是国民生产力经济学，因而也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是不发达国家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指南。

李斯特在批判萨伊和他的学派的那一章里强调指出：“政治经济学不仅仅是说明各个人如何生产交换价值，如何分配和如何消费，更重要的是如何唤起、振兴国民整体的生产力，如何使它们提高，如何保护它们。同时还要研究它们为什么以及如何地被削弱，为什么以及如何地处于睡眠状态，或者遭致灭亡。为了国民的生存、国家的独立、国民的繁荣、国家的巩固以及国民的文化和未来，如何通过国民生产诸力才能最好地最有效地利用国民的资源”。^①

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不是生产力一般的理论，而是作为“国民生产力”的理论展开的。他的生产力理论是在特定国民即发展中国家的特定历史基础上展开的，它的目的是如何才能使一个不发达国家能有保障地达到农工商业发展的第五阶段，即李斯特所说的“正常的国民经济的发展状态”。李斯特批判斯密理论“忘却了国民体的存在以及它的特殊利益。……古典学派判断各国是按照万民主义的原则，他们从政治的理由，误认为国民生产诸力的万民主义倾向。”于是他提出“财富的原因和财富本身完全不是一回事”，“创造财富的力远比财富本身更为重要”，“因为它不仅保证已获得了的东西的所有和增加，而且也保证了失去了的东西的补充。这种情况

^①参阅《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98页。

对于不能依靠利息收入而生活的国民全体来说，比之个人的场合更加如此。”

李斯特主张经济学研究应该把主要力量放在分析、研究“财富的原因”和“创造财富的力”的方面。一个国家的富强不在于掌握多少交换价值，而在于掌握生产诸力。他举过一个很明显的生活事例，如同一个渔夫财富，不在于他拥有鱼，而在于他不断想捕获鱼的意愿以及实现这种愿望的能力和工具。他说，德国在任何时代，尽管遭受了瘟疫、饥荒、国内外战争而归于荒芜，但终于恢复了它的大部分的生产力，又很快地达到了相当程度的幸福和富强的状态。相反，西班牙由于暴君和僧侣的专断横行，在国内虽然保持着安定和平的环境，但仍日益深深陷入贫困和苦难。虽然在西班牙，仍然是美洲发现以前的和实施审判异教徒制度以前的太阳在照耀他们，他们仍拥有和以前同样的土地，他们的矿藏仍和以前一样富饶，他们仍然是和以前一样的民族，但就是由于这个国民不断地丧失了它的生产诸力而深深陷入贫穷落后和愚昧无知。

问：请您回顾一下现代经济学的演变和产生的情况。

答：在我国，现代经济学是指区别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概念，但最早使用这个概念的是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O.R.Lange. 1904 - 1965）在他1935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著作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代经济理论”（“Marxian Economics and Modern Economic Theory” . Rev. Econ. Stud. Vol 2.1935）。他所指

的“现代经济学”（Modern Economics）的内容主要是指 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在欧美各国所展开的新实证主义经济理论的总称。这里所指的“Modern Economics”应译为“近代经济学”，其含义区别于以前“旧时代”的经济学而展开的“新的”“近代的”经济学的意思。这里所说的“旧时代”的经济学是指“古典学派经济学”。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中也曾使用过“近代经济学”（die moderne politische Oekonomie）这个概念，那是指“近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学，是指一个新的时代和新兴资产阶级的经济学。20 世纪 30 年代所使用的“近代经济学”（Modern Economics）的“近代”或“现代”的含义是指他们理论研究的对象和研究的方法与古典学派完全不同的所谓“新型”的经济学。

进入 19 世纪 70 年代后不久，差不多同时，在欧洲出版了三本经济学著作，带来了经济学说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所谓“边际革命”。第一本是英国的杰文斯（W. Stanley Jevons, 1835~1882）的《经济学的理论》（The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1871），他提出理论经济学的任务在于建立“效用与利己心的力学”；第二本是奥地利的门格尔（Carl Menger, 1840~1921）的《国民经济学原理》（Grundsätze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 1871）；第三本是法国的瓦尔拉斯（Marie Esprit Léon Walras, 1834~1910）在瑞士出版了《纯粹经济学要论》（Éléments d'économie politique pure ou théorie de la richesse sociale, 1874-1877）。他们三人的经济学的理论并不一致，也不是一个体系，杰文斯在英国建立了英国学派，门格尔创立了奥地利学派，瓦尔拉斯创立了洛桑学派。但他们三人却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就是同时提出了边际效

用价值论，他们抛弃了古典学派的劳动价值论，并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相抗衡，形成了边际效用学派。

边际效用理论的先驱者，按照杰文斯在他的《经济学的理论》第二版（1879）的序言中所说，主要有德布叶（Ars' enc Jules Dupuit . 1804 - 1866）、古尔诺（Augustin Cournot . 1801 - 1877）、戈森（Hermaun Heinrich Gossen . 1810 - 1877）和屠能（Johaun Heinrich Von Thünen . 1783 - 1850）。其中以戈森为最早展开了有体系的理论，他提出了“边际效用递减法则”、以及“边际效用均等法则”。他看到消费者所享受的效用，随着消费量的增加而递减，当人们考虑其消费计划时，如果对各种财货，以价格除其边际效用所得的比率，对一切财货都是相等的时候，则各人的效用就是最大。戈森的议论是以个人主义的效用概念为前提而展开的，即每个人在消费一定量的财货时，能满足他多少欲望。但将戈森的理论体系和结构进一步加以发展，具有明确的体系化的是 C. 门格尔及他的继承者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 . 1851 - 1926）和庞巴维克（E. Von Bohm Bawerk . 1851 - 1914），即所谓奥地利学派的归属理论。在现代，归属理论已成为现代经济学中最基础的概念，被纳入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的体系之中。

在边际效用学派的三位创始人中，获得最高评价和影响最大的是洛桑学派的创始人 L. 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这一理论后由帕累托（V. Pareto . 1848 ~ 1923）所继承发展，并通过熊彼得（J. Schumpeter . 1883 - 1956）的《理论经济学的本质及其主要内容》（1905）和卡赛尔（G. Cassel . 1866 - 1945）的《社会经济原理》（1918）获得了广泛的普及。再后来引人注目的重大进展有希克斯（J. R. Hicks . 1904 ~）

在他的《价值与资本》（1939）中，对一般均衡模型进行动态化的发展；有萨缪尔森（P.A.Samuelson. 1915~）在他的《经济分析的基础》（1948）的著作中，对一般均衡分析做出的数学的结构分析；还有里昂惕夫（W.W.Leontief. 1906~）将一般均衡理论运用到实际的经济分析中，创造了投入产出分析（产业关联分析），作为“产业关联表”而著名，为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边际效用理论出现以后，英国的威克斯迪特（Philip Henry Wicksteed. 1844~1927）加以综合展开，发展成边际生产力理论，还有瑞典的威克赛尔（Johan Gustaf Knut Wicksell. 1851~1926）也在分配理论方面，发展了边际生产力理论。美国的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 1847-1938）原受德国历史学派影响，后来转为批判历史学派，但他不是追随边际效用理论的三位创始人，而是独自地根据边际原理，将价值的边际效用论应用于生产和分配，展开了他的边际效用理论的工资论、利率论，成为美国“近代经济学”的创始人。

问：您对萨缪尔森等人歪曲、否定和攻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感到非常反感和厌恶，曾发表不少批驳文章，大体包括哪些内容？

答：30多年来，萨缪尔森写了不少有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调查和深思”的文章，但是归根到底，他和庞巴维克以及其他的马克思主义批判者一样，主要是集中在所谓《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的“矛盾”以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方面，他的目的很清楚，是企图从根本上推翻马克思主义经

济学。

萨缪尔森所攻击的《资本论》的所谓“矛盾”是什么？

30多年来萨缪尔森为了攻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否定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他一直不断地在各种场合攻击《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之间存在着所谓体系的矛盾。这个问题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就一直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所攻击的主要问题，萨缪尔森只不过是继承了自从庞巴维克以来的衣钵。在他对马克思经济学进行攻击的大量文章中，他一贯伪装公正、客观。他强调“为了理解马克思，我们就必须将他的用语和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用语相联系”，^①。例如在他第一次公开发表的作为《经济学》教科书的“附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中说：“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价值的创造者，同时也是被财产所有者剥削的生产要素。为了赋予以最为重要的意义，对现在西欧经济学中已经不复存在的新概念：即‘剩余价值率’这个概念，给以定义是重要的。这个所谓‘剩余价值率’就是只用直接劳动成本（即只用可变资本）去除以利润或剩余的合计就得出”。“如果竞争使两种产业的利润率在正的水平上平均化了，其结果，就要使剩余价值率不平均了，……资本有机构成最高的产业里，剩余价值率就会增高”。他说，但马克思“认为剩余价值率是根据资本家剥削工人的能力用某种方法来决定的，或者是根据各资本家的剥削动机和剥削力来决定的，即使在资本有机构成不同的产业之间，剩余价值率也会平均化

^①萨缪尔森：《经济学》，日译本“附录”，岩波书店。1967年版（下同），第1154页。

的。”萨缪尔森于是就指出“马克思是注意到平均利润率和平均剩余价值率之间的矛盾，直到他死后 1895 年《资本论》第三卷出版后，他才承认竞争使利润率的平均化，这必然要引起剩余价值率的不均等”^①。萨缪尔森在这里企图暗示人们，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之间存在有矛盾。他又指出“即使不去考虑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否定了平均剩余价值率，第一卷也不能对资本主义运动规律提供任何有用的分析”^②。他说，马克思在第一卷中，是采取劳动价值论的，即“在生产时，第一种财和第二种财比较，需要二倍的劳动，那么第一种财就要按第二种财的二倍的价格出售。……就是说市场价格必须和生产所必要的劳动量（包括间接劳动）成比例”。如将此道理适用于“劳动力”，在有“产业预备军”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力只能以低的生存水平的工资来出卖自己，“其残余即成为剥削者的剩余”。他认为这是马克思的思想的“混乱”，是“马克思理论体系的弱点所在”。因为萨缪尔森认为劳动力可以不按低水平出卖自己，在所谓“竞争的均衡过程中会产生高工资”。1957 年他早期攻击马克思的一篇文章（《工资与利息：马克思经济模式的现代剖析》）中，他使用了投入——产出表的数字分析手法来剖解说明马克思的表式。他将可变资本视同工资支付额，从而以劳动投入量乘以货币工资率（W）来表示。他又将不变资本直接视同资本的物量，即第一部类的产出物，乘以资本一单位的价格来表示。这样萨缪尔森在解剖说明马克思的表式

^① 萨缪尔森：《经济学》下，日译本，第 1154~1159 . 1172 页。

^② 同上。

时，暗中就将马克思的价值范畴作为价格范畴来规定。他所说的工资支付额、中间投入物以及各种费用，都是以货币名义来表示，于是就分离为价格与物量，直接从物的投入——

出系数中引导出他所理解的价格。于是他就宣布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不必要的迂回道路。但马克思的价值单位的概念与萨缪尔森所说的物量单位是完全不同的范畴。

进入 70 年代以后，资本主义滞胀危机不断深入，无以自拔。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的辩护士们，像萨缪尔森、森岛通夫、威泽塞克（C.C.Von Weizsacker）等纷纷对马克思的《资本论》，展开了恶毒的攻击，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之间，也展开了相互之间的激烈论争。用瓦埃茨泽克尔的话来说，出现了“马克思理论模式的复兴”。他们的共同手法是使用严密的线性数学的分析工具，对马克思的经济学，特别是对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再生产表式论以及唯物史观等方面进行攻击，企图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运动规律所作的科学论断。

萨缪尔森是当代经济学者中否定和攻击马克思经济学最激烈的代表人物。他早在 1950 年以来，就经常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进行歪曲和攻击。例如他在 1967 年发表的“《资本论》一百年”一文中，露骨地表示“如果我把《资本论》看做经济学中李嘉图以后的没有成果的一个分枝，那我为什么在 1967 年还写这篇文章，那我又为什么在美国经济学会做了《资本论》出版一百周年纪念的长篇报告，还在《新闻周刊》上写了纪念《资本论》出版一百周年的专栏文章，那我又为什么在过去几年里关于马克思和李嘉图的理论，使用了极其精密的数学公式写了好几篇文章呢？答案是这样：因为 1967

年也正好是苏联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纪念，也就是说，由于共产主义世界里有几百万极其认真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所以马克思也就成了很值得我们研究的对象。但很遗憾这并不是由于马克思在经济学的分析方面，有什么功绩的原因”。进入 70 年代后，他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批判和攻击，更加变本加厉。例如在 1973 年出版的他的《经济学》教科书第 9 版，就增加了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批判”，而且比过去任何一版都占用了更大的篇幅。他说：“直到最近为止，对那些专门学习经济学的学生，如只告诉、教育他们把马克思看成是一个不健全的人物，除此之外，他们什么也不知道，这是很不光彩的一件事情。其原因与其说是由于金钱政治的压力，不如说是由于上一代像凯恩斯这样独立性强的教师们，把马克思描绘成毫无成果的、不健全的学者的反映。我在这一版（指第 9 版）中，既不把马克思认为是神仙，也不认为是恶魔，而看做是为世界人口半数以上的人们所极其尊重、并具有巨大、持续影响的当代学者。在本版中，对成熟后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重新加以评定，同时对最近引起重视的青年马克思的思想也做了分析。”

萨缪尔森为了维护他自己的理论体系，对批判他的理论的各种学说，进行了回击。

萨缪尔森的反击重点就放在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批判”方面。他对马克思的攻击愈来愈低级，愈来愈恶毒。

列宁曾经说过：“马克思的学说在整个文明世界里引起全部资产阶级的科学（官家科学和自由派科学）的最大仇视和憎恨，这些科学把马克思主义看做是‘有害的宗派’之类的东西。……全部官家的和自由派的科学都这样或那样地为雇

佣奴隶制辩护，而马克思主义则对这个奴隶制宣布了无情的战斗。”下面我们就几个根本问题，对萨缪尔森进行反批判。

否定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攻击唯物史观。

萨缪尔森为了反对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客观必然规律，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如无产阶级贫困化规律、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资本主义发展成垄断资本主义的规律一概加以彻底否定，并对唯物史观进行恶毒攻击。

他说：我本来就不太相信关于经济发展趋势的客观规律性，即使像汤因比、斯宾格勒、熊彼得、凡勃伦、马克思等人的以及现代的罗斯托和加尔布雷思等人的理论，只可以叫做“巨幅图画的理论”（big picture theory），但不是科学，不能相信。他把马克思所提出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史的过程”，诬蔑为机械的决定论，是一种宿命论。他认为这种观点将历史看成了按时间表向一定方向发展，忽视了人类的主体性和人类的行动对社会发展所发生的影响。他认为历史是在人类行动的错误和探索的过程中前进的。当人类控制自然能力的水平很低的阶段，即生产力水平很低的阶段，人类受自然界的控制和制约是很苛刻的，人类主体自由活动的范围和可能性是很小的。在这种生产力水平低的阶段，机械的决定论、宿命论是能够比较容易统治人们的思想的。同时那些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即由所谓“世界精神”所引导的合乎规律的过程，就是历史的发展，这也只有在生产力水平低的阶段才能作为一种理论依据。一旦人类对自然的控制能力到达了高度的阶段，生产力水平提高了，人类主体的活动能力和自由的范围也就会大为提高，在这个基础上，人类就有条件按照自己的目的来建立单一的统治，也就是说，在这

个阶段，历史可以由人类的智慧来创造。因此主观的历史观就可以成立。萨缪尔森认为：人类的历史是人类的理性思考所创造的，其本身没有任何客观规律性的过程。他强调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既不是纯粹的资本主义，也不是纯粹的社会主义，而是一种“混合经济体制”。萨缪尔森就是站在这个混合经济体制论的基础上，来否定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

萨缪尔森攻击劳动价值论的主要一点是企图重复过去几十年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马克思的“批判”，即所谓《资本论》第一卷的价值理论与《资本论》第三卷的生产价格的理论的矛盾，这个问题早在七十多年前曾经由奥地利学派的庞巴维克提出来，而受到了当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希法亭的彻底反批判。萨缪尔森认为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财货的“价值”是指按照直接或间接物化在该财货中劳动量来计算的，但马克思却在第三卷中，对现实的“竞争价格”，其直接劳动集约度高的财货的“价格”，比集约度低的财货的“价格”，要相对地低。他重复了庞巴维克早年对马克思的批判，他强调马克思理论的批判家们都认为《资本论》第三卷，重又回到了“传统的经济理论”中来了。他认为第一卷中的“平均剩余价值率”以及运用“价值”概念来说明和计算它，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是一种毫无用处的虚构，徒然招致混乱。

他根据他自己的理解，认为那些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经济学家们，对马克思的“价值”概念的说明，归纳起来大概有下面几种。

1. 认为马克思的价值概念在哲学方面内容极为丰富，而且是有实际作用的范畴。

2. 认为马克思的价值概念，对社会学也好，历史学也

好，都是普遍妥当适用的。

认为马克思的价值概念对于暴露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

⁴3. 认为《资本论》第三卷的利润率和价格是可以由第一卷的价值概念中分析出总剩余价值，至少它是总剩余价值的有效的基础概念。

还有一些人从微观经济理论来说明这种不一致的第一卷中的“价值”，如何“转形”为现实的价格或利润的结构。

⁶5. 他指出最近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像 P.M. 斯威齐、J. 温特尔涅茨（Winternilz）、K. 迈（May）、M. 多布（Dobb）以及 R. 米克（Meek）等人，还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L. von 包尔特凯维茨（Bortkiewicz），他们已将马克思理论中从价值转形为价格的方式中所存在的一些近似性的和微小的偏差，都给予了解决。

但是，萨缪尔森认为对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分析，只要通过现代高等数学的经济分析方法，就可以最终地得到论证，受到拥护，而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体系是不必要的。还认为在“今天里昂惕夫和斯拉法的时代”，完全可以用纯粹数理分析的逻辑方式来解释这个问题，而完全不必带有任何神秘的党派性的论争。如果使用纯粹数理逻辑的手法，则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就不复存在，都可以获得完满的解决。

于是，萨缪尔森就为此目的提出了一个建议，把一直为人们称之为“转形问题”的提法，改为“相互排斥的替代的‘价值’和‘价格’的比较和对照问题”。他想把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和价格的关系，篡改为完全相互排斥的迥然不同的事

物之间的单纯比较和对照的问题，这样就可以把马克思的价值概念，从根本上完全抛弃，化为乌有。他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转形为价格的“转形问题”，恶意地歪曲为只不过是下列的手续程序的问题：（1）书写价值方程式；（2）用橡皮擦去它；（3）最后写价格方程式，这样，转形过程就算完结。它的公式是：

$$\text{“Anything} = \text{Anything else} \times \frac{\text{Anything}}{\text{Anything else}} \text{”}。$$

他认为这种公式的马克思的价值概念是一个没有必要的迂回道路。

萨缪尔森的这种伪装“科学”和“公正”的中立态度，把马克思的价值概念歪曲为是量的规定的概念，这和 J. 罗宾逊夫人对价值概念的歪曲有异曲同工之处。J. 罗宾逊夫人在《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经济思想》以及《价值和价格》、《价值论再考》^①等著作中，把马克思的价值概念看做完全是神秘的形而上学的范畴，把它用来作为操作工具的一种虚构。

萨缪尔森建议放弃马克思的“价值”概念，他甚至主张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效用价值论也应放弃，而代之以纯粹技术性的数式化的“稀少性”概念和“选择”概念。他认为产品的交换比率，按照劳动价值论中所谈的纯粹的价值量来规定的情况和事例，只有在像亚当·斯密所说的早期的未开化社会里才存在。不过，即使是这种场合，如果不使用劳动价值论中的价值概念，而使用 L. 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也可以达到同一结果。他说，即使在亚当·斯密所说的早期的未开化

^① 均见 J. 罗宾逊夫人：《经济学论集》（“Collected Economic Papers” Vol. IV 1973 年）

社会里，由于土地稀少，有可能产生地租，同时，在生产过程中，使用耐久生产资料从事生产，生产期间就需要一定的时间，这时的利润率或利息率必然是“正值”，而且劳动不可能是同质的，男人的劳动和女人的劳动是不一样的，异质的劳动之间不可能设定共同的尺度来换算。

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抛弃了效用价值论，代之以“选择理论”或“选择”概念。他对“选择”概念做了如下的定义：“所谓经济学者是研究怎样一种选择的行动，即人们或社会通过货币的媒介或不通过，或二者兼而有之，使用若干具有替代用途的稀少性的生产资源，生产各种产品，以为现在和将来的消费之用。在将它分配给社会上各种成员或集团时，应采取哪一种选择的行动，（它同时也分析改进资源分配方式时的费用和收益。）”（括号内一句是第九版以后才加上的一句。——引者）。因此萨缪尔森主张经济学是研究选择的行为的学问。他认为任何社会，即使是蜜蜂的蜂巢，也必须解决下列这些选择的行动的基本问题，这就是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以及为谁生产？萨缪尔森站在形而上学的形式主义的立场，他完全忽视了生产活动只有人类才能做到，从根本上抛弃了劳动才是区别人类和其他动物的根本标志。生产必然是社会的生产，社会生产的活动必须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下进行，而不同的生产方式的性质从根本上规定了个别的选择的行动，个别的选择标准总是和全体的规模、结构密切相联的。在阶级社会里，生产是为了统治阶级的需要，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下是为了资本家和他们的选择行为，目的是在于如何加强对工人的剥削，如何生产财富，加强资本积累。萨缪尔森的主张，根本不考虑历史的社会的生产方

式的本质，只考虑个别的选择的行为，正如他所提出的“混合经济体制”的概念一样，都是一种折衷主义的货色。

马克思的价值概念和价值规律绝不是虚构，也不是假说。在历史上，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或接近它们的价值进行交换，远比那种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要早得多，而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则需要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发展到一定的高度以后，才普遍展开。因此把商品的价值看做先于生产价格，这不仅在理论上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而且在历史上也完全是这样的。萨缪尔森把价值概念视为不必要的虚构，不必要的迂回道路，这只表明了他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根本不理解，以致把商品生产和产品生产，把商品交换同产品交换混为一谈，把特殊的规律和一般的规律视同一体。他把马克思的价值概念曲解为只是交换比率或交换价值，这和那位鼎鼎大名的洛里亚早在 1895 年 2 月在意大利的《科学·文学和艺术的新文选》杂志上，攻击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时所说的，“因为价值既然不外是一个商品和另一个商品相交换的比率，所以，单是总价值这个概念，就已经是荒谬的，是胡说”等陈词滥调岂不完全一样？

从上面这些简要的概括中，我们不难看出，萨缪尔森多年来一贯地对马克思经济学进行歪曲和攻击的主、客观的意图所在，他对过去的论敌——美国的货币主义以及它的分支的合理预期形成假说，已公开表示妥协合作，但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仍不遗余力地攻击，说什么“在经济学中，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鸦片”。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歪曲和攻击，不能置若罔闻，熟视无睹，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必须

在实践和斗争中得到前进和发展。

问：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经济学“非经济学化”的倾向发展很快，以至于著名的里昂惕夫教授在1990年疾呼“经济学既不是数学，也不是修辞学”。请您简要分析一下其缘由。

答：由于战后美国经济学数学化、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和教科书式的发展，美国经济学的模型化和教科书化的倾向，也就自然随之而形成。著名英国经济学家莱荣霍夫德（A. Leijonhufvud）曾经讽刺6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美国经济学的“生态”。他把他们比拟为“居住在北极广漠地区的民族”。这个民族内部等级的划分则根据其制作“模型”（model）的技术水平。但他们以数学公式所制作的“模型”，一般只能作为“神前的供物”，陈列在专门经济学刊物上，并没有什么实际用处。这个“民族内部等级”的地位和关系是：“数理经济学”列于首位，其次是微观经济学（价格分析），第三位是宏观经济学（国民收入分析），第四是发展经济学，最后是实证的调查研究。这些“等级”的特征决定于他们“崇拜”什么“模型”，“模型”成了他们的“图腾”。年轻的“模型”制作者对“老前辈”根本没有什么“敬老精神”，他们不重视年功和阅历而重视制作“模型”的技巧。在大学院的经济系里，根据数学的“审美观”来评价“模型”，太复杂的是不受欢迎的。如果制作“模型”所依据的前提和假设简明扼要，其所演绎出来的结论又是教科书中所未说过的什么“新意”，就会受到好评。所以关键往往决定于他们应用数学公式的技巧。

对于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以及历史文化的传统，“模型”制作者是根本不在考虑之内的。莱荣霍夫德说，大学院的研究必须制作出导师满意的“模型”，他才能顺利地通过博士学位的考试。

对这种数学化和计量经济学的方法统治了当前西方经济学和高年级经济学教科书的现状，美国著名经济学家 W. 里昂惕夫教授，也很不以为然，他曾分析了 1972—1981 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文章的各种类型，给美国《科学》杂志写了一封信，他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合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从《美国经济评论》杂志上的各类文章中，可以看出现代美国经济学数学化、模型化的一般情况。

《美国经济评论》上的各类文章	1972~1976 年 (%)	1977~1981 年 (%)
没有任何资料的数学模型	50.1	54.0
没有任何数学公式和资料的分析	21.2	11.6
统计方法	0.6	0.5
以作者整理的资料为基础的经验分析	0.3	1.4
根据出版的或其他人整理的资料进行间接统计推断的经验分析	21.4	22.7
没有根据作者整理的资料进行间接统计推断的经验分析	0.0	0.5
没有根据资料进行间接统计推断的经验分析	5.4	7.4
以人工模拟和试验为基础的经验分析	0.5	1.9

资料来源：《科学》，转引自英《经济学家》1984年9月22日。

美国大学院里经济学的教育方法，几乎和自然科学相类

似，将各种标准的经济模型分门别类编成教科书，经济学的论文都应遵守教科书中的各种专门术语和定义，否则就不合格，不算作学术论文，这种风气几乎成了美国经济学界一种惯例。所以在美国大学院经济学的教育中，教科书的存在日益重要而普及。这和我过去在大学经济学部受训练时不大一样，那时虽也有“讲义”，但不是以“模型”编制的教科书，那时强调研究经典著作，训练学生独立思考。现在美国大学院里的教科书，一般是首先明确其“方法论”和各种专门术语，然后用这种方法和术语对过去的各种学说加以“解说”，这种“解说”基本上是从形式上、逻辑上加以整理编排，编成标准的教科书，于是用它来阐明经济学的各种“范式”（paradigm）。研究生们大多首先通过教科书学习宏观经济学（国民收入分析）和微观经济学（价格分析），主要学习其专门术语、定义和它的分析方法，反复回答习题，熟悉如何分析经济现象，其手法当然主要是数学公式“模型”的制作。学习宏观经济学的研究生中几乎没有人去花气力研读凯恩斯的“一般理论”原著，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徒劳”。而教科书中最多也只是提一下凯恩斯的名字，把他的理论作为一种宏观经济模型加以公式化、定型化。至于研究生或经济学家的论文要想被人认为有“独创性”，关键在于它必须是教科书中所没有提到过的，而且要十分简洁扼要的数学模型，成绩的大小主要看他们所发表论文的数量，从而决定其学术地位和待遇。

对于现代美国经济学界这种流行的风气和习惯，这种经济学的“非经济学”的倾向，我不想做出什么评议，因为它是在战后美国社会经济基础上产生的，有美国自己本身的特

殊性。但是对于发展中的国家，特别是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是否可以照抄、照搬，作为“先进的”、“现代的”借鉴来引进，这就必须认真考虑、认真对待。日本京都大学经济学教授佐和隆光，曾经对美国大学院里攻读博士学位的外国留学生，有过一些了解，他说“在美国大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有半数来自韩国、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东南亚、拉丁美洲、阿拉伯国家，而从欧洲去的极少，这些留学生为了取得‘美制博士’的称号，他们在美国这块土地上学习美式的新古典派经济学，他们感到这好像在实验室里学习物理和化学。……这些留学生一旦归国后，有的发现了自己祖国的风土文化的不同，而对在美国所受的经济教育训练产生厌恶，有的则不惜将自己祖国的传统和价值观，改变为美式的价值观，并以此作为自己的使命。’，^①他的这番话，值得深思。美国的这种“反经济学化”的现象，激起了里昂惕夫教授在1990年7月16~17日在英国爱丁堡市纪念亚当·斯密逝世200周年大会上，大声讽刺说：“经济学既不是数学，也不是修辞学。”

问：众所周知，明治维新对近代日本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但同时也与日本及时引进西欧经济学密切相关，您认为这对我国有何借鉴意义？

答：如果我们回顾明治初期日本经济学界引进西欧经济学的主要情况，看上去好像这两个主要流派是对立的，非此

^①参见佐和隆光：《经济学究竟是什么？》，岩波书店第1部分，1983年版。

即彼的关系，但事实上二者对于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说，都是必要的而且也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英美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引进和推广，对打击封建主义势力，为产业资本的形成开辟道路，起到了先锋的作用，在社会思想方面为走上近代化起到了启蒙运动的作用，这对于东方落后的封建性根深蒂固的国家是一条必经之路，是不可避免的。当然，上面我已经指出这与现代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在历史的社会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对于今天的中国经济学界来说，这种历史性质的区别特别应该强调。而对保护主义经济学，如美国早期的国民经济学派的凯里和德国的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的引进与推广，对于日本资本主义产业资本的发展来说，历史证明是极为必要的，同时也日益显出它的重要性。

自由主义与保护贸易这两大经济思想从明治初期以来，就一直成为日本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两大依据，同时也逐步形成日本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企业体系的两大相互组合结构。多少年来，日本一直是既强调市场竞争，同时又强调国家保护、培育产业的政策。可以说英国的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和德国的历史学派先驱者 F. 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在学说史上是两大对立的学派，但都为日本的国民经济发展所应用，而且长期保持其有用的生命活力。所以我强调 A. 斯密和 F. 李斯特的两大学派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互补的，而且是必要的统一的关系。

战前本庄荣治郎教授在《日本经济思想史研究（续编）》中有一章，标题为《从翻译经济学走向日本经济学》，他说：“明治维新初期，外来思想的流入，大别有四：（1）为英国流的功利说；（2）为法国流的民权说；（3）为德国流的国权

说；（4）为美国流的基督教思想。”但是他指出：“这些经济学不是作为教条而引进，而是将它们加以咀嚼、分析、研究、消化，再进行改革，使其适应国情。所以日本的经济学是引进经济学而不是翻译经济学”。对于那些“翻译”经济学家，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者，早在明治初期二十年前后，即有人提出了有力的批判，这些批判对我们中国今天的经济学界特别是年轻的经济学子们，仍然不失为金玉之言。为此我在这里也介绍一二。如明治初期的经济学家、社会评论家谷干城在《明治 20 年的意见书》中指出，“世人往往读欧美书、听欧美学说，从而模拟其口声，剽窃其论说，洋洋自得，或者对本不应改的也试图加以改革，甚至有人怀抱日本早已达到文明之域的空想，其误甚焉。”还有农商各省事务官前田正名受命编纂《兴业意见》，编辑了 24 册，明治二十五年他在《所见》一书中写道：“世人往往并不知道日本，一旦学习他国文字立即成为其书籍的奴仆，真如方底园盖，以别国来律本国，彼欲行宪政者，立即想日本政府成为德国模式，欲要本国议院模仿英国议院，纷纷攘攘、百弊丛生。……当务之急，莫过使本国公民知道国家是如何形成……”明治初期日本学界的学习西方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学界来说，仍不失为是一面镜子。

明治二十年前后开始，日本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的发展，国内社会问题也日益显著而严重，日本政府发现德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更符合日本帝国的要求，日本帝国宪法确立以后，日本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德国的影响日益深入，德文也和英文一样，相当普及。经济学界当然也不例外。日本的社会科学以德国流“国家学”为框架，成立了“国家学学

会”，发行《国家学会杂志》，是这一时期以后的发展潮流。其大本营设在东京大学法学部，原来的东京大学也在 1877 年改为“东京帝国大学”。德国的社会科学、哲学、经济学、历史学，几乎成了东京大学的“官学”。经济学界也以德国的历史学派、讲坛社会主义经济学为主要指导经济思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在日本的社会科学界，德文几乎比英文的地位还重要。但在私立大学如庆应大学、早稻田大学等仍讲授自由主义经济学，偏重英美的社会科学与东京大学经济学部（1921 年从法学部独立出来）相对抗。关于日本从明治二十年代以后所兴起的德国讲坛社会主义经济学、社会政策学会、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的发展情况，留待以后有机会再介绍。

“温故而知新”。在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今天，学习人类有用的经验和教训，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创立本国前进路线的必要参考。邻国日本近代发展的过程（除去对我国的自甲午战争以来的长期侵略罪行以外），日本在学习西方走向现代经济大国的经验和教训，可以说也有重新加以分析研究、深入探索的必要。

明治初期，经济学界在引进西欧经济学方面，不管是自由主义经济学也好，还是保护主义经济学也好，其目的和重点基本上是共同的，这就是发展本国的生产力和本国民族产业。因为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是发展本国的国民财富为目的的“生产力经济学”，以德国 F. 李斯特的“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为代表的所谓保护主义经济学，也是以发展本国的国民生产力，发展本国的农工商相结合的国内的统一市场为目的的。当年日本经济学界的这种风气与当前我国一部分经济学子和

出版界的只重视流行、重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经济学相比较，怎能不引人反思呢？

从明治早期日本引进西欧经济学的情况，还使我悟出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早在江户时代末期，日本就派出留学生去荷兰，大力引进西方社会科学和近代文明，形成了所谓“兰学”。而东方翻译西欧经济学的最早译本是日本神田孝平由荷兰文译成日文的“经济小学”。经济学的译名是日本学者根据汉文“经国济民”的涵义而创造出来的，这是十分合乎“political economy”本来的内容的。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不是为私人谋利的科学，它是为“国计民生”、“经国济民”的社会科学，与我国早期启蒙运动学者严复和梁启超等的译名比较，严复将《国富论》译为“计学”，梁启超则仿效严复译为“生计学”。经过时间的考验，日本的译名被引进中国广为人所接受，而“计学”、“生计学”的译名恐怕连知道的人也不多了。在社会科学方面我们从日本的翻译中，借用了许多汉文的译名，几乎俯拾即是，如会计学、簿记学、借贷表、银行、社会学、乃至社会主义等，举不胜举，这说明日本很早就向世界寻求知识，很早就有相当水平的社会科学的译著，正因为神田孝平等一批早期的启蒙运动的学者们，认真理解了西欧的社会科学的内容，所以他们转译汉字的译名，就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而我国的早期启蒙主义运动家对西方社会科学相比之下却理解得不深，所以译成的汉字译名，在后来几乎都为日本的译名所取代。近百年来日本重视发展社会科学，大力即时引进人类有用知识和学问，可说是居世界各国首位，不仅是经济科学，文学等其他学科可以说其翻译精益求精，不断有新的质量更高的译本问世。如《国富论》的

权威日译本至少有五种，《资本论》的权威日译本也至少有五六种之多。重视社会科学是东方国家追赶西方、走向现代化道路的极为重要的条件和基础。从明治早期引进西欧经济学以来，仔细回顾一下近百年来的发展过程，笔者也亲身体会到，重视人类的科学遗产，特别是社会科学的经典著作，加以不断吸收、消化，对一国的现代化何其重要！

问：“二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为世人瞩目，请您回顾学下与其相关的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状况。

答：作为科学体系的经济学本是西方市民社会的产物，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中落后的国家，不可能在它本国的历史土壤上产生出现代科学的经济学体系。马克思曾指出即使在19世纪前后的德国，它的经济学也是“外国的科学”。对于东方的日本来说，日本的经济学在本质上则更是“外国的科学”了。大塚金之助曾经在《日本资本主义发迹史讲座》中指出日本进口的经济学的性质，还称不上是“外国的科学”，而是“外国的庸俗经济学”。总之自从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直到战后80年代的现在，日本的经济学的性质，始终未能超越作为进口经济学或翻译经济学的范围。

日本的宏观经济学是在二次大战以后发展的，主要是在美国经济学的影响下起步的，它的性质当然是进口经济学、翻译经济学。据日本的一位宏观经济学的学者金森久雄的回忆，他在东京大学的学生时代（1948年毕业），在经济原论的教科书中，连凯恩斯的名字都没有提到过，他还是在财的课堂上，从大内兵卫老师那里听到凯恩斯的名字。那是

在凯恩斯去世（1946年4月）的两年之后，由于大内兵卫说凯恩斯的“管理通货论”是骗人把戏。这引起了他的好奇心，于是他开始去钻研凯恩斯的经济学，以后他进入商工省、经济企划厅、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继续学习了哈罗德、熊彼特、萨缪尔森等人的经济学。四十年的学习和研究，使他成为一位日本知名的宏观经济学家。^①

日本学士院院士、东京大学名誉教授馆龙一郎和我差不多同时在东京大学经济学部经济学科学习的，他回忆说，当时还没有什么“宏观”和“微观”这样的用语，对宏观经济现象的研究，多数是以周期循环理论的形式来分析的。当时受到学界注意的西方经济学家有哈耶克、威克赛尔、凯恩斯、罗巴特逊，还有希比特荷夫等。在40年代，日本经济学界，特别是大学的讲坛和理论界，对近代经济学的研究，为数很少，在一桥大学（当时的东京商科大学）有中山伊知郎，在东京大学有木村健康和安井琢磨。

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的一般理论》（国内译为“通论”）是1936年出版的，日本的译本是在1941年由一桥大学盐野谷九十九所翻译。当时对凯恩斯经济学的理解偏重于他的“货币论”和“货币改革论”方面，而对于凯恩斯理论的核心部分“储蓄、投资的收入决定理论”，在战前几乎还没有人研究过。即使对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的原理”有人注意，但真正能理解的却很少见。故战前日本各大学的经济学部的课程中，只有经济原论，而不像战后的课程那样，有马

^①参见金森久雄：《法学士的经济学》，日本学士会会报，1986年一 I. NO.77号。

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近代经济学的并存。所以日本的宏观经济学是在战后，特别是在战后美国经济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但是日本的近代经济学的开展，并不能像美国那样毫无阻力地很快就可以进入大学讲坛的。日本自 20 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和传播，早就有深厚的基础。日本投降后，由于日本社会历史的客观要求，民主化运动风起云涌，摆脱了封建势力和军事法西斯的控制，许多曾经受迫害而离职的东京大学教授，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的和进步的经济学家，像大内兵卫、山田盛太郎、有泽广巳、协村义太郎、矢内原忠雄、木村健康等，都纷纷回到东京大学经济学部的讲坛。当时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席卷了日本的经济学界，并且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直到 80 年代，日本的《资本论》研究仍然是世界上第一流的领先水平。战后日本近代经济学以及所谓宏观经济学的开展，经过将近十年左右的酝酿和准备的过程，50 年代后半期以后，才逐渐有所形成和发展。

那么战后日本宏观经济学对日本的经济政策发生了怎样的影响呢，又怎样和日本的经济政策结合呢？本来在资本主义经济处于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对于商品财的支出主要决定于财货本身的价格或工资等，而“收入”这个经济学上的概念，是在经济出现了不均衡的场合，即由于失调和工资的下向刚性的场合下才成为问题的。宏观经济学之所以在近代经济学中获得了它的地位，是在凯恩斯的《一般理论》出版以后，特别是在二次大战以后，才逐渐确立的，也就是说是在 30 年代前后的经济危机的历史条件下形成起来的，凯恩斯提出了“有效需求的理论”，对国民经济进行管理，以挽救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危机。

对战后日本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不可忽视的是在第一次吉田内阁，1946年石桥湛山任大藏大臣时期，他利用凯恩斯的理论，主张在失业人员很多而闲置设备又存在的条件下，物价上升不是真正的通货膨胀，只有利用积极的财金政策，扩大生产，才能实现真正的健全财政。有泽广巳教授提倡所谓“倾斜生产方式”，使日本早在1948年就恢复到战前的生产水平，而道奇的紧缩金融政策是在日本的生产恢复到战前水平之后才提出来的。战后日本经济的恢复与增长，从这里可以看出日本的经济政策的制定，与经济学家的直接指导是紧密结合的。其次对战后日本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不可忽视的另一重大事件，就是在1949年由都留重人教授执笔的《经济白皮书》。这个《经济白皮书》的理论体系和构想，对于日本宏观经济学的确立和形成，具有重大的影响。

进入50年代以后，凯恩斯经济学以及宏观经济学的许多用语，才日渐普及，成为新闻报纸上的经常用语。由于企划厅应用了宏观计量分析，在预测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一时甚至使人产生错觉，感到不懂宏观经济分析，就不足以谈论经济，以后经过60年代，直到第一次石油危机，日本的经济学界宏观经济学几乎成为主流的经济学，许多经济理论的论争差不多都是在美国凯恩斯主义的“新古典派综合”的理论体系内部进行的，而且多半和美国的经济学界的动态相呼应的。但在日本没有像美国的M.弗里德曼这样的反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所以对宏观经济理论的批判，除去在1968—1969年前后，激进经济学派对近代经济学展开了一场严厉的批判以外，其内部并没有太大的波澜。宇泽弘文和罗宾逊夫人的倾向相似作为凯恩斯主义左派经济学家，对“新古典派综合”

进行了系统批判，写了《近代经济学的再检讨》（1977）。他试图在七十年代的“经济学的第二次危机”的时代，面对现代社会所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以及它的发展前途，重新考虑近代经济学的体系。宇泽弘文企图建立动态的不均衡状态的宏观经济理论，提出了“社会共同资本”的概念。日本的宏观经济学的水平，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已经打下了广泛的牢固的社会基础。

但是战后日本的现实的经济政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影 响，这在学者之间，意见并不一致。在日本很明显地利用财政、金融政策来刺激景气，还是在 70 年代以后。总之，日本的宏观经济学迄今为止，还是作为进口的翻译经济学，受美国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影响所左右，特别是汉森、莱奈、马斯格雷夫、萨缪尔森、托宾等人的经济学支配着日本的近代经济学。虽然美国凯恩斯主义受到来自货币主义、合理预期学派以及供给学派的批判，但日本的近代经济学的主流，仍然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至于作为宏观经济学的货币主义、合理预期假说以及供给学派经济学虽也受到理论界的注意，但并不像在英美那样占主流地位。由于世界资本主义战后体制已经崩溃，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关头，客观历史的现实也反映在经济学的理论本身上，70 年代以来的经济学的第二次危机，在日本也同样存在。战后日本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重大“成功”，在经济政策的制定方面并不完全是由于宏观经济学的贡献，而更主要的是由于战前多年来日本经济学界对西方古典经济学、历史学派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深厚积累。日本有名的近代经济学家，中谷岩在《宏观经济学入门》中，曾指出日本和美

国在石油危机以后，在许多问题上，采取过类似的经济政策，其效果则迥然不同。1974年的物价狂涨很快就平息了下来，日本的失业率比之欧美各国都低，这些都不是由于宏观经济学有什么神通，如果它真有神通，何以反而在美国、在英国却不灵呢。问题主要在于各个国家经济体制的运行机制的不同，例如在日本，它的企业经营的现实体制、工会的特殊组织、特殊的金融管理结构、产业组织和体制等等。如不进行分析，具体研究，抽象地空谈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都是无济于事的。还有一位辻村江太郎在一本小册子《日本的经济学家》中，指出现在日本产业的活力以及国际竞争力的基础，是日本型的经济体制的特殊结构，它不同于欧美，也不同于日本的战前。他说这种日本型的经济体制，很接近于亚当·斯密和L.瓦尔拉斯所梦想的“自由竞争市场体制”。使日本形成这种特殊经济结构的许多因素当中，其中有一个主要因素，这就是由于直到战前为止日本的经济学家们，通过他们的研究和努力，对本国经济现实和经济理论之间，有了一个经过比较分析研究之后的正确认识。我觉得这些教授的深切体会，很值得我们记取。

问：美国著名的加尔布雷思教授曾赞扬《国富论》、《圣经》和《资本论》是人类的三大法宝，对此，您是挺赞同的。并且，您本人对中外社会发展的“近代化”与“现代化”问题也颇有研究。另您也主张，现在不应再用“西方经济学”的提法，而应用“现代经济学”，请具体谈谈您的看法。

答：首先经济发展（economic development）不同于经济增

长 (economic growth), 经济发展必须考虑到本国的历史的社会文化的发展而稳步迈进。然而“自然是不能飞跃的”, 一国的社会历史的发展阶段也是不可能“飞跃的”。一声号令就可以进入“社会主义”的沉痛教训, 我想人们必定记忆犹新。

我们日常所用的“现代化”用语, 当然是来源于“modernization”的翻译, 但是人们的理解, 并不一致。本来“现代化”(modernization)是历史的发展概念, 是指从中世纪走向近世纪的近代化(modernization), 也就是从封建的黑暗的中世纪社会走向近代的市民社会的历史发展。在这里统治人们的“神权”和“君权”被推翻, 而“市民阶级”作为新兴势力, 形成了“人民的政权”。所以从历史发展阶段来理解“现代化”(modernization)的概念, 应译为“近代化”更为合适。“近代化”概念最基本的特征是: 近代的产业资本从中世纪的封建的商业资本的控制下摆脱出来, 使商业资本纳入于产业资本的循环运动中为生产资本的发展服务, 而不再是从流通过程中吸取其利润, 它只能从平均利润中获得它应得的份额。这样就能促进生产, 壮大社会的财富。这一经济发展过程人们称为“产业革命”, 也就是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 市民阶级的抬头。

社会上往往将“现代化”概念单纯理解为“工业化”, 这样就忽略了它的最重要的特征, 即一定社会历史的文化的性格和阶级内容。因为在封建统治社会里, 也提倡“工业化”, 也能实现“工业化”, 这种“工业化”的力量反而会增强封建阶级的统治势力, 巩固他们的地位, 镇压下层庶民和工人农民, 这类“工业化”当然不是历史的科学意义的“近代化”。所以把“现代化”单纯理解为“工业化”是不全面的, 也是

不科学的。更何况这类所谓“工业化”，却带来了生态的灾难，江河的污染，都市不见天，地上垃圾堆，生民受涂炭，文化大倒退，这不是“近代化”而是大后退呢?!

我毕生所追求的“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与祖国的现代化”的课题，是从祖国的实情出发，寻求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灾难深重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走上文明富强的现代化国家。经过漫长岁月的探索，笔者坚信，“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这种比喻是不适用于一个国家的历史的发展规律的，在现实中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只有立足于本国的现实的历史发展阶段，根据本国的实际国情，去吸取人类历史的精神财富。人类历史上走上“近代化”的最典型的先进国家，也即最早从封建统治势力中挣脱出来，走向自由的生产者阶级、工厂手工业者、工人和农民，推动“产业革命”的是英国。针对这个时代历史课题的经济学著作是“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76年）。斯密的《国富论》是反封建的，是发展新兴阶级生产力的“近代化”的理论武器。美国的加尔布雷思教授曾经赞扬《国富论》、《圣经》和《资本论》是人类的三大财宝。事实也是如此。《国富论》至今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寻求“近、现代化”的理论宝库。

但是 19世纪中叶的德国，和 18世纪的英国一样，也面临发展本国产业资本走向“近代化”的历史课题。当时，在强大的英国产业资本势力的进攻下，加上德国本身的追随英国产业的德国北方的自由贸易的商业资本的泛滥，要发展德国的产业资本，推翻本国的封建势力，为德国的近代化而奋斗的德国的经济学家，就不能只依靠于引进英国的经济学来帮助德国的“近代化”，解决德国产业资本发展的问题。针对

祖国的现状和国情，为了祖国的利益和发展，伟大的爱国主义经济学家弗·李斯特（1789~1846）花了毕生的奋斗和心血，写了《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建立了从本国立场出发的“国民经济学”，特别强调发展本国创造财富的生产力。他认为创造财富的生产力比财富本身还更为重要。他的著作成为影响当时处于发展中国家如美国和日本走向近代化的重要著作。李斯特也曾参加了当时美国发展国民经济和走向近代化的运动，写了《美国经济学大纲》。

我认为处于发展中地位的落后国家，在要求走向“近代化”（现代化）的时候，必须冷静地认真学习那些经过人类历史实践检验并受人们公认的经济学的经典著作。在浩如烟海的经济学著作中，有各种各样的流派，笔者认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弗·李斯特的《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是代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从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的基本经济理论的武器。它们都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经济学，也是“过渡时期”的理论武器。

然而在世界资本主义已经进入成熟，社会矛盾尖锐，新兴阶级的劳工大众的生产力受压的时代，我们就不能只满足于追求“产业革命”的“近代化”的理论指南，马克思的《资本论》作为解放工农大众的生产力的理论武器，也就必然要成为我们追求“现代化”的指南。由于我国处于生产力落后，产业资本还很不发达的初级阶段，我们既要学习亚当·斯密为英国，和李斯特为德国的产业资本的发展所提出的基本理论，以追赶世界的发达国家，但同时又必须避免走资本主义老路所招致的人民的苦难，所以我们又必须以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为基础，将斯密、李斯特和马克思这三位伟大的经济

学家的基本理论，作为我们建立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所应参照的理论依据。日本明治维新以来，一直以亚当·斯密和李斯特的基础理论为建立国民经济的指南，发展生产力，追赶西方发达国家；但由于 19 世纪的历史条件，日本可能受到马克思《资本论》的教导，虽然它也曾学习德国采取了许多社会政策，缓和国内矛盾，但却把矛盾引向海外，走上了侵略邻国的帝国主义的道路，最终也仍然要受到历史规律的惩罚。所以一个国家在走向“近、现代化”的道路上，在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方面，作为人类智慧结晶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弗·李斯特的《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和马克思的《资本论》的三大经典，可以说是天赐的理论法宝。因为这三大经典都是不同历史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结晶，而且经历了人类历史的实践的检验。

人们可能还记得，英国产业革命的前夜，为了英国的“近代化”向当时的封建贵族、地主阶级、行会等封建统治势力发动进攻的新兴势力，是英国当时的“中产阶级和下层人民”，也就是第三阶级和第四阶级的联合，经过艰苦斗争，才获得胜利。直到 1832 年英国选举法修改前为止，这两个新兴势力都是联合一致，向封建势力斗争的，但选举以后，只对第三阶级有利，迫使第四阶级离开。即使到了 1846 年为撤消谷物条例而斗争时，工人阶级还是和第三阶级站在一起，进行联合斗争而获得胜利。在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中，直到增补“机械论”一篇以前，资本家的利润和工人的工资这二者还一直和地主阶级的地租相对立，以后才逐渐出现资本和劳动的对立。

在我国的抗日战争年代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新兴的中

产阶级、民族资本家也一直和中国的工农大众一起，争取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也争取了推翻三座大山，获得全国解放革命战争的胜利。回顾中外为争取“近代化”斗争的历史，笔者深信在我国走向“近、现代化”的道路上，在建设祖国“国民经济”近、现代化的道路上，认真学习亚当·斯密、弗·李斯特、卡尔·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加以消化，人们就会发现马克思的经济学与亚当·斯密和弗·李斯特的经济理论并非如想象的那样只有根本对立而无相辅相成的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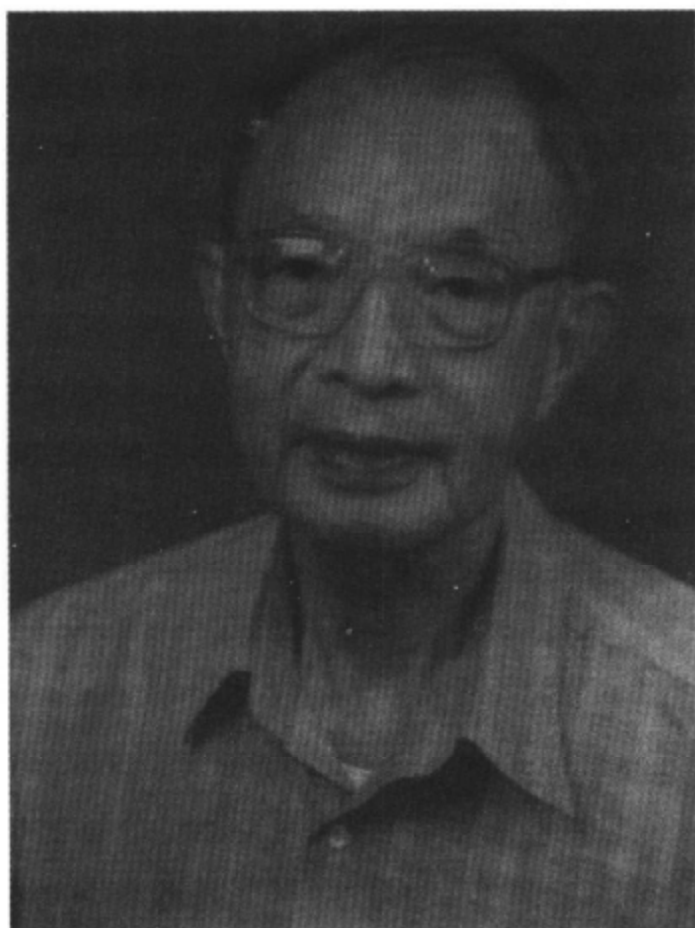
虽然我在东京大学研究院时代就已开始这方面的思考，坦率地说，已写了一些文稿，但还未能将自己的构思形成“综合体系”的著作。

至于不使用“现代西方经济学”而直接用“现代经济学”，理由很简单，过去在我国之所以加上“西方”字样，是为了标明其资产阶级的特征以区别于马克思经济学的。但现在我国已经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人们正热情地学习“现代西方经济学”，已经不再认为它只是“西方”的而“东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不能用了，相反，学习“现代经济学”还是十分重要的经济知识和市场经济的理论手段。我国的报刊杂志、政府文件，到处都使用“现代经济学”的概念和范畴，在大学讲坛几乎完全作为主课，让学生学习许多市场经济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根本已不再表现为“西方资产阶级”的特征。如仍坚持旧有用语，不仅会使人们产生不必要的混乱和画蛇添足之感，甚至还有自相矛盾而不自觉之嫌。

但在肯定现代经济学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它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的同时，也要注意我国仍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地位，特别是中国的市场经济还应认真考虑到我国的发

展阶段和社会主义的特色，决不可忘了笔者在上面所讲的经典经济学对我国走上近、现代化所具有的重大现实意义。同时对现代新古典派经济学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是美国金融资本世界经济霸权主义的糖衣炮弹，不能不予以警戒和必要的批判。过去我们犯过生搬硬套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今天我们应特别警惕避免犯美国式的现代经济学的教条主义。不加分析，不下苦功，不考虑本国实情，照抄照搬，必将危害国家的命运。以上我不完整的想法但愿能引起我国青年经济学子注意，在热心钻研现代经济学的同时，要充分重视人类历史上的反映一个国家走上近、现代化过程的经典经济学的理论，深入地学习亚当·斯密、弗·李斯特、卡尔·马克思的经典经济学和他们的人品，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努力，则幸甚矣！

《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对话(第六辑)》
新中国计量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林少宫



林少宫先生近照

林少宫简历

林少宫，1929年12月生，广东信宜人，1944年重庆中央大学经济系毕业，1952年毕业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论文被《美国经济评论》分类为统计学与计量经济学，曾任美国俄亥俄州地顿大学统计学和经济学讲师。1954年回国。原任华中工学院数学系教授。现任华中科技大学特聘教授，经济学院顾问，数量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主任，计量经济学博士生导师，并担任中国现场统计研究会名誉理事长，中国数量经济学会顾问，《数理统计与管理》杂志名誉主编，中国工程概率统计学会名誉理事长等。1991年以来，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主要业绩：

1960年著有《基础概率与数理统计》，填补了国内的空白。该书至1980年已第2版第7次印刷。1961年写就《信息论讲义》，领先在原华中工学院讲授。1962年应邀完成《序贯分析与应用》一文，为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做特约学术报告。1970年推广应用正交设计，从因素筛选到定向探索，再到优化推进，拟定了一套简单易懂而又有普遍应用意义的模式，先在武汉市化工研究所取得优异成绩，随后被引用为工业试验设计的一项经验成果。因此，他在《正交设计在合成有机硅化合物中的应用》（1975）一文中所总结的“因素筛

选、定向探索、优化推进”研制过程，曾被编入国内一些实验设计教材中。1977年根据实际应用经验，利用极差代替F检验，与吕梓琴合作编制《正交试验极差临界值系数表》，大大加速试验的分析计算工作，1978年三机部将其纳入《应用数学成果巡回展览》，在我国广大工农业生产试验中一度被广泛采用。1978年完成农业正交试验系列论文9篇，注释部分析因设计的原理与应用，获湖北统计学会优秀论文一等奖。同时撰写了大量正交设计论文和普及读物。1979年与中国科学院张里千教授等共同创建中国现场统计研究会，该会由于研究和推广应用正交设计至今已为社会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1982~1989年期间3次被全国科协、全国质协等评为“全国优秀质量管理工作者”。1980年代后，工作逐步转到经济学领域、致力于数量经济学教学与研究。1984年获国家经委、国家科协等6单位授予的全国优秀质量管理工作者称号。1985年以来陆续出版著、编、译数理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多元统计学方面的教材、辞典和手册等十余种。1987年担任武汉中美经济合作学术会议中方主席与美方合编会议论文集《中国现代化与开放经济改革》1990年在美国出版。1989年被中国质量协会推为质量管理名誉学术顾问。2000年联合海外校友经济学家在华中科技大学成立数量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着重于经济学前沿发展研究及现代化、全球化经济与金融学人才培养。出版有《现代经济学、金融学前沿发展》（北京·商务印书馆）、《微观计量经济学要义》（武汉·华中科大出版社）等前沿读物。

问：林老，您好！作为中国少数几位杰出的计量经济学家，您与数理统计、计量经济等在一般人心目中感到高深莫测的学科结缘已有半个多世纪，并取得了国内外公认瞩目的杰出成就，请谈谈您从事数量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经历。

答：我是国内有幸较早接触数理统计的人之一，说起来，还与我的姐夫崔明奇教授有缘。

20世纪40年代初抗战期间，崔明奇教授正在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数学系任教。当时中国的数学界有三大流派（或分支）：（1）苏步青先生的几何论；（2）陈建功先生的函数论；（3）崔明奇的概率统计（抗战胜利后都在上海复旦大学得到了发展）。而巧在我当时教中学正住在姐夫家里，因为从小数学基础较好，加之有姐夫的适当引导，所以对数理经济、概率统计很着迷，尤其是对其中的正态分布和中心极值定理特别感兴趣。还记得在1946年就译了一本崔教授给我的J.A.熊彼得（Schumpeter）等写的《经济数学梗概（*Rudimentary Mathematics for Economists*）》，并与上海商务印书馆签订了一出版合同。

1947年，我赴美留学深造，1949年进入伊利诺伊大学经济系，获识周华章先生，当时他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经常把考尔斯（Cowles）委员会的学术活动传达给我，引起了我对计量经济学的好奇心和浓厚兴趣，以致我后来把我的博士论文写成计量经济与统计学一类论文。说实在的，当时的美国也没多少人真正懂得什么是计量经济学。所以，当时美国统计学界、经济学界、数学界的公认大师——北卡罗林纳州大学的H.霍特林（H. Hotelling）教授，看到了

我寄给他我的这篇论文时，曾热情安排我到 he 那里去工作和学习。这本来是一个十分难得的好机会，但国内有两位我一向敬重的人物都鼓励我回国工作。一位是我的姐夫，也是我的学术启蒙人——崔明奇教授，他曾在信中劝说道：“国家现在不仅需要千百万统计人员，还需要大量培养统计人员的学者”。另一位是我的叔父——当时任新中国教育部副部长的林砺儒，也就是被科学大师钱学森所盛赞的那位“北师大附中校长”，这位叔父一直都很关心我的成长，并教育我如何做人。他在信中说：“你回来，不知道有多少工作在等着你。”想到出国时，自己曾许下“学有所成，报效祖国”的志愿，所以，我在知心伴侣的支持下，毅然于 1954 年回到祖国。

回国后，由于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挺落后亟待发展，教育部首先把我分配到新疆民族学院，我和夫人欣然接受。但当新疆方面了解了我的情况之后，认为如果我到新疆，限于当时的情况，也只能教中学数学，是很大的人才浪费！所以希望教育部和我本人认真考虑。

而那时巧逢华中工学院（即今天的华中科技大学）刚组建，我便被重新分配到华中工学院数学教研室。那时，我的研究领域侧重于应用数学和概率方面。

年“反右”之前，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钱学森曾计划调三四个人到他那里搞运筹学研究，我就是其中之一，钱学森当时想把我的人事关系调到清华大学，但人在中科院工作，清华大学也透露调令已下，下周就发，但下周便开始“反右”了。从此，我就在武汉喻家山下从事教育事业至今。

¹⁹⁶³
1957 年我出版了《基础概率与数理统计》一书，可算是国内最早的较标准的教材，因为以前有过一些这方面的书，

但都编写得较抽象，加之，数理统计本身就较难理解，所以，当时确实没多少人能懂，而我第一次把总体和样本的区分讲清晰了，也把计量经济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假设检验讲透了，也就为实证研究打下了基础。所以我认为此书好似为读者和学生了解数理统计知识打开了几个小窗口。

1962年，中科院曾邀请我主讲过序贯分析等前沿方面的内容，之后，湖北省方面也较重视，在武汉成立了“概率统计运筹委员会”，让我负责分管这部分工作。

所以，我早在60年代就较多考虑过怎样把概率统计应用于计量经济学方面。顺便带一句，由于那时政治气氛影响，许多理论研究都是“危险”的禁区，而我的领域相对“安全”。记得杨小凯先生笑说过（也有批评的意思）我躲在“避风港”里（大意）搞经济研究。

1981年，我应邀赴美国开会（主题是讨论美国—亚洲经济合作）前夕，写成了《正交设计在经济中的应用》一文，交与大会，但被拒绝了。后来，与张培刚教授合著了《中国经济再调整与贸易前景》一文，才被认为是适时的实用之作。

问：概率统计和经济研究难道真的有什么特殊关系？

答：当然，搞概率统计和搞经济研究不是一回事。但二者不是没有联系而是有着深层的内在关系的。198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T. 哈维谟（Haavelmo）在1944年写了一篇很长的论文《计量经济学中的概率观点（The Probability Approach in Econometrics）》，可是当时没有几个人能接受他的观点，这也在他的意料之中。但他对他的观点作的辩护是很有

道理的。他说，计量经济学的常规方法是先根据经济理论构造变量之间的一个准确的函数关系，然后通过实际测量判断这个函数关系的好坏，这种判断用到了统计推断作为手段，并且这样做已被人们接受和认可。那么，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在经济研究中采用一定的概率模型就被认为是一种“罪过”：被认为从根本上歪曲了经济数据的实质？于是他质问，难道统计推断不是建立在概率论的基础之上的吗？

经济学家不愿意接受概率模型作为经济研究的基础，是因为他们对概率和随机变量的狭隘理解，没有能够把一个样本点看做 n 维联合概率分布（不一定是 n 个相互独立随机变量的）的一次抽样结果，而且不理解把一种真实现象 A 看做 A 的出现概率几乎是 1，在逻辑推理上是方便的。

把经济研究建立在严格的概率基础上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把经济理论的建立自然地看做一种统计假设（假说）。

哈维谟确实有远见，无怪乎他 1944 年的论文为他赢得了 1989 年诺贝尔奖。

我因在读大学和研究生期间都选修过高等统计学课，同时也花过许多时间勉强领会了统计假设检验的深刻涵义，所以能够接受哈维谟的概率观点，并且倾向于认为概率观点奠定了未来计量经济学的发展道路。虽然钻研概率统计和经济研究表面看来不是一回事，但由于两者的内在关系，前者至少能为后者作重要甚至必要的准备。现在经济系本科生都得修一门概率统计课（在我看来应适当包括实验设计），不是很好的见证吗？可是在上世纪 50 到 60 年代，这一点还不为一般经济学家所预见。

问：请简要介绍一下数量经济学和它在我国产生与发展的情况。

答：数量经济学包含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是以现代经济理论为基础，运用现代数学方法特别是统计学为其计算工具，通过对经济变量之间数量变化规律的研究，揭示经济运动内在规律性的一门科学。它的诞生可以追溯到 1690 年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Wm. Petty）《政治算术》的出版。1933 年美国经济计量学会的成立及《计量经济学期刊》（Econometrica）的出版，是它正式置身于经济学科舞台的开端。50 年代以来，电子计算机及计算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数量经济学的繁荣，从而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学成了计量经济学的时代”。数量经济学与技术经济学作为我国经济学的两大新兴学科，在研究中广泛采用了现代经济理论的成果和经济数学方法，并具有鲜明的交叉学科特征，因而具有了其他经济学科难以替代的优势。

利用数学、数理统计学方法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管理问题，在我国走过了一段曲折的路程。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我国经济学界和应用数学界一些有识之士曾倡导学习、研究西方经济学中的定量分析方法。但在十年动乱期间，这种倡导遭到了批判，使刚刚起步的研究工作停顿了下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数量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在我国又逐渐兴旺起来。1979 年，在北京成立了数量经济研究会。1982 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立了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所，创办了《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杂志。从 1982 年起，每年召开中国数量经济学年会，促进了我国数量经济

学的发展。1981年我国编制了146种产品实物及26个部门的价值表，同时推出了中长期计划模型、宏观计量经济模型。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从1983年起组织各方面专家，运用系统分析方法，对2000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行多层次的分析、预测。不少省市先后编制了不同类型的地区投入产出表，山西、广东、湖北等地在此基础上还建立了地区发展综合模型。特别是近年来经济体制改革的洪流，把年轻的数量经济学推到了应用的前沿。2002年9月，国家标准《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第二版）》修订工作阶段性成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口模型、能源模型、科学教育模型、环境保护模型等部门模型已经编制完成或在改进之中。建模方法已由初期单一的计量经济模型、最优规划模型发展到综合运用多种数学方法。数量经济学的应用，冲破了多年来决策部门忽视定量分析，仅凭经验看待社会经济运行的观念，为我国经济学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不少经济模型为经济体制的改革、国民经济的宏观控制提供了有价值的政策建议。在这些（以及其他）方面乌家培教授作过多次精辟的权威性概括，我就不多说了。

问：据说您是很强调“实验设计”在经济研究中的重要性的，能否解释一下其中缘由？

答：实验设计是数理统计中很重要而又挺难掌握的一个分支，许多读者因为不知道其中的实验计划是怎样安排的，所以对实验结果的分析总觉得不甚明了。但为了把一些事物的真相弄清楚，往往需要通过精心设计的实验才能达到目的。

举例来说，传统经济学认为人是理性的，可是通过实验现在发觉此假设不真。正如 200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所揭露的，“人是有限理性的！”又如认为“人是自私自利的”也不完全解决问题，且此说法有悖于中华传统美德。再如典型的环境污染问题，这涉及到“公共产品”，是价格竞争市场解决不了的，即无法按市场定价来估算清楚的。所以，必须要靠微观计量设计，即只能通过实验设计与计量经济的结合，才能较精确地测算出结果。由此可见，实验设计的用处是很广泛的。说实话，以前我的研究不太被人理解，也没办法，只能等待时机，而现在有著名的诺奖获得者来佐证，我就可以大胆地讲“实验设计”，并不是我个人的“古怪思想”。顺便说一句，我早些时候在钻研数理统计和概率论时，就已经不愿回头改行了！但我也时刻不忘，应将这些知识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去。我的观点是：“现在有许多事情、问题，在没有做实验设计之前，都不能简单地、轻易地下判断，出结论。”

还有，现在的实验经济学，目的是为了搞清因果关系。所以大家的研究是除一个因素外，都是以其他相关因素不变为前提的，而近代数理统计学的创始人 R.A. 费舍尔（Fisher）批评此前提是错误的、过时的。但我觉得，在某些情况下，仍有必要而且必须保持此前提。否则，难以搞清问题，如上述提到的环境污染现象，进一步分析，其中有互为因果的关系，而这种因果关系，对制定政策是非常重要的，也许政策就是它的结果！由此可见，费舍尔强调的“交互作用”本身正是告诉出了事故其中的原因。过去某些学者强调回归分析实际不过就是相关而已，而现在我觉得计量经济学的重点就是对政策的评价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必须找出因果关系。

回归分析也要找因果关系，否则，就等于没解决问题。

问：实验设计法的创造人 **R. A. Fisher** 曾为实验设计定下三大原理，而其中又特别强调“控制”的作用，这是为什么？

答：人们习惯于听说计量经济中的数据是非实验性质的，因此似乎没有什么实验设计可言。其实，实验设计不仅包括数据的获得（如来自实验室或来自社会调查），还涉及对数据的要求，估计的方法，等等。微观经济数据尽管不是实验数据，而主要来自现场观测，但由于它的“量体裁衣”性能，也未尝不可以如同做实验那样，要求数据具备这种或那种性质。至于估计方法，自然和数据的性质有密切关系：对已有数据应考虑如何尽好地加以利用；为了利用现有估计方法又要考虑需要什么性质的数据。因此，在微观计量经济学中，为使模型估计能个别地适合微观经济单元（如个人、厂商或地区），谈如何设计数据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实验设计曾是数理统计学的一个分支，它的创始人 **R. A. Fisher** 早已定下实验设计的三大原理，即局部控制（local control）、随机化（randomization）和重复（replication），至今被科学实验工作者奉为圭臬。这三大原理的核心在于控制，对计量经济学来说尤其如此。为了做好政策评价或事件研究，需要找出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这时往往要求我们设法控制除一个因素（变量）外其余因素均保持不变。最小二乘多元回归之所以被普遍应用，其主要原因之一也就在此。

在开展讨论实验设计三大原理，特别是局部控制或简称控制之前，不妨比较一下 **D. McFadden** 在《如何量化环境损

坏或改进的经济价值》一文中所提出的评价实验三原理：

1. 选择可与“处理（treatment）组”相比较的“对照（control）组”。

2. 如果混杂变量（confounding variables）不能保持不变，则需设法（用统计方法）校正之或通过随机化而使其中性化。

3. 利用已知的解答，作为基准。

以上第 1 条是要设不受处理的对照（或控制）单元；第 2 条是要控制住起混杂作用的变量（或因素）使其保持不变，或通过随机化以抵消其影响；第 3 条相当于重复别人的或自己过去的成功经验，看成功的结果是否重现以及误差如何。可见 D. McFadden 的评价实验三原理与 R. Fisher 的实验设计三原理一脉相承。“控制”仍然是实验设计的核心。

问：您认为在回归分析中控制什么？具体又怎样控制？

答：我们知道，一般说来，对同一解释变量在简单回归和多元回归中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出来的回归系数是不相同的，在含不同解释变量的多元回归中，这个估计值也是不同的，除非数据矩阵是正交的。在一个多元回归中应含多少个解释变量就是一个控制问题，把某一个解释变量放到回归方程中，根据最小二乘法原理，就说是对该变量作了控制。这正是把解释变量叫做控制变量的原因。例如考虑教育的回报，如果把工龄作为另一解释变量放进回归方程，就说对工龄的变异作了控制；最小二乘法的使用就是用统计方法保持了它不变。同样，再放进其他变量，其含义也是类似的。为了说明回报的变化是由于教育的变化这种因果关系，显然有必要对同时

影响回报的变量（如工作经验）加以控制，使其（在统计上）保持不变。反之，如果不把工作经验放进回归方程，则说回报（结果变量）被工作经验（待控变量）混杂了。正交设计的思想正是要使解释变量数据矩阵正交化。如果教育数据和工作经验数据正交，教育回报就不会被工作经验所混杂。

正交设计是一种用均匀混杂来消除混杂并且同时分析多个因素的好方法。它来自析因设计，有过辉煌的历史。

正交实验设计也好，多元回归模型也好，为了控制某因素不变，只需把它作为因素包括进正交表或回归方程之中。这虽然容易做到，但要求这个因素变量是可被观测的（observable），如果它是不可观测的或难于观测的（unobservable），则如何加以控制，仍是个问题。

另外，当解释变量作为一个政策变量时，人们都想知道这个政策的效果，这个效果将体现在受政策影响的人和不受政策影响的人在政策实施后的差别，那么这两部分人需要有可比性，也就是这两部分人除了受和不受政策影响外，在其他多个方面都应该是相同的（或者说越相似越好），这也是一种控制。因此，控制好调查（或观测）对象的分配，使得“处理组（受政策影响者）”和“对照组（不受影响者）”有可比性，是重要的。这个问题看来简单，具体做起来并不容易。有许多复杂性和灵活性需要具体分析。

处理组与对照组的设置来自生物、医药试验。一种新药或疗法效果如何，要在处理组与对照组之间反复进行比较才能得出结论。同样，一种教育政策或培训方法效果如何？一条法律的颁布，一项措施的执行，一桩事件的发生在哪些方面发生影响？都需要在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进行比较。用回

归的术语来描述，可用一个虚拟变量的取值以区分处理组和对照组。例如，对受事件影响者，虚拟变量取值 1，代表处理组；而不受事件影响者取值 0，以代表对照组。金融市场常受某一事件的影响而出现新的波动，那么在事件发生前（后）的市场情况可用 0（1）表示，以代表对照组（处理组）。考虑到一个化工厂的建立会影响附近房价，那么靠近该房的房屋为 1，远离的为 0。但这些房子除远近不同外，其他方面应尽可能相同，或者通过目的抽样使之相同，这就是控制（组）的涵义。事件或政策的出现，虽然不同于医药实验，但都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自然的实验”。

在农业实验中为了研究新肥料或新耕作方法，常设对照组以资比较，要求在同一块土地上（代表同样的土质，同样的其他自然条件），按原肥料或原耕作方法种植，作为对照，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按正交表做试验时，常把全部是 0（或最低的编码）的组合，当做控制组。但把对照组的概念移植到计量经济学中来，还是微观计量经济出现后使实验设计有了用武之地，才逐渐引人注目。

问：如何看待实验设计中的数据要求与数据利用？

答：实验设计的核心问题在于对数据的（可能的）要求，而对数据的要求又决定于所关注变量的性质，以及对现有的（或待开发的）估计方法的利用。例如，化学家关注某种催化剂用量对产品收率的影响，要求有严格控制温度与压力下的实验室数据；农学家关注某施肥量对农作物产量的影响，需要在土壤和气候差异得到适当控制的条件下记录田间试验数

据，并且希望通过试验的重复而减少误差；劳动经济学家关注城市失业率对犯罪率的影响，需要能比较过去与现在犯罪率的（至少含两期的）综列数据，等等。

例如，在估计教育的回报中需要控制家庭背景的差异。一个人的收入不仅决定于他的教育水平，还决定于他的工作能力、家庭背景，等等，为控制家庭背景的不同，研究者常利用兄弟或姐妹的教育数据做配对实验，甚至用到孪生兄弟或孪生姐妹的数据，以更好地通过对姐妹数据取差分，消除家庭背景（看做固定不变因素）对回报的影响。考虑孪生姐妹（或兄弟）不但有完全相同的家庭背景，还会有基本相同的工作能力（自然定有相同的种族、年龄和性别），所以最好收集她们的教育和工资数据做教育回报的估计。虽然姐妹数据不是综列数据，但不妨把姐姐的数据看成一个时期的数据，而妹妹的数据看成另一时期的数据，就能用综列数据法中的差分法。

孪生姐妹样本是所谓配对样本（*matched pair samples*）的一种特殊情形，而配对样本又是所谓聚类样本（*cluster sample*）的一种特殊情形。聚类样本指横截面数据集里的每一个观测单元都属于一个明确定义的聚类。例如把每所学校看做一个聚类，从多所学校抽样得到的学生教育数据构成一个聚类样本。类似地，根据研究项目的不同，还可把每个家庭看成一个聚类，或每个厂商看成一个聚类。因为一个聚类之内的实验结果很可能是相关的，所以当我们认为有不可观测的聚类效应与解释变量之一或多个相关时，所谓的固定效应估计方法就派上了用场。再因每个聚类的大小很少是一样的，所以还常要用到所谓非平衡综列数据（*unbalanced panel data*）

的固定效应法。

用主元法（principal components）寻找最显著的自变量组合也许是个好方法，并不像一些人所认为的，这样的组合缺乏经济意义，难于作经济解释。正好相反，这样做有着相当明显的经济意义，即为了达到最好的经济效益，往往需要多个自变量或控制变量一定的组合，问题仅在于主元法未必能准确地找出最优的组合。由于不可避免的抽样和观测误差，要求我们能灵活地看待并处理由主元法找出的各个解释能力由大到小排列的正交组合成分。至于主元法受测量单位的影响这一困难是可以克服的。重要的是，作为生产函数的投入，诸生产要素确实要求有一定的“最优”组合；为了培植农作物的生长，各种施肥量要有一定的比例，还要配合以一定的耕作方法；作为政策变量，各相关政策也要有一定的配合。多重共线性数据的利用，关键在于寻找控制变量的“最优”组合，从而得以估计非严格意义下的“可估函数”。

问：对于目前随机化的普遍应用，您是怎样理解的？

答：目前许多所谓随机抽样并不随机，因为“随机”要求概率均等，不是随便就可以做到的。但首先要充分认识“随机化”的重要性。

假定全国适合种植水稻的田地有 $1/3$ 是上等田， $1/3$ 是中等田， $1/3$ 是下等田。为了考察一种新肥料能增产多少水稻，最好是安排做实验的试验田中有上、中、下等田各 $1/3$ （这相当于一种简单的分层抽样），以表示试验结果的客观性。如果事先知道哪块田是哪一等级就很好办；但如果事先不知

道，则可用随机抽样的方法，随机地安排试验田，希望当样本足够大时，上、中、下三个等级的田地 in 试验田中各占的比例将足够接近于 $1/3$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当然，实际上土质的变化近于连续变化，而不能简单地分为三个等级。农作物的产量（由于可观测或不可观测的种种原因）不免有（波动）误差，我们暂且假定所有等级的稻田产量都有相同的误差。

随机抽样或取样的随机化在实验设计中的作用，正是弥补了我们知识的不足。我们选择试验田时，不可能对一块田地 in 总体中（如在全国范围）的代表性知道得一清二楚。为了增进对照组和处理组之间的可比性，常常把相似的观测对象随机地划分为对照或处理组。例如，为了判断招工中是否存在性别歧视或年龄歧视，除了要控制好其他影响招聘的因素外，还要选择好有代表性的雇主或厂家，统计一下他们的表现。怎样挑选雇主，随机抽样就派上了用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选择样本（或目的样本）和随机样本表面看似互相对立，其实相辅相成，都是为了试验结果有可比性，以利于作出正确的因果性判断。最终目的并无二致：为了控制除一个因素外，其余因素不变。

“自然”实验和“真实”实验的区别，是在真实实验中，处理组和对照组总可以要求随机地分配，而在自然实验中，对照和处理组均来自某个具体政策对特定人群的影响，随机地分配处理单元不一定能实现。

如果不用随机抽样方法将观测单元在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进行分配，就会导致所谓选择性偏误，著名的 J. Heckman

选择性偏误纠正，则又可以看做当处理与对照没有选择好时的一种亡羊补牢的补充控制方法。

不妨用两个时期分别表示对照组和处理组。Heckman 明确指出这两个时期的估计方程不仅在截距和斜率上可能有差别，而且在解释变量上也会有差别，怎样比较，怎样检验差别的显著性将涉及政策评价是否正确的问题。

问：近几年来，实验经济学被越来越多地运用到实际的研究、决策工作中去，其作用也日益增大，请举例分析一下其原因。

答：经济学中仍然有些问题是可以利用实验室数据去有效地解答的。凡是利用实验室数据去解释人们的经济行为，从而形成或证实经济理论，建议或评价政策的学问，都属于实验经济学（experimental economics）的范畴。由于经济和金融领域中的实验设计不断改进，使实验室条件逐渐逼近于真实，实验的结果能为经济学者提供富有价值的洞见，并在现实中得到了应用。实验经济学也因此迅速地受到重视，以致 2002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对实验经济学最有贡献的人 Vernon Smith。

实验经济学能做出一些什么独特的贡献呢？不妨看一些例子。

为了观察和分析股民对待风险的态度而进行实验室实验，必须在实验室中建立一种风险的环境，迫使参与试验的人在这些环境中作出决策并付诸行动。通过改变风险的性质和相应的回报，看他们怎样作出反应，就有可能了解股民是怎样

在现实的股市中采取行动的。这里最重要的是：能够在实验室中模拟真实的风险环境。一些竞价买卖活动如拍卖，是比较容易在受控制的实验室环境中进行模拟的，因此这类活动的实验结果可以为政府怎样设计拍卖提供参考。但更多的社会经济问题如教育政策的制定、医疗保险制度的建立，或对农产品的贴补，等等，其真实环境就很难在实验室中模拟了。

一般说来，带有博弈性质的行为，尤其那些能较简单地作出决策的情况，是比较易于实验室模拟的。最典型而简单的问题莫过于“囚徒的困境”，它的描述虽然简单，却在寡头竞争经济中得到了有价值的应用。下面是引自 J.E. Stiglitz 经济学（第二版，第 343—344 页）的一个数字例子。

下图给出了一个双头垄断的情况：其中每家厂商都可以通过串谋来限制产量或进行竞争。每个方格子左上的三角形中的数字为第一家双头垄断厂商的利润。而右下的三角形中的数字为第二家双头垄断厂商的利润。当他们从事串谋时，利润很高——在本例中，每家厂商都获得 10 亿美元的利润。如果第一家双头垄断厂商限制它的产量，而第二家双头垄断厂商不限制产量，那么，第一家厂商的利润下降到 4 亿美元，而第二家厂商的利润增加到 13 亿美元。其结果是行业利润下降了（原来为 20 亿美元，现在为 17 亿美元），因为只有一家厂商限制产量，产量较高而价格较低。如果第二家双头垄断厂商限制产量，而第一家双头垄断厂商不限制产量，这一结果是对称的。最后，如果两家双头垄断厂商进行激烈竞争，价格就会大跌，每家厂商的利润都下降到 5 亿美元。本例中，串谋的收益是巨大的：利润翻了一番。尽管如此，当处于这一均衡状态时，它们仍会相互竞争。

		第二家双头垄断厂商	
		通过串谋限制产量	不串谋
第一家双头垄断厂商	通过串谋限制产量	10 亿美元 10 亿美元	4 亿美元 13 亿美元
	不串谋	13 亿美元 4 亿美元	5 亿美元 5 亿美元

第一家厂商会想：如果我的竞争对手限制它的产量，而我也限制产量，那么我的利润为 10 亿美元；但是如果我不限制我的产量，那么我可以使我的利润增加到 13 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显然我不限制我的产量境况更好。如果我的竞争对手不限制它的产量，而我限制我的产量，我的利润为 4 亿美元；但是如果我不限制我的产量，那么，我的利润增加到 5 亿美元。在两种情况下——不管我的竞争对手怎么做——我不限制产量境况都会更好。第二家厂商也完全会这样想，而结果是非常清楚的：两家厂商都不限制产量，每家厂商的利润均为 5 亿美元，是他们进行串谋时的利润的一半。

如果两厂商准备长期交往，他们就会制定某种协议，比如说，每家寡头垄断厂商都声明，只要竞争对手不降价，它也不会降价。但这种协议能保证两家厂商进行合作（即维持串谋）吗？

实验倾向于表明，参与者往往采取这样的简单策略：尽管在短期内看起来是非理性的，但是，随着博弈的多次重复，可以有效地促成合作。

国与国之间的裁军协商过程，看来颇与此相似。先是“针锋相对”，如果你增加军备，我也增加。直到竞争对手各方相信这种威胁是实在的时候，才会出现裁军合作。

实验经济学通过实验室的实验数据，不但使我们看到社会经济行为达到均衡状态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对经济人的非理性行为提供了一种合理的解释。在实验室里能更好地做到“除一个因素外其余因素保持不变”，所以更有利于找出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当然，这仅是“有利于”，要找出真正的因果关系仍非易事。可以说，实验经济学为计量经济学出了一臂之力，我们仍期待着它们两者在探索事物因果的道路上有进一步的配合。

问：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在微观计量经济学方面作出卓越贡献的 **J. Heckman** 和 **D. McFadden**，标识了计量经济学的重大价值，也显示出其目前受国际重视程度之高。

请阐述一下相关情况。

答：计量经济学是一门运用统计模型和方法来分析经济数据的学科。这门学科有两个分支：时间序列 (time series) 和微观计量经济学。

微观计量经济学专门讨论用来分析消费者、厂商、工业、市场、政府部门和其他机构等个体行为的模型和方法。它适用于几乎除了价格指数、货币供给、总就业等总量之外的所有数据。其应用十分广泛。微观计量经济学的诞生，是和数学模型被进一步引进到经济学中来紧密相连的。当经济学家接受数学模型可用来定性分析经济规律时，他们自然想到，

如果这些模型是已知的话，那么这些数学模型还可用来作定量分析。事实上，这些模型是未知的。因此，经济学家想知道，是否能从观测到的数据中求解出未知的数学模型。

微观计量无论按问题、按数据要求或按估计方法都有别于宏观计量。后者基本上可概括为时间序列计量学，而前者则不宜简称横截面数据计量学。也许把微观计量概括为横截面与综列数据的计量学从目前看来还比较妥当。微观计量最凸显的问题是所谓经济选择或定性应变量问题（可参见相关的离散选择和非线性模型方面的资料）。人们先选择他们的分工或专业（定性），然后才决定做多少（定量）。这要求研究者考虑新的模式、设计新的数据和使用新的方法。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进步，大量数据的收集，微观计量经济学模型和方法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这一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微观计量经济学的广泛应用。在当今世界，所有商业和政府的决策中，宏、微观计量经济分析都是必不可少的。在西方大专院校研究生和本科生的课程设置中，计量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被列为三个核心课程。可见其重要性非同一般。事实上，大多数经济学家从事于计量经济学有关的工作。在美国经济系研究生计划里，计量经济学是最难但同时又是最受欢迎的课程。大多数博士研究生最终从事实证经济学的研究。

问：请您再展望一下微观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答：微观计量经济学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得益于大量的应用研究，取得了飞跃性的发展，尤其是在新的模型的建立

方面。在 80 年代后半期和 90 年代到今天，微观计量经济学在理论上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尤其在半参数模型和模型检验方面的研究目前仍然方兴未艾。那么在下一个 10 年里，微观计量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应该是什么呢？这里我提出一些我个人的看法，请读者批评指正。

在模型建立方面，我十分乐观。在过去 20 年里，经济理论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尤其是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information economics and game theory）方面。但相应的计量经济学模型不多。我们认为，随着更多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在下一个 10 年里，这方面应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在理论研究方面，我同意艾春荣教授的意见，仍然有许多未解决的难题。以半参数矩约束模型

$$E \{ m (Z, \theta_0, h_0 (\cdot)) | x \} = 0$$

为例。尽管目前对参数 θ_0 的估计有些进展，但对函数 $h_0 (\cdot)$ 估计值的统计特性知道很少，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应该研究 $h_0 (\cdot)$ 的估计值的统计特性。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对上面的半参数矩约束模型进行检验。在未来，应该发展一个检验方法，适用于所有的半参数模型。

数据测量误差（measurement error）虽然是一个很老的课题，但在这方面的进展不大。举例来说，考虑下面的非线性模型：

$$y = g (x, \beta) + u$$

这里 $g (\cdot)$ 是已知的函数。假定 x 观测不到而所观测到的是 $Z = x + \epsilon$ ，这里 ϵ 是测度误差。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去估计未知系数 β 。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在离散选择（Discrete Choice）模型和各类托宾（Tobin）模型

里，也会有测度误差的问题。如何去估计那些模型应该成为未来研究的重点之一。

综列数据非线性模型（Panel data nonlinear model）是另外一个到目前为止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虽然 B. E. Honoré 教授对第一类的托宾模型提出了一个估计方法，他的方法不能应用到其他类的托宾模型，特别是离散选择模型（Discrete response）如何去估计综列数据托宾和选择模型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有意义的课题。

总之，微观计量经济学是一门充满朝气的学科。它的研究对应用经济学的发展至关重要，我提出的看法可能较偏颇，也真诚希望读者多多关注和垂爱。

问：似乎您因就读伊利诺伊大学，才有了机会最早接触到计量经济学，是不是当时这所大学的经济系有什么特殊的课程安排？或者说提供了什么特殊的学术环境？

答：当时（上世纪 50 年代初）伊利诺伊大学经济系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课程设置，也没有一门叫做计量经济学的课程。正如 J. 迪那尔多（DiNardo）在我们翻译 J. 约翰斯顿（Johnston）和他所著《计量经济学方法》（第 4 版）致中文版读者的序言中所描述的，《计量经济学方法》初版于 1963 年，之前，约翰斯顿于 1957 年秋受聘于麦迪逊市威斯康星（Wisconsin）大学，学校只要求他讲一门课——计量经济学课程。“当时，计量经济学是一个‘仍幼稚又缺乏被人了解’的领域。约翰斯顿每周为五个博士生和许多本系教授准备三次正式讲座。这些讲座的稿子就成了《计量经济学方法》的基础。

第一版对计量经济学简单易懂而又清楚明确的阐述——以前只属极少数‘数学’学者的探讨领域——立即大获成功。科学信息协会对英文社科期刊中的论文所引用的专著做了一项调查，表明在1969~1977年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得到的引用次数，尽管远落后于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而位居第二，但比任何一位在世经济学家的著作都要多。”这就是计量经济学课程在美国的早年情况。这门课程的内容在较长时间里不被人了解，而一旦被了解，特别是在1963年以后，人们对它就爆发了莫大的热情。

我是从1949到1952年就读于伊利诺伊大学的，可以说还处于计量经济学课程正式问世的前夕。但当时伊利诺伊大学经济系有两个学术活动是我较常参加的：一个是L.赫维茨(Hurwicz)主要面向教师的数学课，另一个是F.莫迪利亚尼(Modigliani)活跃于其中的讲演会(或研讨班)。后来才知道赫维茨是美国经济学界和数学界的沟通者或协调人(coordinator)，而莫迪利亚尼成为198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是大师般的人物。当时只知道他们都是考尔斯委员会(Cowles Commission)的成员，而考尔斯委员会我们学计量经济学的都知道它是计量经济学创始人的大本营，挂靠在芝加哥大学，离伊利诺伊大学本部不远。

另一个客观条件便是我前面提到的那位周华章先生的媒介作用。

当然，一个人对什么学科一旦接触并随之发生持久的兴趣，不仅与当时的环境有关，而且和他本来的学识基础和爱好有关。这就要联系到复旦大学崔明奇教授当初在数理统计和经济数学方面对我的熏陶了。

问：据说华中科大为庆祝您从教 50 周年暨 80 华诞，而于 2001 年 6 月特地举办了为期一周的系列国际经济学学术研讨会。与会者包括有顶尖级的欧美学者，也有您的不少学生，他们都已成为著名的华人经济学家。请介绍一下具体情况。

答：华中科技大学（原华中理工大学）经济学院于 2001 年 6 月 18 日至 24 日在华中科技大学举办了“现代经济学、金融学前沿发展”系列讲座，介绍了现代经济学、金融学前沿的最新发展。受邀的讲座者有：2000 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詹姆斯·J. 赫克曼（James J. Heckman），世界著名经济学家、曾任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主席和欧洲经济学会主席的法国图卢兹大学金一亚克·拉丰（Jean-Jacques Laffont）教授，以及来自海外的华人经济学教授，其中大多数的讲座者为华中科技大学的校友。华中科技大学是最早在中国大陆介绍和讲授现代经济学的大学之一，培养了一批现代经济学人才。其中不少人在国外继续深造后取得了博士学位，在海外学有所成，成为知名的学者和教授。1994~1998 年世界经济学家在国际知名经济学杂志发表论文的前 500 名排名中，华中科技大学就有三位入选。还有杨小凯教授和李东教授，他们因故不能亲临讲座，但为讲座提交了论文。同时，也收到了 2000 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丹尼尔·L. 麦克法登（Daniel L. McFadden）于 2002 年 6 月 1 日至 6 日在华中科技大学举办的“微观计量经济学高级研讨班”上的演讲稿。

至于我们的几位杰出学生，他们的具体情况是：

田国强——1987年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为美国德州 A&M 大学终身教授，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所顾问。曾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

主要研究领域有：经济机制设计理论、一般均衡理论、转型经济学等领域。在国际主要经济学刊物上发表论文 60 多篇，在 1990~2000 年度综合排名居华人经济学家第 4 位。

石寿永——1991 年获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经济学博士，2000 年获加拿大经济学会 John Rae 奖和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杰出研究奖。现为多伦多大学经济学终身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有：宏观经济理论、货币理论与政策、国际经济理论。他在国际知名经济学杂志上发表论文 30 多篇，在 1990~2000 年度综合排名居华人经济学家第 1 位。

艾春荣——1990 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师从 200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麦克法登教授，现为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经济系终身教授，兼职加拿大国际发展组织顾问。

主要研究领域为：计量经济学、半参数计量法等。目前居华人经济学家排名第 7 位。

谭国富——1990 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大学经济学博士，原为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终身任期副教授。现应拉丰教授之聘，任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系正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数量经济学、拍卖理论、产业组织理论，在国际经济学杂志上发表论文 20 多篇。并担任《国际经济评论》等十几份杂志评审或编审。

以上四位目前都是清华大学特聘教授、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兼职教授。

还有刘安平——1985年从华中科大硕士毕业后赴美密执安州以宏观经济学著称的维思州立大学攻读经济学。

研究领域为工业组织和公共财政。获博士学位后，曾教授经济统计、决策论、微观经济。1992年起任职于纽约州公共服务部，他一直从事规制经济的应用研究、咨询和论证工作。

宋敏——美国克利夫兰大学终身任期副教授，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终身任期副教授，北京大学特聘教授，华中科技大学数量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金融经济学中的期货和期权理论与实证。

问：您认为，目前我国数量经济学研究存在的问题有哪些？

答：近年来我国数量经济学的发展已初具规模，且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客观地考察和分析，纵观其发展进程，其结果不令人十分满意。

首先，从理论模型构造看，经济理论数量化发展到今天，最终未能导出一个严格而又为大众所接受的分析框架。其次，从应用方面看，我国数量经济学偏重对全国和地区的宏观经济计量研究，而忽视微观经济，如开展企业（尤其是大型综合性企业）和家庭经济计量的研究，因而经济计量方法作为短期预测技术的作用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水平较低。第三，在选择和运用数量经济学方法时重引进、吸收和借鉴，轻发挥、创新和改进。第四，较多的论文作者未能真正做到计量经济学分析，对所得的数量结果，不是忽略统计意义的验证，

就是缺少经济意义的分析。

造成上述数量经济学研究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我们对数量经济学及其作用的认识不是客观且全面的。过去我国经济理论界一直认为数量分析方法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沿用的庸俗工具，不加任何客观分析就全盘否定。相反，现在却视之为经济分析的时尚，一上来就大量进行线性规划、目标优化、投入产出等方法的具体推广和运用演算，而不去考虑建立和使用这些方法所依赖的理论前提及其体系和结构。这样做，至多只能使数量方法本身得以识别和普及，而建立和发展数量经济学的理论准备却并不充分，这种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认识与做法，无疑不利于这一学科在我国的发展和完善。其次，经济科学并非单纯从社会科学中衍生出来，而是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分离后，从二者的相互作用中逐步产生的。经济科学越发展，越表明它与自然科学的密切联系。我们常听说久分必合、久合必分。学种的发展也是这样，自然科学最早在西方取得系统的重大突破，然后与社会科学相互交叉融合。而我国的社会科学发展一直基本上处于稳势的低水平状态，对传统的经济理论研究长期未突破旧的框架，这不能不限制边缘科学的发展。任何科学只有当它较为成熟时，才能灵活而又成功地运用数学，而在理论经济学尚未确定各种基本概念、范畴和规律，特别是尚未提出能够表明社会发展的充分理论时，研究和应用完全适合理论经济学的数学方法和工具不可能取得重大的进展。

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还在于教育。我是寄希望于年轻一代的。青年人没有成见，而年长者如果有成见的话也是很自然的。因为每个人有他自己独特的经验和阅历。所以就会有

他自己的见解，往往谁也说服不了谁。对于青年经济学人材的培养，我们数量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鉴于数学对学习现代经济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举办了几届经济学、数学双学位班，学习 4 年毕业之后，并授予经济学和数学学士学位。4 年之内打好坚实的数学基础，不仅要学好传统的数学分析，还要熟悉随机数学方法如概率统计、随机过程等等。在更主要的经济学方面，要求他们脑子里时刻装着微观经济的分析框架，宏观经济中的重要现实问题，以及计量经济中的基本方法。环顾现代经济学家的重大研究成就，几乎无一例外地、直接或间接取材于现实的经济环境或问题。我们的教学就应该教会学生如何像这些经济学家那样思考问题。所谓言传身教，我相信用榜样去教学是获得成功的好途径。

记得我（们）的老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经济激励机制理论创始人 L. 赫维茨教授，在应邀参加我们数量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成立庆典之后，给我们写下了几句含义深远的临别赠言：“现在中国经济问题全世界经济学家都感兴趣；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一定要有一个模型，然后寻找使用世界上最好的方法。”我们要教会年轻一代切勿脱离中国经济的实际，用你在微、宏观经济学中学到的理论分析框架，建立你所研究问题的模型，然后寻找最先进的计量方法去计算。须知，经济研究中的成功之作，绝大多数都融理论与实证于一体！

我相信这样发展下去，能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并且到了一定时间能领先于国际的经济学作品来。

问：林老，最后请您展望一下我国数量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和前景。

答：我国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因此，在发展和完善这一学科时，仍然须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结合本国国情，正确处理理论研究与应用的关系，才能使它具有中国特色，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

在继承和发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优良传统的同时，数量经济学面临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体系。所谓发展包括三个内容：首先，研究新情况，通过理论概括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是包括数量经济工作者在内的每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的共同任务。其次，要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条理化、规范化，并提出一系列新问题、新原则、新理论。最后，运用数学和信息技术，着重研究和解决经济管理和决策规划问题。

说到这里，我想起一桩事。早在 1985 年，为了说明我国物价之所以在较长一段时间里相对稳定，我和张培刚教授写了一篇国际会议论文《稳定效率与价格机制——中国现代化》。我们说，根据马克思的价值论，不管需求怎样变化，价值观的商品定价原则上都是由其内含的社会必需平均劳动量决定的，因而在较长时间内是不变的。由于商品的短缺时而出现。价格被允许在狭窄的范围内波动，而且它会自然而然地或“自觉地”恢复到正常水平。现在过了差不多 20 年，回头想来，特别是看到 1985 年下半年开始，出现了颇令人担忧的通货膨胀，我们所持的论点太简单了。许多问题都不能解释。而现代经济学理论却有一个相当完备而精细的分析框架，我们还需要作为第一步研究出一个马克思经济学分析框架与之比美。不能简单地不了了事了。例如马克思价值论中往往出

现“自觉地”一词，究竟怎样用现代经济学术语去解释；我们谈需求，也没有区分总需求还是什么别的需求（在马克思时代还没有总需求的概念！）；我们说较长时间，到底指长期抑或短期；总之，可谓问题多多。现代价格机制理论，从货币金融市场到实物市场、从短期均衡到长期均衡的一套分析方法我们不免还要借鉴。还有，在马克思经济学中所谓商品、利息、国民收入等等都和现代市场经济学中的不是同一个概念！这些问题都需要解决。因此，怎样建立并发展（重点在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任务。

请注意，我们说发展马克思经济学就意味着马克思时代没有的东西，我们根据实际需要也要加以研究。比如今天谈数量（数理或计量）经济学自然找不到马克思时代的等同概念，但我相信研究数量经济学不会超出马克思要把数学应用于经济学的范围。因此，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用东西，来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的数理经济学，为发展具有我国特色的数量经济学打好理论基础，肯定符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的。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我国数量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越来越广，特别是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对数量经济学的研究提出了新的内容和要求。目前，我国数量经济学界主要攻关的课题包括：预测值的校正和预测准确度的提高、数据误差的处理、突变及其预测、投资产量滞后期确定、非正态分析的检验、随机参数模型、离散选择模型、稳健分析、非参数、半参数回归、横截面数据与时间数据的综合使用、风险投资函数的研究等等。当然，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应根据具体情况的不同，选取不同的攻关课

题。

总之，从现实出发，为阐明并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理论，建立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函数形式及其内容，应是我国数量经济学发展的主要方向。

《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对话(第六辑)》

中国经济学界理性务实的旗帜——茅于軾



茅于軾先生近照

茅于軾简历

茅于軾，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教授、研究员、常务理事，亚洲开发银行注册顾问，西北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兼职教授，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能源组国际顾问组成员，LEAD 国际培训项目中国国家理事会成员兼核心组教授。

1929年1月14日出生于南京，父亲茅以新是铁路机械工程师，伯父茅以升是桥梁专家。1946年，毕业于重庆南开中学；1950年，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毕业，分配到齐齐哈尔铁路局工作，任火车司机、技术员、工程师；1955年，调北京铁道科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机车车辆性能研究；1958年，被打成右派，“文革”时在大同机车厂劳动；1975年，开始从事微观经济学研究；1979年，提出择优分配原理；1985年，出版《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1984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赴美国哈佛大学作注册访问学者；1987年回国，担任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网顾问；1990年受聘为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经济系高级讲师，讲授微观经济学；1993年从社科院退休，与其他四位经济学家共同创办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现为该所常务理事。

研究领域及学术成果：主要著作有《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生活中的经济学——对美国市场的

考察》、《谁妨碍了我们致富》、《中国人的道德前景》、《环境经济学中的三个基本问题》等。发表的学术文章有《铁路道口事故的概率模型》、《美国人口的分布和流动与地区经济发展》、《中国的运输和运输用能》、《外汇的最优分配》、《温室效应的经济影响》、《伦理学、环境学、经济学》、《中国将市场引进计划经济的经验》、《中国的能源政策及其国际背景》、《寻求社会致富之道》、《道德·经济·制度》、《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等。

问：茅老师，您好！非常高兴能在天则经济研究所成立十周年之际拜访您。作为在海内外颇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不少读者朋友也许尚不知道您出自书香名门之家——父亲为中国早期铁路工程师，而叔父就是著名桥梁专家、声名远播的茅以升先生。而您早年又在著名的南开中学就读过，为日后的人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们很想知道您早年的家庭状况和在南开中学时期的经历，请回忆一下。

答：我 1929 年 1 月出生于江苏南京市，祖父茅乃登是清末进士，曾任武官，因不满清廷腐败而参加了辛亥革命，在光复江南失地中立过汗马功劳，后在张勋复辟那年为避难曾举家迁往上海，以后又返回到南京老宅。我的外祖父陈吟诗是清末的举人。

我的父亲茅以新是一位正直无私的知识分子，一生致力于我国铁路建设事业。他以优异的成绩从上海交大毕业后，便抱着报国之心远赴美利坚，在普渡大学深造，获得铁路机车硕士学位。回国之后，他先参加了浙赣铁路建设，接着又投身到粤汉铁路的建设中，他是我国早期的铁路机械工程师之一。

二叔父茅以升早在 1917 年求学美国时所做的博士论文，被称为“茅氏定理”。1933 年，他主持、设计和制造了被称为“中国近代桥梁史划时代的里程碑”的第一座铁路、公路两用双层大桥，记得当年毛泽东接见茅以升时，问他是否与自己是本家。二伯父笑曰：“此茅乃草茅之茅”。我的父辈兄弟二人，一个建路，一个造桥，在中国近代铁路史、造桥史上，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身影。

也许是受长辈榜样的激励和家庭的熏陶，我家弟妹几人都算较有出息，两个弟弟都是清华大学教授，妹妹为北师大副教授。另外我脑海里记忆犹新的半个多世纪前的抗战时期，全家在烽火中辗转于广西、贵州和四川等地，生活条件极其艰苦不算，而且在逃难过程中看到了无数的生灵涂炭，在绝境中浮现出作为中国人的悲哀！

1944年到重庆时，我念高中二年级了，先去了重庆一中，后来考到了南开中学就读理科班，但只念了高三一年就毕业了。那时的南开中学是一所了不起的学校，从那所学校出来的学生中后来有34位成了两院院士。当时南开中学的校长叫张伯苓，是很有名的教育家，始终拒绝当官，一心办学。南开中学着重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意识、创造性及民主精神，同时也非常注重“素质教育”。它的校训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它的学生大多是高官子弟，但都是考进去的，没有走后门的。我记得和我并排坐的一位同学就是当时外交部长的外甥。我为了进南开考了两次，第一次没有被录取，第二次在高中最后一年录取为插班生。

50多年以后，当回忆起南开中学的生活片段，我感到深受教益——那时候学校从不趋炎附势，校园里绝对没有任何特权的气氛。这和现在个别家长开着高级轿车送子女上学，比阔气、比级别的风气截然不同。我所在的班上的有些关心政治的同学经常就当时的政治问题辩论。那时我的思想还很幼稚，不懂得政治，也不关心他们辩论的结果。但是却培养了我的民主意识：讨论政治是老百姓的权利，人人都有言论的自由。

南开学校的校规很严格。学生在公共道德上犯规是最严

重的错误。这使得南开的学生懂得真正的是非界限是什么。多年以来，我常对人说：“我没有听到过南开同学有犯贪污罪的，也没有犯玩忽职守罪的……”

顺便说一句，吴敬琏教授也是南开中学的杰出校友之一。

问：茅老师，我们非常想知道您是如何从一名铁道工程师转变为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的？据说，您在 80 年代中期所写的著作《择优分配原理》曾影响了不少年轻学者，使他们受益匪浅，能进一步谈谈择优分配原理的涵义吗？

答：我自己认为，择优分配原理是我这辈子在自然科学方面的重要成果。这里有两点必须说明。首先，择优分配原理的基本方法并不是我首创的。在经济学说史上，19 世纪产生的“戈森定理”和“边际革命”中就已出现此原理的运用。在国内，王国乡教授也较早地独立提出了类似的理论，然而我发现择优分配原理的过程又具有很大的特殊性。我是因为求解数学规划问题而发现了此原理的。

话还得从“文革”那个混乱的年代说起，那时我虽受到了冲击，但我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科研计划，仍在思考，在研究我用控制论原理讨论机车引热动态性能；用概率论作了机车牵引热工试验的误差分析，还应用变分法推导了列车牵引中的能量方程。但是，在这个时期，我的研究仍然局限在铁路工程车的领域之内，对于经济学，我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关注。

真正使我对经济学产生兴趣的是，1975 年的青藏铁路的建设，这条铁路起自青海格尔木，全长 1200 多公里，中央为

此专门组织一批专家对这条铁路的设计作技术评价。我有幸参加了这项工作。我以一个实事求是的工程师的眼光，很快发现在技术评价背后的经济评价是数学规则，认识到经济学是要研究在资源的约束条件下求得效益最大化的问题。我的数学修养更使我一下子领悟到经济学的本质在数学上就是数学规划问题。非常巧合的是，就在这一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给了线性规划的创始人、苏联经济学家康托罗维奇等人。我在那个闭塞的学术环境里，从一开始就触摸到了经济研究的世界前沿问题，但我当时却没有意识到。在此后的几年里，我一个人潜心构造我的经济学世界。终于在 1979 年导出了择优分配原理。

1981 年，我参加了美国经济学家克莱因在颐和园举办的计量经济学研讨班，到这时，我才正式地接触到了现代经济学。此后，我进一步阅读西方经济学文献，并和自己的想法形成印证，更加坚定和完善了原先的构思。直到 1985 年我应《走向未来丛书》之邀，才写成《择优分配原理》一书。回首遥望，距离当年的思想萌芽已有十年之久。那时我也已调入中国社科院美国所，从此我有了更多的时间去思考经济问题。可谓“十年磨一剑，剑光照人寒”。我的这本书深受欢迎，先后印行 9 万余册，现早已脱销。青年经济学家张维迎 1987 年曾在《中国：发展与改革》上撰文评介此书，称这是“一本真正的原著而不是评著，作者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而不是以第三人称的笔法写作”。中国社科院世经所的青年经济学者何帆在大学时读过这本书，他回忆，“这次阅读是一次神奇的思想探险，我平生第一次感受到了经济理论的魅力。”另一位经济学者平新乔说：“读到《择优分配原理》是我的幸运。它影响

了我以后十二年的学术方向的选择。”

基于择优分配原理的经济思想成为我跟众多经济学者交往的基础。择优分配原理在我国更早的另一位独立发现者是王国乡教授。我 1981 年与他取得联系，以后经常切磋学问。同一时期，我结识了杨小凯，杨小凯对择优分配原理体现的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有透彻研究，后来发展出一套可能改写经济学体系的“超边际分析”。那时候在中国占主流地位的是苏联政治经济学，很多头脑开放的青年人被择优分配原理的研究所吸引，与我展开了交流讨论。他们中很多人后来出国攻读经济学。也是从那时起，我每年要写几十封留学推荐信（其中包括张维迎、宋国青等人），到现在持续了近二十年。

1985 年，我访问美国，同时出席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成立大会。我成为这个学会以及很多海外学者与国内经济学界联系的纽带和桥梁。1989 年，我和留美经济学会成员汤敏开始编辑《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系列（1989 年、1993 年、1999 年分别出版一二三集），这套书多次加印，几乎成为国内经济学研究生们的必读参考书。

我一直认为，经济学，尤其是微观经济学，讨论的核心问题便是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择优分配原理直接探讨什么是配置资源的最佳原则。微观经济理论认为，最优分配要使配置到各个领域的资源能有一个统一的边际收益。我的择优分配原理把微观经济理论直接建立在规划的基础上，使经济分析的前提条件和逻辑推理都表述得更为清晰，同时也把微观经济学的制度背景从隐含表述为明显。

所谓“择优”，就是选择边际产出最高的用途。但资源的

边际产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逐渐递减的，所以要不断地改进分配方案，把产出效率较低的用途改配给产出效率最高的用途。这样不断改进的结果是各种用途的产出效率趋于一致，最终不再有改进的余地，也就达到了总产出最大。因为各个方向上的边际产出相等，这种状况又叫均衡。

择优分配原理在数学上对应的是拉格朗日乘数法，这是一个用于多变量有约束条件下求极值的方法。在经济活动里，资源是有限的，这是约束条件；资源可以按不同的组合方式去使用，这可以看做一个多变量方程；资源投入要求产出的财富为最大，这就是求极值。经济问题天生是可以拉格朗日乘数法来表述的问题。在求解过程中，首先要引入一个 λ 因子，构建出普通多元函数，然后对各个未知数求偏导数并分别令其为零，由此可以找出极值点和相应的自变量。当然，在现实世界里，不可能对复杂的经济问题求出一组确定的值，但达到最优解的条件是确凿无疑的。拉格朗日乘数法中作为公共偏导值的 λ 因子其实就是统一边际收益，也就是价格。它的推导过程说明，在经济活动中，必须让资源投放在各个用途上有相等的边际收益，才能得到最大产出。

这样，可以看出垄断部门的存在如何阻碍了经济增长。在我国，电信、能源、交通、金融、政府等垄断部门的行业收益远远高于其他竞争部门，按照择优分配原理，如果其他行业的资源（资金、人员）能够转移到收益较高的垄断部门，则社会总产出将进一步扩大，形成经济增长。类似地，我国的城乡二元政策造成了农村和城市巨大的收益差距，如果允许农业劳动力自由流入收益更高的城市工业部门，也会形成强大的经济增长动力。另一方面，不断扩张的基础设施建设

并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灵丹妙药，如果不适可而止，它会成为一种损害经济发展的资源浪费活动。道理很简单，资源对某个部门投入的收益是递减的，在基建投资过度的时候，就算其收益尚未变成负值，但与其他收益更高的用途相比，它其实已成为一种浪费。所以完全可以肯定，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希望不在于施行五花八门的财政、货币政策，而要靠破除行业垄断和扩大经济自由。

我的择优分配原理是 1979 年提出的。在这以前，为了求解驾驶火车的最优操纵问题，我对动态最优化进行了长期研究（所谓动态，是指一系列的决策选择，而且后一个选择取决于前一个选择，也就是所谓“路径依赖”）。后来我碰到贝尔曼（Richard Bellman）的《实用动态规划》（Applied Dynamic Programming）这本书，使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贝尔曼在书中论证，如果一个动态过程包含若干个步骤，则最优过程中所包含的每一段步骤都必须是最优的。或者说，全过程中最优化是由每一段到终点的最优过程所组成。贝尔曼用这个极简单的原理推导出了变分法中纷繁复杂的欧拉方程。

接着我进一步考虑将择优分配原理应用到动态过程，并于 1981 年获得基本成功，我假设人们在某个动态过程中保持使自己支付的成本和预期的收益相等，对假定存在的最优轨迹进行变化率的择优分配，再经过简单的数学变换，最后得出了欧拉方程。这就将晦涩难懂的偏微分方程还原为常规的经济理性，也证明了人的某种行为模式符合动态最优化的数学逻辑。我找到了动态择优分配的关键逻辑，但是在数学上还不严密。我的数学水平不能回答在最优条件下一个二阶变分是否应该为零的问题。本来我想在这方面继续探讨，这或

许将耗费我一两年的时间。其结果可能是一个和极大值原理（动态最优化中一个普遍性的条件）同样重要的动态最优原理。但是一系列经济改革的重要问题更强烈地吸引着我。我终于选择了推进市场化改革的研究方向。

动态择优分配原理的意思是这样的：人们瞄准一个未来的目标，从当前的现状出发逐步调整趋近于该目标时，遵循的原则是调整所支付的边际成本与以后因调整而实现的边际利益相等。一般而言，调整支付的成本跟调整速度是正相关的。例如，在一个面临淘汰的产业里，它的资本设备和人力资源都代表一定的价值，如果立即更换它们，付出的成本最高，但是以后的收益也最大；如果等到它们完全报废以后才进行更换，则成本最低，收益也很低。假设某个调整过程中速度较慢，其成本低于预期收益，说明调整速度还有加快的余地；假设调整速度过快，其成本高于预期收益，得不偿失，就应该把速度放慢，只有当调整成本跟预期收益相等的时候，我们得到了最佳的调整速度。事实上边际损益相抵得到最优点的概念是经济学中的一个普通原则。在静态择优分配中，要求资源投入在任何一个方向上产生的边际收益相等，此时也可以说，不管资源投入到哪个方向，它获得的收益跟它的机会成本（在其他方向上可能得到的收益）是相等的。

把动态和静态的择优分配原理结合起来，可以对人的决策行为作出更深刻的解释。在静态层面上看，一个人把时间和收入分配在吃喝玩乐、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以获得生活的最大满足，这是合乎逻辑的。但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人的时间和收入不光用来消费和享受，还要用于学习和工作。这就涉及到动态择优分配原理的应用。因为人们决策的时候

不仅要考虑当前的收益，还要考虑将来的收益。为了获得将来的收益，需要在当前付出一定的努力，而付出努力的原则，就是成本和收益相等。于是我们可以看以，对未来期望很高的人，会在当前付出很大的牺牲和努力，而在当前庸庸碌碌的人，基本上不可能有非常远大的生活目标。

动态择优分配原理对于把握现实中的改革进程也具有启发意义。在制度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中，虽然我们不知道目标所在，但如果调整过快，在短时间内“一步到位”，就会偏离动态最优化的轨迹，使支付的成本高于目标收益，造成得不偿失。如果调整过慢，虽然在当前支付的成本较低，但却意味着动态过程中应该得到的收益被浪费掉了。所以无论是价格调整，或者制度改革，还是经济结构转变，都应该遵循适度合理的推进原则。这就是动态择优分配应用的一例。

择优分配原理是微观经济学的最基本的理论。它可以比较容易地导出一般均衡状态，并解释为什么价格可以表示稀缺性，或物品的经济价值，说明为什么“钱”可以作为度量价值的单位。此原理也可以从制度上解释为什么公平竞争能导致资源的最佳配置。因为每一个个体出于自身利益会寻求资源最有效的使用途径，而且当他找到这种途径时，他成为此种资源有竞争能力的使用者，从而也证明了市场制度是资源配置最有效的制度！顺便说一句，1990年，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邀请我前去讲述微观经济学，就是由于看中了我建立的这一特殊的学科结构。从现实应用来看，我的这一原理对我们观察经济现象和制订经济政策都有较重要的启发。我自己也曾用这一理论得到过不少有意义的结论。

问：据说早在 1994 年您在北京大学向众多的学生提出了 7 个经济学的常识问题，难倒了不少人，而引起了较大的轰动和反响。请与读者朋友们分享一下这 7 个问题。

答：1994 年 4 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团委和学生会组织经济文化月活动，在开幕式上邀请了七八位北京经济学界著名人士到会发言，每人限定 10 分钟。由于时间有限，许多经济学家言犹未尽。会上，我作了 7 分钟发言，提了 7 个经济学的普通问题，难倒了不少北大师生。

我认为经济学知识是每个具有高中以上文化水平的人都应具备的，所以现在高中和大学里都要教政治经济学。但是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能否传授有用的经济知识却可能存在问题，因此我出了 7 个普通问题，考一考非经济专业而学过一般政治经济学的学生。如果大部分总是都答不上，就证明当今的经济学作为一门大学里的公共课有加以改造的必要。这 7 个问题都不是冷僻怪题，但看来容易，却真难回答。我简单阐述解释一下。

1. 何以穷国和富国同工而不同酬？

从简单劳动如餐馆里洗碗，到复杂劳动如外科手术大夫，几乎一切行业中中国的从业人员所得到的待遇远远比不上美国同行的待遇。我们也可以不用货币收入，通过汇率折算，而可以直接比较吃、穿、住、用、玩的实际生活水平，这一结论仍旧成立。

有的经济学解释说，一般而言，美国工人使用的工具先进，所以同样劳动产出的价值较多。可是拿洗碗、理发等服务业来说，工具的先进并不起多大作用。再说中国也有高度

自动化的流水生产线，那里工人的待遇仍不能和美国工人相比。

由于穷国和富国同工不同酬，当他们之间发生贸易时，富国包含少量劳动的产品可以交换穷国包含大量劳动的产品，因而有经济学家认为是富国剥削了穷国。可是在没有贸易往来时，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仍旧存在，这显然不能用剥削来解释。正因为存在这一现象，所以不少人希望移民到富国去，使自己支付同样的劳动能得到较好的享受。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一切财富都是劳动创造的，劳动是财富惟一的泉源。根据这一理论，质量和数量相同的劳动应该创造出相同的价值，可是政治经济学从来没有对富国和穷国同工不同酬的事实作出任何最起码的解释。

2. 投机活动是否创造财富？

这里我们将投机活动定义为一些人既不生产又不消费，买进只是为了卖出，并从买卖差值中赚钱的活动。这包括房地产、股票、期货的投机，也包括囤积居奇，制造价格差别从中渔利的行为。

如果投机活动不创造财富，那么投机赚的钱只是一种变相欺骗，把别人口袋里的钱骗到自己口袋里，那就和赌博没多少区别。世界各国政府多数禁止赌博，却极少禁止投机。

如果投机确实创造了财富，那么这一部分钱应该计入国民生产总值。那么请问，投机分子为谁服了务？生产出了什么产品？对社会作出了什么贡献？

3. 据说，市场经济的特点是等价交换，意思大概是买卖双方谁也挣不了谁的钱，同时谁也不会吃亏。可是做买卖不是小孩子玩过家家，而是为了赚钱。无论是国际贸易或是国

内贸易，任何一笔双方积极参与的公平交易，都同时为双方带来利益。当然，这并不是说做买卖永远都有赚钱，蚀本的情况是存在的。但大多数情况下只要双方出于自愿同意，任一方赔钱的交易都是做不成的。

如果承认了交换能赚钱，试问这新增的价值从何而来？

假定一头羊与一柄斧交换，交换之前和交换之后都是一头羊一柄斧，仅仅是变换了他们的所有者。从劳动创造价值来看，交换能创利更不能自圆其说。

你是相信交换能创造价值，还是坚信交换不能创造价值，你的理由何在？另一种观点的错误何在？

4. 汇率是由什么决定的？

汇率是两种货币的交换比例。货币之所以有价，是因为它有购买力，因此货币交换的比例显然应该等于两种货币购买力的比。这种论断大量地流行于当今肤浅的教科书里，但其错误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两种货币的购买力的比取决于买什么东西。例如，用美元买汽车，其购买力约为人民币的 20 倍，但用美元买旅游鞋，两块美元也顶不上一块钱人民币。实际上，正因为买各种商品时两种货币购买力的比价不同，才有国际贸易发生。用美元买汽车便宜，而用人民币买旅游鞋便宜，所以才有中国出口旅游鞋、进口汽车。

对上述问题比较接近的说法是汇率取决于两种货币的供需情况，当用人民币买美元供不应求时，美元汇价上升，反之则下跌。然而这一答案只是对现实的描述，并未从经济理论上加以说明。譬如这样的汇率和购买力比较有什么关系？这种汇率有什么特点？它是有利于两国，还是不利于两国，或有利于其中的某一国？

5. “有计划、按比例”有什么错？

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是“有计划、按比例”。每当国民经济毛病时，我们总可发现是某种比例失调所引起的，所以事先把比例掌握好，就不致发生比例失调的毛病，因而才有“有计划、按比例”的说法。市场经济则是靠着成千上万生产者和消费者通过价格机制来调节，它无疑带有盲目性。当然价格确能调节余缺，因为供过于求时价格下降，因而消费增加，生产减少；供不应求时则相反。然而这种余缺调剂能否实现我们所需要的比例，却没有任何保证。是什么理由使我们竟放弃了这个基本规律，转换为市场的盲目调节呢？

6. 钱能不能度量价值？什么条件下它能？什么条件下不能？

我们知道，凡是不能交换的东西，都不能用钱度量其价值。健康是有价值的，然而不能交换。一个人生了病，不论他愿意出多少钱给别人，也不论别人又多么愿意用自己的健康去交换钱，事实上也无法做到。除了健康，还有友谊、爱情、创造欲望和好奇欲望的满足等等，也都不能用钱交换。

那么，凡是能交换的东西是否能用钱来度量其价值呢？工厂产品的价值高于它原料的价格，其差价是否精确地表明了工厂创造的价值？由于市场价格的波动，即使工厂内部的生产状况完全照旧，它创造的财富是否也相应地变动？一个人做生意赚了钱是否证明他也创造了价值？

7. 是什么决定了一物的价格？

我们知道，价格等于成本加利润。一般而言，产品的成本是企业已知的，所以上述问题也可以表述什么决定了利润。

利润的变化很大，有时可能是负的，这就是企业亏损；

有时可能超过了成本，使利润率达到百分之百。企业没有不希望多赚钱的，那么是什么限制了利润呢？

合理利润又是多少？如果你是一名物价检查员，你将如何去执行任务？利润率达到什么水平可以称之为暴利？如果你认为利润率达到 50% 以上就可以算暴利，你如何去说服坚持 10% 作标准的人？

问题已经提了出来，答卷平均能评多少分，没有人统计。但从北大校院内沸沸扬扬的议论来看，大家开始反省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教育是否有助于我国建设市场经济的大业？这种教学究竟给学生多少有用的知识？大学教学本来应该领先于现实的发展，可是这一门课程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当然，这些问题不仅仅是针对北大的。但几十年来北大师生一直是我国学术和文化的先驱者，也许会在经济学的教学改革上率先行动。

其实，我所提的问题确实不是针对北大师生的，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我们在教育上的失败。教育不能无的放矢，不然，那将是最大的浪费。我认为，我并不是在跟北大师生谈经济学知识，而是在运用经济学知识来考查教育体制的价值，这一点才是最应该让我们警醒的。

问：茅老师，听说你到过世界不少国家开会、考察和访问，对各发达国家的经济和生活各方面都感受颇深，请给我们介绍一二。

答：1982 年 9 月，我第一次出国，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件事。

当时，英国 Sussex 大学科学政策研究所主持召开一次中欧能源政策讨论会，中国科协组团参加。由于我在能源研究领域的突出表现，所以成为交流团的人选。当我得到国家科委副主任吴明瑜通知赴英国访问的消息的时候，我非常欣喜，以前做梦也没想到我一个“右派分子”能有出国的机会。

英国之行给了我很大触动。在英国时，我虽然能跟别人进行简单交流，但要完整流畅地表达自己思想却是相当困难。我意识到，几十年与外部隔绝的计划经济已经使中国与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差距。这种差距应成为每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中国人努力奋斗的动力。所以我后来说：“中国的改革，不论是经济方面还是政治方面，得力于中外交流。”

1985年，我随社科院交流团到美国与布鲁金斯学会讨论亚太经济问题。这次会上我认识了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的主任帕金斯，帕金斯虽不懂中文，但他看了我在《择优分配原理》中的公式图表，表示非常欣赏。第二年，帕金斯邀请我出国访问，通过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的福特基金项目的资助，我成为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和经济系的访问学者。以后每年的圣诞节帕金斯教授都给我发一张贺卡，至今已经18个年头。

说实话，在哈佛的学习没在知识理论上对我产生很大的促进，但是，通过生活中的实际接触，我对自由市场社会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我发现，在中美两个不同的社会中人们的行为模式和思想观念有很大的区别。我在美国生活了一年多，没有看见任何人吵架，也没有见过看热闹的人群。有一次，我到一家小杂货铺买饮料，看到地上有一张五元的钞票。按照中国的习

惯，我很自然地拾起来交给掌柜的。出乎意料的是，掌柜的拒绝接受，并告诉我，谁拾到就应该归谁所有。我在美国的所见所闻为我研究社会致富之道和市场运行机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我后来在很多问题上形成的观点，包括富国和穷国的差异、不同社会的道德基础、分工对经济的促进、市场制度的缺陷等，都可以说受到了在美国生活的经历的影响。

更重要的是，我在美国期间结识了很多外国学者，为我进入国际学术圈打开了大门。1986年以来，我一共参加了上百次国际学术会议。这些访问增加了我对各种经济发展水平、各种经济制度、各种文化背景对经济影响的理解，同时也扩大了我在国际学术界的知名度。1990年，我受聘于亚洲开发银行，担任注册顾问；同一年，受聘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经济学任客座高级讲师，讲授研究生班的微观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和经济计划三门课；1995年以来，我受聘于 LEAD 国际培训项目任国际理事会成员及核心教授成员。1993~1998年被美国 Marquis 出版社选为世界名人，1995~1998年被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选为世界名人。1996年我被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能源工作论坛聘为国际顾问团成员，近年来多次受聘于国际顾问公司，参与能源、交通、环保等方面的咨询工作。

早在1990年，我接到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邀请，请我前往昆士兰大学经济系讲学。我后来对别人说，到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讲学是感触最深的一次经历。这是用我自己的劳动，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中挣自己的工资。除此之外，我每次出国，无论是学习还是开会，都是由别人负担费用，我自己没有任何压力。例如在美国哈佛大学访问，是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每个月向我发放一千美元的津贴，

“我做不做事都有，不是劳动所得”。在澳大利来昆士兰大学任教，我每个月有三千美元的工资，但交掉一千美元的税，同行一些中国访问学者直称我是“富翁”。但挣工资和领津贴不一样，要通过公开招聘和投票录用，要接受学校的各种检查和考核，还要融入工作部门的人际关系，“如果不行就要失去饭碗”。所以我说，要真正深入了解一个社会，起码的要求是通过它的市场取得收入。否则就像很多中国的公费学者，到了国外留学两年回国，结果连英语也不会说。

在我访问过的众多国家中，有发达国家，也有落后国家。贫困和富裕的反差，引发了我对各种经济问题的深入思考。

1993年11月，我应亚洲开发银行之邀请，到马尼拉参加发展经济学第二届讨论年会。大会指定给我的任务是评论一位世界级环境经济学家 Robert Repetto 所写的一篇论文：国际贸易和持续发展。文章的主线是自由贸易较之各种管制在大多数情况下更有利于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我虽然基本上同意这个观点，但在对环境重要性的考虑上我深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很大区别。对一个未能解决温饱的人来说，强调环境保护没有多大意义，而一些国际援助机构用发达国家的标准要求发展中国家，甚至在援助项目上附带某此很严格的环保标准作为条件，这是欠考虑的。对此我在会是做了充分的阐述，引起了热烈讨论。

在长期的外出交流活动中，我在如何评估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每当下了飞机在机场等行李、办入境等，就能看到这个国家的组织效率和人员素质，就不难估计出一个国家的收入水平。进得城来，看见街道、红绿灯、警察、行人和汽车，就能看出政府的工作能力。来

到宾馆，又能看到当地的物资供应和人际关系。短短的一两个小时内所得到的消息，往往超过读一本书所能够得到的信息量。而且这些信息是不可能掺假的，也不受任何宣传灌输的影响。

问：众所周知，在中国地方保护主义一直是令民众和企业头痛的事，中央政府对此也很反感，现在中国已加入WTO，地方保护主义必将受到重大冲击，对此，您有何感想？

答：目前我国还没有反对地方保护主义的立法，所以各地政府的做法都按照自己的判断来定。

地方保护主义的一种主要表现就是歧视性限制，例如对商品的商标和产地，对劳动者的户口所在地施加违背公平竞争原则的歧视性规定，或对外来商品征高额关税、对外来车辆征收通行费等。这种规定是从局部利益出发，用损人利己的手段获取利益。歧视性规定一般都会遭到对方报复，其结果是彼此都受到损害。为了避免这种对一切人不利的情况的出现，许多国家都立法对此加以限制。例如美国宪法禁止各州之间征收进出口关税。世界贸易组织WTO则对各国的贸易保护加以限制。

我国目前正经历着总需求不足、失业下岗人数上升的困难。这一形势很容易促使地方保护主义的抬头。然而如果各地都这样做的话，结果必定是交易的机会减少，市场进一步萎缩，使当前的困难雪上加霜。这是局部利益损害集体利益，最后使自己的局部利益也受损的一个典型例子。

1999年年底，北京市政府宣布2000年对外地人进京谋职的限制，从过去的5种行业增加到8个，限制的职业从以前的34种增加到103种。2000年春北京市政府进一步规定外地人在京就业要先作体格检查，而北京本地人就不要求。这是朝地方保护主义前进的明白无误的信号，说不定会引发一场不可遏制的各地保护主义的大仗。我国的经济将因此而蒙受不必要的人为损失。

北京应该是首善之区，它是全国人民的首都，而不仅仅是北京市人民的首都。全国人民热爱北京，为北京的建设出力出钱，北京市更应该照顾其他省市人民的利益。当然，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大家都有责任，但北京作为首都应该带头。北京带头所起的作用肯定比一般省市所能起的作用大，因此，北京带头强化地方保护主义也会给其他省市起不好的示范作用。

其实，北京坚持公正竞争的原则自己并不吃亏。选拔人才从北京这一千多万人口中去挑，还是从全国十二亿多人口中去挑，得到的结果是不同的。挑出最优秀的劳动者到北京各行各业中去服务，肯定会增强北京的竞争力，这有什么坏处呢？

从就业者个人来看，自己的水平明明比别人高，可是因为户口不在北京而被淘汰，必定产生出怨恨情绪。北京希望被别人怨恨，还是希望被别人爱护，难道还不清楚吗？北京的治安、公共卫生、环境保护要靠北京人和外地人共同维护，北京歧视外地人，只会遭来不合作的敌对态度。

的确，北京市政府经受着市民失业下岗压力，作为市民利益的维护者，作出地方保护的规定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进

一步的思考会告诉我们，最终而言，地方保护是对一切人不利的，其中包括北京人自己。我国为进入 WTO 而不懈努力，该组织规定外国公民要享有和本国公民同样的贸易待遇。对外国人尚且要一视同仁何况对中国人自己！我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人民的心态已调整到迎接公正竞争，发挥比较优势的新姿态，而不再一味依靠政府计划和行政照顾。希望地方政府能顺应国家和百姓的这种转变而相应地调整自己的政策。

平心而论，改革开放以来，北京的特殊地位已经淡化了不少。“文革”中一度外地人进京还要开进京证明。现在这些规定基本上都已废除。然而我们也理解，北京过去吃的偏饭太多，一旦把北京放在完全平等自由进出的地位，可能会在环境、交通、上下水道等市政建设方面造成很大的压力，所以改进要分步进行。只要确实是朝平等自由的方向改进而不是倒退，哪怕分步实施，也能被大家理解并受到欢迎。

问：与地方保护主义一样，垄断也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顽疾，其危害性可能比前者更大。据说您曾不止一次地直言上书有关部门，必须打破垄断和倡导竞争。请给读者朋友讲述一下。

答：由于我对价格理论和市场机制的理解较透彻，所以我无时无刻不在不遗余力地提倡竞争、反对垄断。

根据价格理论，市场上的价格要等于边际成本，这样的价格才能导致资源的最优配置，才能实现社会财富的极大增长。这个定理的严格证明很复杂，但我觉得用通俗的话来说

明倒也不难：“一个人做一件事，不论是生产或者消费，只要能达到目的，应该用消耗社会资源最少的方法去做。当价格等于成本时，个人选择最便宜的方法，恰好也是社会耗费最少的方法。”

怎么能够使价格降低到边际成本呢？答案是竞争。只要竞争存在，价格必然会降低到边际成本上。任何超额利润都会被竞争者的降价行为消除掉。但当存在垄断的时候，超额利润往往成为正常现象。因为供应方总希望把价格定得越高越好，反正没有人跟他竞争。顾客面对太高的价格，惟一的办法是拒绝购买。所以垄断不仅是不公平，尤其还造成经济效率的损失。

有一次，我和三位朋友一起到首都机场国内出发大厅进大门的二楼咖啡厅喝咖啡。我们四个人一共要了四杯咖啡和三个三明治。结账时要我们付 480 多元。原来咖啡要 88 元一杯。经过我们提出抗议，最后降为 38 元，一共付了 230 多元了事。

而这是一所极普通的咖啡厅，设备一般，座位比较拥挤，环境相当嘈杂，属于机场大排档层次，是为过往旅客服务的。在这里喝咖啡根本谈不上是什么享受，只是等待起飞，消磨时间的地方。可是它的收费标准却超过首都五星级宾馆两倍以上。

我后来将此事诉诸媒体：“我国正在整顿市场秩序，又要为举办奥运做准备。可是在这些代表首都脸面的国际机场里竟然存在着这样的敲竹杠商店，而且无人过问……我国市场秩序之所以混乱，是因为不守规矩比守规矩得到的利益更多。长此以往，原来守规矩的也会跟着不守规矩。”

经过媒体的报道，这件事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讨论。我指出：“商家有权为自己的商品定价，仅仅指竞争性商品而言。对于垄断性商品，价格要由价格管理部门审批。机场的咖啡厅实际上是垄断的，在安全检查线以外只有这一家，所以价格应该有所制约的。”后来，首都机场物业商业管理部门对犯规的商店做了罚款处分，国家物价局也开始对机场物价偏高问题进行调查和监控。

我还对一个被有意无意忽略的垄断问题进行了揭露，我曾经为我国的“航空旅客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算了一笔账：

现在每年乘飞机的旅客将近八千万人，每张保险单售价二十元，如果每人都买保险，总收入是十六亿元。从长远统计来看，平均每年旅客死亡人数算它一百人，每人赔二十万元，那么每年平均赔付额为二千万，是保险费收入的百分之一二五。当然还应该算上其他小额赔款的支付（也算上二千万）、保险单的销售成本（算他是每张二元），这样一年的总成本是二亿元，不包括税的毛利润应该有十四亿元，是成本的百分之七百。当然并不是每位旅客都买保险，但是不买保险也就没有赔付，也没有保单的销售费用，所以利润率是不变的。

这么高的利润，为什么保费降不下来？我认为原因很简单：行业垄断、缺乏竞争。现在竞争越来越激烈，各行各业的利润率都在下降，经营越来越困难。对于生产者而言是坏消息，对于消费者而言是好消息。总体来讲是好消息，因为竞争迫使大家提高效率，减少浪费，整个社会的得益是巨大的。换句话讲，如果社会中存在着暴利行业，证明社会中存在着浪费，应该立即消除。

我的结论经媒体报道后，再次引起了强烈反响。然而，中国保监会有关人士的回应是，国内航空保险的利润在百分之十左右，比其他意外险高，但并非暴利。

该人士给航空保险的账是这么算的：“算上保单费、公司管理费、代理人手续费和机场摊位费能占到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再加上百分之二十的法定再保险，百分之六点五的营业税，百分之一的保障基金、百分之五的巨灾再保险及溢额再保险和百分之三十的各种准备金，利润在百分之十左右，比其他意外险高，但是由于航空出事故将面临的理赔率比较高，两者是相对应的。”

对保监会的答复，我很不认同。保监会提出的许多成本，什么公司管理费、代理人手续费、机场摊位费、法定再保险费、巨灾再保险、各种准备金等等，不是算重复了（例如再保险费，付了再保险费，部分的赔付就由再保险公司承担），就是大大地扩大了。普通消费者并不懂得保险的内部成本，但是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就是消费者要买的是万一出事故时的赔付，其他都是附加的费用，都不是消费者所需要的。现在保险公司把并非消费者所需要的所谓成本搞得那么大，而真正消费者所需要的那一部分却微乎其微。这难道是正常的吗？

所谓的成本，只能通过市场竞争来决定。“什么可以算入成本？请客吃饭、盖楼房、发奖金、出国考察、奢华的办公室、高档的家具、超过市场水平的工资待遇等等，能不能计入成本？”有了竞争者，企业就得时刻注意把自己的成本减低下来。而如果没有竞争者，上述这些费用都会进入成本，成为消费者的负担。民航保险的问题就是没有充分的竞

争。

我痛心的是保监会不仅不正视问题，还说这种局面是好的、正常的。我相信如果外资竞争者一进来，国内保险公司马上就会垮台。到那时我们自己的保险公司已经习惯于大手大脚的经营方式，不堪一击。我提醒保监会对此应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督促已经养尊处优缺乏竞争力的国内保险业改进管理、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而不是掩盖矛盾、保护落后。保险业首先要对国内开放，要改变保险公司原来那种管理混乱、乱花钱的方式，这是解决保险业问题的首要所在。

与航空保险有关的还有飞机的事后保险。我有一次在民航报上看到我国每年要为飞机保险支付四千万美元的保险费。我建议我国可以自行开办飞机保险，因为我国平均每年飞机事故的损失大大低于四千万美元。这笔钱中国人可以自己来赚，没有必要让外国人为我们保险。这也与缺乏竞争有关。如果竞争充分，国内的保险公司会降低飞机的保险费，这个市场就不会被外国保险公司所垄断。

我对民航保险垄断行为的批评触及到了我国市场建设中的要害，这种问题广泛地存在于电信、金融、能源、交通等由行政力量控制的重点部门。这些基础行业的垄断垫高了各行各业的经营成本，阻碍了资本流动，压抑了投资需求和市场消息，降低了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

经济学家周其仁把垄断称为“中国经济的癌症”，按这个说法，我们应运用自己的经济思想和一切阻碍中国社会图强致富的因素作斗争，这种斗争将一直进行下去。

问：近年来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学向何处发展和对市场制度的讨论、研究日益增多，对此您有何见解？

答：经济学有许多不同的定义。我认为比较确切的定义是“通过改进资源配置，寻求社会的致富”。首先经济学是研究致富之道的，但不是个人的致富，而是社会的致富。这里的社会可以指一个地区、国家、乃至全世界。如果某种办法可以使一个人或一部分人致富，但是以其他人变穷为代价，这不是经济学的目标。除非富的量超过了穷的量，而且这种办法可以平等地应用于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所以经济学必须研究社会的全局，研究得和失两方面。其次，经济学不研究通过改进技术的致富，只研究如何改进资源的配置来致富。人力、土地、资金、电力等等一切资源都有多种用途，如何改进其分配使浪费减少，人们得到的满足为极大，这是经济学的任务。过去认为保持一个合适的比例就可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现在懂得了并不存在这种比例，寻求这种比例是枉然的。正确的提法倒是对每一份可以分配的资源应懂得如何从多种用途中作出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是研究选择的科学而不是研究比例的科学。

迄今为止，从上述的定义来衡量经济的主要成就，是用严密的逻辑证明了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和直观结论。这一成就确实是伟大的，因为它和一般常识所相信的相反。一般人都相信，要实现社会的富裕必须让每个社会成员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都认为私是万恶之源，如果每个人都为自己的私利，社会必定是四分五裂，何谈富裕。计划经济的哲学基础就是建立在这种共同目标基础上的，然而人类社会发展的

事实证明了斯密的结论，也印证了经济学的基本理论。

产权经济学和交易费用理论认为：产权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是发展市场的必要条件。事实上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交易无非是所有权之交换。如果所有权尚不明确，何来交换？可是这个简单的道理花费了漫长的时间才认识清楚。

然而产权明晰并不是发展市场的充分条件，它仅仅是一个必要条件。以俄罗斯为例，那里已实现了彻底的私有化，产权已经明确，可是市场并未建立。问题出在哪里呢？如果我们检查一下交换使双方获利的条件，不难发现，平等地位的讨价还价，自由的选择权利是交换能使双方同时获利的必要条件。如果一个社会内人和人的社会地位不平等，一方可以胁迫另一方就范，交换就可能只使一方获利而使另一方受损。拿印度为例，它是一个有发达交换的多党制民主国家，可是市场制度远未建立。其原因就是社会地位的不平等。许多同志都同意这样一个结论即中国的市场还很不完善。但建立完善市场的根本性障碍何在，我们只把注意力放在了产权的明晰，而未注意到市场的另一个必要条件，即平等的竞争条件和在市场上选择的自由。

市场制度并非人类社会最好的制度。它将向什么方向演变？能不能根据经济学的原理作一些推测？

第一个推测是资源的稀缺将长期存在下去。有人认为不断发达的科学技术可以完全克服稀缺性，从而实现“各取所需”的分配方式。但经济学却认为资源相对于人的无限欲望而言是永远稀缺的。

第二点推测是缓解资源稀缺的问题固然要依靠科学技术，但必须在一个正确价格系统的背景之下来运作。经济学就是

和资源稀缺作斗争的学问。所以第二个推测的结论是为了克服稀缺性，价格必须长期存在下去。

第三点推测是均衡价格只有在供需双方各自出自关心自己利益的立场上，通过竞争才能产生。因而全面的全民所有制不可能产生出有效率的均衡价格。

第四点推测是根据普遍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随着人们物质享受的不断扩大和满足，通过交换所获得的物质享受逐渐退居次要地位，人们将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追求不能通过交换的满足，如健康、寿命、友谊、环境、求知、创造。当今人们“一切向钱看”的风气将演变成以追求非交换的成就的风气。

第五点推测是经济学需要发展出提高消费效率的制度原则。迄今为止的经济学只研究到生产出最终产品为止的这个过程，产品卖出去了，实现了它的价值，也就走出了经济学家的视野。所谓资源配置效率，只指生产的效率，消费的浪费从来不在经济学家的思考之内。如果经济学不过问消费的效率，环境和资源的约束迟早会对人类施以报复。第四点中谈到了人类追求目标的升华，但它的制度保证和机制设计需要我们动用极大的智慧去思考。

以上的推测也许会在今后 200、300、400 年之内逐渐出现。但我决不认为“一万年也不会变”。

问：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您在山西的一个小村庄作过一个关于资本力量[■]的实验。作一个这样的实验，最后有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另外您曾经在湖北的一个乡村作过乡村改革实验，我也想知道这件事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的。

答：我在山西一个村庄里搞了一个扶贫的小额贷款，那是 1993 年开始搞的。开始的时候，我拿了几百块钱交给一个小学老师，他也可以把它借给老百姓，但是必须得还钱，如果是用于生产的，还得付利息，如果用于看病或者是小孩上学，那么这个借的钱可以不付利息。过了半年，借出去的钱又还回来了，又增加了一点钱。最初从几百块钱开始，变成几千元、几万元，到现在大概有了接近 30 万元。这个钱不是我个人的，我只是开了个头，主要是我的亲戚朋友的，也有个别的，像旅顺就有一位老师，他筹了好几千元钱，这个钱有捐赠性质。到 1998 年，我想了一个新办法，我向我的亲戚朋友借钱，我付给他们利息。然后我把这个钱借给老百姓去花，我从老百姓那里收利息。付这个利息有一个差，我借钱的利息 6%，我借给老百姓的利息是 12%，所以有 6% 的利息差。实际上没有那么多，因为有一部分借款是看病和上学，这部分大概占到 1/3。1/3 的钱借出去是没有利息的，实际上我能得到的利息大概是 8%，付的利息是 6%，所以我还有 2% 的利息差，这个利息差就拿来作管理费用，用于管理资本，我请了几个人，每个月给他们 500 元钱的工资，到现在呢，我的小额贷款不但没有赔钱，而且还赚钱。9 年下来赚了 1 万元钱，这 1 万元钱又放在这个资金里头去，扩大基金的服务，我等于吸收存款。我问人借钱，我付给他 6% 的利息，但是我要扣他 20% 所得税，我帮他交税。那么这个结果是什么，就是借钱给我的人拿到 6% 的利息，如果他存国家银行，2% 都不到，我帮他交 20% 的税，所以当地税务局增加了几千块钱的收入。农民借了我的钱去搞生产，他们的生

产得到了发展。

我头一次去那个村子是 1996 年，我 2001 年再去，看到情况变化很大，许多人盖了新房，买了新摩托车，差不多家家户户都有彩电。当然这个作用不光是我基金的作用，各方面的作用都有。

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人民银行不同意我借钱，说这样违背了经营规则，因此叫我停下来。我写了封信给人民银行，说我这件事对所有人都有利，没有对任何一个人造成损害，借款给我的都拿到利息，政府增加了收入，农民得到资金。如果你把我停下来的话，农民就去借高利贷，当地的高利贷最起码年息是 30%。因此，你把我的取消了，对所有人都不利，所以我说请人民银行重新考虑，人民银行也就睁一眼闭一眼，现在这件事还在做。

中国的改革，就是不断地突破这些不合理的条条框框，我觉得我在农村搞这个小额贷款，就是一个例子。有一个同志问我，你个人在这个小额贷款基金中问赚了多少钱？我跟他讲我没有赚钱，我不但没有赚钱，我每年有好几万块钱花在扶贫上面。我的收入也不多，但是也不少，还能花得起几万块钱。这里要说明什么问题，特别重要的一点，假定我是以赚钱为目的的，这个事似乎就不值得做，我是以扶贫为目的，非营利的，所以才有价值。其实，它造成的结果是一样的，人们存钱到我这来增加了利息收入，政府增加了税收，老百姓扩大了生产。如果我不是以扶贫为目的，而是以营利为目的，这三个作用一样可以达到。我觉得我们老百姓有很大的错误的理解，还是对市场经济不了解。市场经济它的好处就是，我如果赚钱，这个社会就发展起来了，它是靠赚钱

发展的。我开始办的时候不是想赚钱，现在觉得我得赚钱，我才能推广。我这个模式是非常值得推广的，但是为什么没推广呢？有人说，不能赚钱谁来干呀。当然有人干，有人关心弱势群体，关心农村改革，这些是有人干的，政府也在干，国际组织、世界银行都在干，但是这些力量都没有市场的推动力量大，如果这个过程人们可以赚很多钱（搞金融是很赚钱的），那农村经济就活起来了。现在农村金融问题非常大，老百姓借钱没处借去，只好去借高利贷，政府还要打击高利贷，那你叫农民怎么办？农民搞生产上哪去弄钱？这说明我们的金融改革要花很大的力气。这是头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在湖北作了农民公民教育的一个实验。我现在有一个想法，我们国家最近一次修改宪法，规定了国家要走向民主和法制。我们国家的每个人都希望中国变成民主社会，变成一个市场经济的社会，变成一个安定的、能持续发展的社会。这里头最主要的障碍在什么地方？很多人判断障碍在政府，政府不放权，你怎么搞民主呀？我的看法不一样，我的看法主要问题在中国的老百姓，中国老百姓不适合民主政治社会，因为民主政治社会头一条就是自己管自己，如果你老是要别人管，那么你怎么能够实现民主呢？我再从交税这一点来讲，中国人交税的意识就非常淡薄，能躲的就躲，能不交的不交，政府是老百姓的一面镜子。你现在看到的所有政府的毛病，归根结底都出在老百姓的身上。我们学市场经济学了 20 年吧，现在进步很大。同样，我们也要学民主政策，也得学十几二十年，所以我们就在湖北作了一个公民教育的试点。试点的结果不错，但是力量太小了，受到我们影响的就一两千。全国有 8 亿农民，另外还有 5

亿城镇居民，都需要进行公民教育。所以我们现在又开展了一个项目，在北京的东城区开展城市市民公民教育。我觉得这是一个长期的工程，我们不怕小，做一点算一点，这样子慢慢地做，10年下来，国家就可以变成一个好的国家。

问：在目前中国许多领域，信用不良问题已越来越凸显起来，其严重性已到了非整治改进不可的地步了，您在2003年举办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曾专门呼吁过，具体包含哪些方面？

答：信用不良当然包括许多方面，在这里我只想再强调一点，就是信用不良和政治是否清明是有关的。首先，司法的公正直接关系到信用能否牢靠地建立。信用之所以被破坏，是因为不守信的人能占便宜，好人反而吃亏。坏人占便宜，好人吃亏，社会的正义不能伸张，信用就更谈不上。如果一切由于毁信而损人利己的行为都能得到司法公正的处理，社会信用自然会提高。司法公正是主持正义所必需的，它是政治改革中重要的一个方面，同时又是和改善信用水平直接相关的。

和美国、德国等比较，中国社会上对说谎似乎比较宽容。美国总统尼克松因为说谎下了台，克林顿也因为说谎而差一点下台。我们常说的所谓舆论引导，实际上和说谎仅有一纸之隔。所谓舆论引导其实就是让你知道当局想叫你知道的事，而将事实的另外一部分隐瞒起来。这样做虽然能够蒙蔽于一时，但是真相终究要被揭露，当局最后损失的是最宝贵的公信力，同时也极大地损害了社会的诚信水平。提高社会的诚

信水平很不容易，但是破坏它却十分简单。

问：茅老！中国的大多数人士都是通过天则经济研究所而了解和熟悉您的。天则所成功地创办至今十年，可谓是您个人的最大成就，请介绍一下天则所的情况和主要学术活动。

答：“天则”语出《诗经》“天生蒸民，有物有则”，取意为“合乎天道自然之制度规则”，也即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其中的“制度”既包括企业、市场等经济制度，也包括政治、文化制度。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是经北京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注册的事业法人组织，是一个非营利机构。由从事现代经济学尤其是侧重制度经济学研究的经济学家张曙光、盛洪、樊纲、唐寿宁和我与致力于经济文化建设的北京大象文化有限公司共同发起，于1993年7月创立。现任理事长兼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教授，所长盛洪博士，我为常务理事。“天则”的博大涵容来自于它的独立精神，由于负责人不是上级委派的，所以不对任何上级机关负责，因此我们较大的活动空间和自由度，这对一个学术研究机构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宗旨是支持并提供经济学理论和前沿信社会经济问题的高质量研究，推进经济学的国际交流和理论研究，并将经济学和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产业化。

天则经济研究所荟萃了第一流的经济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以及人文和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学者，他们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国内著名院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

发展改革委员会、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关总署、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等政府部门；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以及欧美大学研究机构等单位。天则经济研究所在保持与这些学者交流的同时，与上述单位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

外，天则经济研究所还与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福特基金会、琼斯基金会、美国商会、国际民营企业中心、亚洲基金会等国际组织，及各国驻华使馆有着不同类型的合作关系。美国《时代》周刊和《商业中国》早在 1995 年就采访并详细介绍了我们，国内的《经济学消息报》几乎每期都有关于天则所的消息。

丰富雄厚的人力资源和广泛深入的社会联系相得益彰，使天则经济研究所在学术活动与社会服务中发挥着独特作用。我们既倡导学术独立的精神，又怀着积极的入世理想，并把这些理想付诸实际。“千镒之裘，非一狐之白也”可形容天则团结学界人士的风格，更适用于天则的入世风格。记得在 1997 年，有学者称，天则学派已形成，我立即发文纠正，称曰，天则学派，目标而非现实。关于天则的目标，正如我在 1996 年致辞中所说的，我们希望在中国制度演变中产生的新生事物——天则经济研究所，会茁壮成长，为中国人、为全人类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我们专注于以下领域的学术活动：

1. 广泛吸取社会人文科学和现代科学技术的优秀成果，借鉴中外经济学的先进理论，开展中国现代经济学研究，以提高中国经济学理论水准；

对中国制度变迁过程中的经济、政治、社会问题进行研究；

2. 对宏观经济理论及中国宏观经济问题进行研究；

4. 对产业经济学及中国产业结构与产业组织问题进行研究；

培训经济研究与分析人才及经营管理人才；

5. 从事学术交流出版活动，将经济学和社会人文科学理论推向社会；

7. 组织国际国内学术会议，推进中外知识界尤其是经济理论的对话沟通；

8. 定期举办天则双周学术讨论会、天则读书研讨会。有不少人认为天则所是社科院“体制外”的产物，这种认识不太正确，应该说“天则”与社科院是互补大于排斥，合作大于竞争，不仅天则的主要经济学者具有社科院研究员职称，而且“天则”也是社科院系统学者发表言论的重要论坛。我们的双周学术会、天则读书研讨会至今已举办两百多次；

9. 举办天则学术年会；

10. 对中国企业组织与管理中的制度创新进行研究，从1994年起编辑出版了《中国经济学》系列丛刊，所选论文的质量和影响力是公认的。我们严之又严的学术标准，慎之又慎的治学态度，使之能代表中国经济学的水平。

天则经济研究所成立以来承担了大量经济咨询业务，1996年被亚洲开发银行批准为其注册咨询公司，1997年被非洲开发银行批准为其注册咨询公司。天则所咨询的最显著的特色，是提供制度创新方案，同时也提供它具有优势资源的其他方面的咨询：

1. 企业制度与管理诊断和制度创新方案设计，完成了亚

洲开发银行、福特基金会和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委托的多个项目：

2. 中国宏观经济分析；

产业结构与产业组织研究；

3. 能源、环境、交通领域内微观经济课题的研究；

5. 为地区、部门和行业设计发展战略、改革方案和经济对策；

6. 企业发展战略咨询；

7. 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

8. 企业并购咨询与策划；

9. 为政府部门提供政策研究和咨询；

10. 应客户要求组织国际、国内各种类型的培训班。

国内也完成了“广西玉柴公司发展战略”、“西安城市发展模式”、“天津电解铜厂改组设计与论证”等项目。

著名学者林毅夫在评价天则对制度创新的作用时说：“像天则所这样一个民间团体所能发挥的作用，从 30 年或更长的时间来看，它发挥的作用可能比官方还大。”

问：天则经济研究所在风风雨雨中渡过十个春秋，受到了各界普遍地赞扬和好评。您作为主要的奠基人之一，一定有很多感慨吧？

答：我在 1993 年退休后的十年中办了三件事，其中牵扯精力最大的就是和盛洪、张曙光等同志办了天则经济研究所。至今十年过去，可以来说一说，办一个民办研究所主要的精神应该是什么，主要的危险又是什么。

民办的研究所是一个非政府组织。首先要回答为什么要非政府组织。过去几乎一切都由政府包办，政府最主要的特点是具有强制力。有人说国家是阶级对阶级的专政工具，它表现为以暴力作后盾的权威。国家机关的干部养成了一种作风，往往是高人一等，缺乏商量的余地，不容人选择。而社会上的许多事情应该是出于自愿的。这样就产生了对非政府组织的需要。一切非政府组织都有他们的共同点，就是自愿参与，自由退出。之所以有人愿意参与是因为他们所做的事对社会是有益的。普及教育，发展文化和科研，帮助穷人，照顾关心监狱犯人的子女，监督政府，这一类的事既不需要暴力作后盾，又不能由以赚钱为目的的企业去办，所以要有非政府组织。这就决定了非政府组织的基本特点：一，它关心社会的公共利益；二，它不以营利为目的。

这是非政府组织存在的必要性。但是是否真能组织起来发挥作用，还要看有没有适当的资源。在市场的环境中不论做什么事都要有钱。钱从何来？它只能从社会上的个人或企业来，或者从其他的非政府组织来。而且这些单位愿意出钱完全出于非自利的目的，是一种捐赠的性质。在过去的几千年人类历史的，虽然有对非政府组织的需要，但是因为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没有能力出这份钱，所以没有发展起来。一直到了市场经济得到充分发达，社会财富极大地增加以后，这种组织才逐渐出现并壮大。十年前天则所刚刚成立的时候，我国经济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富有，社会上很少人知道什么是非政府组织，因此很难从国内的个人和企业捐到钱。除了最初的一笔钱从当时的大象文化公司投入，其他的收入主要靠国际组织，包括亚洲开发银行、福特基金会、国际民营企业

中心等。十年以后的今天，情况有变化，不但国内企业逐渐资助天则所，连政府机关也邀请天则所参与有关的研究。我们的经费有了多元化的来源。一方面这是好现象，筹资的机会增加了，但是随机性也更大。没有一个稳定的资金来源，使得天则所的前途充满着不确定性，只要经济来源断绝，天则所就要停止运作。

处于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只有做好自己的工作，才能使天则所能够继续存在并发挥更大的作用。要做好工作，我认为主要是遵循两条原则。首先是保持独立性，做真正是社会关心并且有益于社会的事；其次是要有一定的献身精神。做到这两条都是不容易的。

在市场经济中，企业的好坏很容易鉴别，赚钱的企业一般来讲就是好企业，但是对于非政府组织，业绩的好坏不能用赚不赚钱来判断，用什么标准来判断？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天则所运行十年没有积累任何财产，既没有买房，也没有买车，更没有大笔现款。但是这并不能证明天则所办得不好，因为非政府组织的目的不在赚钱，而在社会效益，而社会效益是无法用单一的指标来测量的。

总体来看，天则所的社会影响在不断扩大。这个过程看似自然，其实极不容易。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很特殊的政治环境中，既要保持独立性，又要保证自己的安全，很像是在走钢丝。按理说，只要守法活动就应该是政治上安全的。然而在中国，即使是宪法所规定的权利，也不能完全得到保障。比如言论自由，结社和集会的自由，更不用说游行示威的自由，尽管这些权利都明确地规定在宪法之中。因此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危险的，是个十分微妙的问题。用走钢

丝来形容并不为过。所幸的是中国的国际国内大环境一直在慢慢地改善，自由的空间在扩大，这正是我们所追求的，而且这个变化也有我们努力的一份贡献。

天则所面临的危险不但有来自外面的，也有来自内部的。主要是管理方面的问题。经济学家未必善于管理，它涉及人事、财务、业务方针、对外关系等。天则所在这些方面都有过经验教训。管理和经济学是不同的两门学科，经济学家并不善于管理。不过我认为制度经济学所阐明的一般规律至少可以保证天则所不出大问题。这些规律包括各方面遵守既定的程序和议事规则，互相尊重，平等待人，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得理要让人。这些原则经济学家都是承认的，但是临到自己头上也难免犯糊涂。天则所建所的所谓人合关系就是互相学习的一个磨合过程，而且这是一个永远需要提高没有止境的过程。

天则所十年的历程基本上是成功的。我希望它能愈办愈好。我还将像过去一样贡献我的主要精力于天则所的事业。但是由于年龄关系，再继续服务十年的可能性是不存在了。

问：大家都注意到，近年来您对道德、人权、自由等方面的关注超过以往，2003年5月又出版了新著《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请解释一下这个书名的含义。

答：我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非常伟大的成功。我们自己身在其中并不感觉。可是许多外国朋友，尤其是经济转型的国家，对我们的成功非常羡慕。改革成功的基本经验是什么？无非是扩大了人民选择的自由度。过去一般百姓不可以坐飞

机，不可以坐软席卧铺，现在只要有钱，这些都能买；过去不许可农民进城谋职，现在限制放宽了许多；过去不能辞职自谋职业，现在可以到国外去干活。我国的经济活力主要来自百姓的活动自由度的增加。当然和发达国家比，自由度还不够。自由度越大，人才施展的机会越多，人才被埋没的机会越少。世界银行等机构专门研究过经济自由度和经济发达水平之间的关系，得到的结论是，自由度高的国家发达水平也较高。

有人把自由理解为为所欲为，这是很大的误解。恰好相反，自由是不干涉别人的自由。要理解这一点，必须认识到，自己既是自己，又是他人的别人。从全社会来看，自己跟别人是没有区别的。如果每个人都不干涉他人的自由，这意味着每个人都生活在无人干涉其自由的环境中，这样全社会岂非得到了最大的自由？自由的敌人正是少数企图干涉他人自由的人，在肆意侵犯他人的自由。

在有阶级的社会中，特权阶级就是常常干涉别人自由的人。他们拥有一般人所不具备的特权，由于成文的或不成文的规定，特权者的自由比一般人的自由更多。他们额外的自由是靠着牺牲他人的自由而得到的，这显然是一个不公平的社会。在消灭了特权阶级的社会里，人与人是平等的，任何人都不能侵犯他人的自由，包括父母、夫妻、老师和官员。但是政府必须有权威，这不是特权，而是管理公共事务所必需的。当然政府的权威是用于保卫人民基本权利的，可不能用来无端地侵犯人们的自由。

取消了能侵犯他人自由的特权，每个人的自由就自然存在着，用不着再去争取。我们所追求的社会就是人人平等、

没有特权的社會，也是每個人享有充分自由的社會，所以自由不是任何人恩賜的。雖然當今特權正在消亡，但由於對愛的誤解，往往發生對他人自由的侵犯。所以我要呼喚：給你所愛的人以自由。

在國際關係中，彼此尊重，不干涉他國的自由，同樣是不可動搖的原則，當然這個自由是以不侵犯別國的自由為限。我們討厭霸權主義的干涉，我們自己也不應對別的国家限制其自由，規定其選擇。世界上的許多爭端，正是因為國家之間試圖用特權去干預純屬別國主權範圍內的事。中國永遠不稱霸，就是不強加於人，不干涉他國的自由，尊重他國的主權和自由。

不論從家庭、社會，還是國際的範圍里來看，一個人的自由並不需要以減少他人的自由為代價，所以自由可以成為人的基本權利。從社會的角度看，它是沒有代價的，社會並不為此而有所損失，但使得它的成員得到了所希望的東西。有些人並不懂得自由的重要性，對自己所愛的人就“理直氣壯”地侵犯他們的自由，造成了許多人間悲劇。所以我再次呼喚：給你所愛的人以自由。

問：眾所周知，當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時，相應的政治體制也應有所改革和發展，而在中國這又是一個人們很感興趣的話題。前不久，您發表了專文《政治體制改革是每個人的事》，在社會各界引起了很大反響且大多數評論是贊成和肯定的。能否談談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

答：回顧過去經濟改革的成功，實際上是和靜悄悄地進

行着的政治改革有关的。个人权利的扩大，可以自由选择职业；特权的减少，权力调拨资源的制度改变为市场配置；花钱就能得到同样的消费享受而与级别无关，使挣钱的积极性增加，也是社会更为民主的一个方面；私人可以从事工商企业，创造财富的机会被充分发掘；承认个人追求自己利益的正当性，使不必要侵犯他人利益的事大为减少等等，都属于政治改革的范围，都对经济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自由选择职业，人力资源得到更充分的利用。计划经济时代普遍存在的“在本单位是一条虫，出去变了一条龙”的现象，说明人力资源被误用。自由选择，自由流动，使人才得到更充分的使用。取消了物资的计划调拨，让物资自由流动，也使物资能够更好地使用。所以市场经济更接近于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但是这方面改革的机会还有很多。农民进城的限制虽然已经放松，但是障碍仍然很多。他们在城里立足，谋职还要暂住证、打工证等，成本极高。有一些行业至今仍然不对私人开放，如金融业、通信业、石油、铁路等。

不少人并不懂得政治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认为政治不改革，保持现状，经济同样能够发展。其实，现在社会问题已经积累到相当的程度，这些问题总起来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一旦遇到特殊事变，诸如金融危机、重大的自然灾害、国际政治的大动荡，就有引发国内危机的可能。所以进行政治改革，是防患于未然的最佳措施。社会动荡的根源来自底层的低收入群体，高收入群体往往高枕无忧，很少注意到这些社会现象，意识不到事态发展到了什么程度，等到发现问题严重时为时已晚。因为发展是一个全面改进的过程，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教育、文化、习俗，任何一个方面的落

后会拖累社会的全面进步。过去十多年，中国在经济方面进步突出，然而在其他方面的改革相对落后，有的改进有限，有的没有改进，这大概是相当普遍的共识。所以新一届政府组成之后，各方面对进一步推进各项改革提出了强烈呼吁。从现实生活中看，一些领域落后现象还很明显，收入差距扩大、犯罪率上升、三农问题突出、司法不公、贪污腐化等等，都是各方面改革参差不齐的结果，甚至于有人说是经济改革所造成的。其实，这是经济改革单刀独进，其他改革相对落后的结果。

邓小平同志很早就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中央领导和社会各界也都积极地参与和响应过，但是与经济改革比起来，政治改革似乎落后了。我们可以想象，光有经济改革而没有政治改革，我国建不成发达国家，所以政治改革确实是当务之急。这次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再次提出政治改革的任务，这给我们每个人出了题目，我们应该如何参与其中？

总体来看经济改革是成功的，尽管问题不少，但全世界都承认我们成功。当然，改革成功并不等于没有错误。但是人不是神仙，要让每一项决策都正确是不可能的。事后诸葛亮容易做，但是谁也不敢保证自己的决策永远都是对的。可是就有一些人喜欢用事后诸葛亮的态度看问题。

当前进一步的改革所面临的问题，越来越集中在政治层面上。换句话讲，政治改革显得落后于经济改革。如果政治改革不加速一点，经济改革将面临更多的困难。事实上改革的目的是发展，而发展是全面的，不光是经济方面的。它包括教育、人与人的平等、个人基本权利的保障、选择机会的

扩大和均等。这些方面远远超过单纯的经济目标。要全面实现这些目标并不是单凭个人努力就能做到的，它牵涉到一系列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就是政治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不过它最后应该落实到个人的自由和幸福。

经济改革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亲自参与了的，否则它不可能产生如此大的效果。政治改革更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参与，我们往往以为这只是政府的事，或者只是领导的事。如果没有像经济改革那样大多数人参与，政治改革将很难成功。在经济改革中每个人参与的程度是不同的，有的是积极参与，比如参加政策的制定，参与改革的讨论，在各种场合下发表自己的意见，直接间接地影响周围的人；有的是被动参与，比如自由选择工作，在市场上做买卖赚钱等，虽然看起来是坐享其成，其实也是重要的参与。当然也有少数人自觉不自觉地成了改革的阻力，坚持计划经济那一套做法，拒绝私营经济的发展，抵制西方先进文明的引进。

拿政治改革来看，我们每个人也都会参与其事，或者是积极地，或者是间接地，还可能是起了反作用的。探讨一下我们每个人如何最有效地参与，把力量用在最有效的地方，不要白使劲，更不要帮倒忙，这样肯定能使政治改革进行得更顺利一些。我有不少年轻朋友，对改革充满热情，但是不得其门而入，或者方法不对，反而起了反作用。

我认为解决如何参与政治改革的问题，其核心在于结合自己的条件，实事求是地寻求参与的途径，不要光有理想，脱离实际。我经常收到朋友写来的长信，往往长达十几页，托我转交给总书记或总理（其实我没有任何特殊途径可直达最高领导）。他们的热心可嘉，但是途径不对，结果是白费力

气，浪费了大量精力。由于白费了力气，又可能转而变成消极低沉。这都是因为方法和途径不对造成的。

我们每个人都处于一个特定的地位。总书记和总理有他们的特定地位，他们有很大的影响力，可以做许多一般人不能做的事，但是他们也绝不是万能的，更多的事是要我们大家去做的。如果大家不做，光是领导着急，政治改革照样推不动。普通老百姓，不论是农民、工人、干部、军人、知识分子等等，在自己的特定岗位上都可以为政改作出贡献。政治改革的基本方向是民主和法治，这两方面都需要政府和百姓双方的努力，缺了任何一方都难于进行。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百姓一方，因为政府其实是百姓构成的，有什么样的百姓就会有怎样的政府。政府只不过是百姓的一面镜子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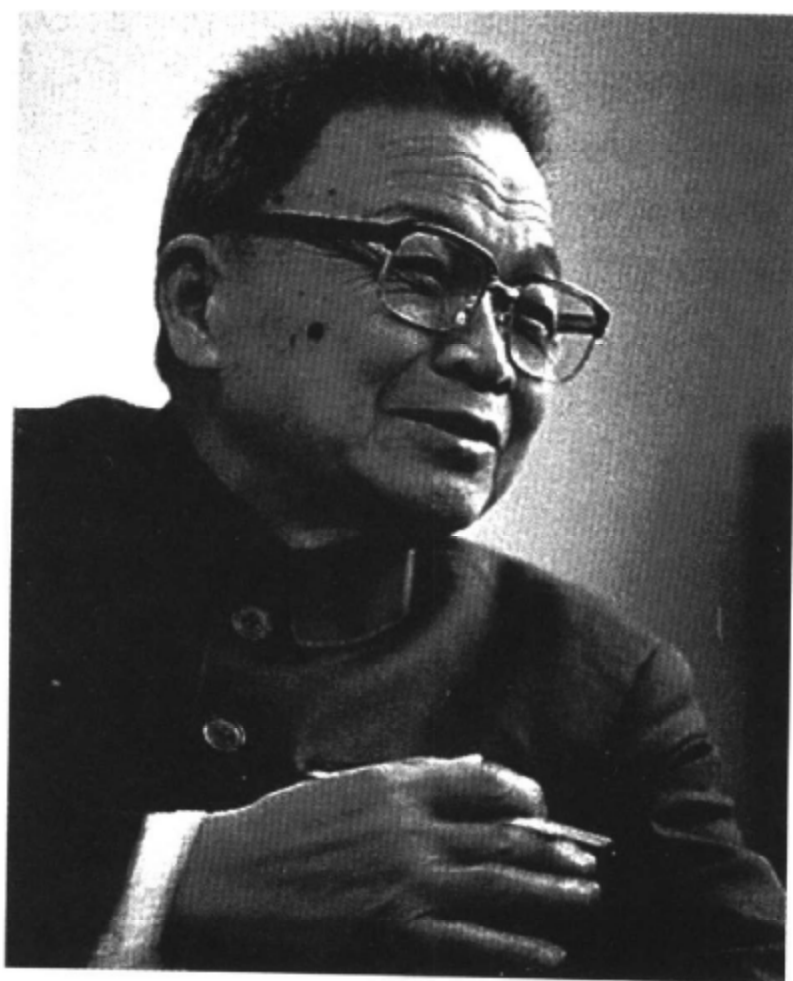
在一个民主国家里，大多数百姓应该懂得自己作为民主社会中一员应有的权利和义务。比如说，他应该在享受政府服务的同时承担纳税的义务，他应该维护公共场所的清洁，遵守公共秩序。在民主社会中更需要有一批人主动关心社会关心国家，他们不但积极地承担义务，自己纳税，而且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公共生活中去。比如关心所缴纳的税款是如何使用的，参加选举，运用宪法所赋予的权利发表政治见解，甚至参加竞选。在和他人意见不同时，懂得彼此尊重，协商妥协，用民主的方式避免冲突，达成共识。相反，如果一个社会里的百姓逃税成风，大家都不遵守公共秩序，自己管不了自己，还要别人来管，一旦社会上出现政治风波，就采取革命造反的极端手段，这样的社会怎么可能成为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当然，社会是复杂的，我们不可能要求每个人都有很高的公共意识，但是如果这部分人数比例太低的话，形

式上的民主并不能得到民主的好处，反而成为一些政治野心家玩弄权术，为自己牟利的机会。世界上这样的国家不在少数。真正能得到民主利益的国家都有一个较高的国民素质，这正是这个社会全面发展的结果。这也是我们所应该追求的。

这样看来，政治改革实际上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全民提高的过程，着急是没有用的，消极等待则更有害。因为经济改革必须有相应的政治改革相配套，用一种更全面更积极的态度来看待政治改革，就能够发现，我们参与许多公共事务都具有政治改革的意义。甚至我们每个人所从事的职业也属于公共事务，也是政治改革中的一环。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每个人在自己的特定条件下，在自己的岗位上都可以参与政治改革。在红绿灯显示红灯时不要穿越马路，这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如果有人不遵守交通规则，自己能善意地提出批评，这就是积极地参与了政治改革。该排队的地方有人不排队（这是我和发达国家很明显的差距），能够善意地劝导，也是参与了政治改革。这样的参与比写信给总理作用大得多，也许主观感觉上不是这样，但事实就是这样。总理可以做许多他能够做的事，但是老百姓不遵守红绿灯的指示，不排队，他虽然身为总理对此也无能为力。现在北京、杭州等地的十字路口都有交通协管员帮助维持秩序，这是政府能够做的，但是百姓老是靠政府派人来管理自己，终究不是当家做主的民主社会里应有的现象。民主的理想只有靠我们每一个人自我提高，理想才能有真正实现的可能。当然，仅仅劝导别人遵守交通规则是不够的，每个人还能够做许多事，究竟做什么，就看各人自己的条件。既不要好高骛远，也不要无所作为。这就是我对人人参加政治改革的看法。

《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对话(第六辑)》

影响中国经济走向的人——薛暮桥



薛暮桥先生近照

薛暮桥简历

1904年10月25日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市。

1918年考入江苏省第三师范学校，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随高年级学生上街游行。

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于浙江省工人运动，之后开始学习苏联的《政治经济学》和日本的《资本主义经济史》等进步书籍，并学习世界语和英语。

1932年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参加了中国农村经济调查等活动。

1934~1938年任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理事，主编《中国农村》月刊。

1938~1942年底，在新四军从事教育工作，主要讲授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等课程。

1949年10月任中央财经委秘书长兼私营企业局局长。参加了统一财经、平抑物价、改造私营工商业等工作。

1954年任国家计委副主任，9月参加了新中国第一届第一次全国人代会。

1955年5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之后，受中宣部委托，与孙冶方、于光远三人合编政治经济学教材，同年冬天，率代表团访问苏联，与苏联同行广泛交流。

1958年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国家经委副主任。

1961年10月任国家计委副主任，1962年5月被任命为

新成立的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

1976年任国家计委顾问兼经济研究所所长。

1979年底，其代表作《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出版总发行量上千万册，并译成多国文字在国外出版。

1980年5月，任国务院经济体改办顾问。7月，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

1982年9月出席党的十二大，在小组会上发言，坚决拥护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

1984年5月在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上，赞同全国经济工作重点从调整转向改革。改革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的决定，9月参加了由世界银行邀请的国际著名经济学家来中国参加“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即著名的“巴山轮”会议。

1990年7月参加了中央政治局常委邀集部分经济专家召开的经济形势和对策座谈会。

1991年针对社会上出现的使改革发生逆转的思想倾向，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专文综合阐述，反对把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建立市场经济对立起来。

1992年7月，发表了“我的经济观是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一文，收录在《当代中国百名经济学家自述》中，9月发表“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一文，收集在《著名学者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书中。

1994年10月25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计委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祝贺薛暮桥同志从事经济工作和经济理论研究六十年座谈会》，朱镕基同志到会祝贺。

吴敬琏致薛老的信

敬爱的薛老：

自从 1959 年为准备全国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讨论会经济研究所临时分配我当您的助手以来，36 年已经过去了。在和您的接触中，特别是 1984 年以后在您的领导下工作朝夕相处，我的最大感受，是您的那种超乎寻常的严肃工作态度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精神。您对二三十年代我国浙江一带发达的市场经济有切身的体验，又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素养，对于解放后的经济发展，更由于亲身参与最高领导层决策而对政策演变的来龙去脉如数家珍，然而您从来不凭感觉办事，也从不固守老经验。我感到您最了不起的地方是，即使到了 70 开外的高龄，仍然能够不断汲取新的知识，不断更新自己的观念，使您的思想始终站在我国理论界的前列。到了耄耋之年，还以极大热情参与理论和政策的讨论。您在 1990 年针对当时保守思想回潮写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和《致中共中央常委的信》这两篇宏文，把有关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理论和政策论述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我认为，您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您具有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应当具备的基本品质，这就是认真求实和不断创新的精神。您的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这些后生晚辈永远学习的。

吴敬琏

1994 年 10 月 24 日于斯坦福

刘国光致薛老的贺辞

向薛老致以我衷心的祝贺和诚挚的敬意。薛老是我国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家。他对我国经济工作和理论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他的指点和帮助下，成长了我国一大批优秀的经济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薛老治学的最大特点，是理论密切结合实际，在实践中形成、修正和发展他的理论观点，因而能够始终扣紧时代的脉搏，不断做出新贡献。我认为，我们祝贺薛老从事经济工作和经济理论研究六十年，就要学习他理论联系实际、不懈地探索真理和诲人不倦的精神，为我们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添砖添瓦。祝贺薛老健康长寿！

后学 刘国光

1994年10月25日

“我很想做个学者，但我首先是个共产党员”

——写在父亲薛暮桥100岁寿辰之际

薛小和

10月25日，父亲在北京医院的病房里平安地度过了他99岁的生日。那一天，父亲单位的领导送来了鲜花和生日蛋糕，父亲的一些朋友和老部下送来了衷心的祝福，我们全家和曾经为父亲工作过的同志举行了一个小小的聚会，举杯祝

贺父亲的寿辰。虽然这个祝寿宴会因为老寿星不能参加而显得极为特殊，但它毕竟是我们的一片心意，也是弥足珍贵的。作为他的女儿，我从没想过父亲的生命力有这样顽强，在病床上又坚持了四年多的时间。这四年，父亲全身退出了世俗的喧哗，不再写作，不再发表观点，不再出入会议，用吴敬琏老师的话说：薛老被隔离了。父亲的人生定格在洁白的病床上，听任生命之河静静地流淌。在护理他之余，我时常看着他那弥陀佛般安详的面容想，他还在想什么呢？想起他的前任秘书李克穆常说的，薛老是神仙级的人物。神仙的意境又是什么样的呢？是不是就是这样平静如水的生命状态？

吴敬琏老师说：我父亲从 30 年代研究经济学，中间经历了相信计划经济，后来又力主改革、走市场经济之路的漫长过程。

父亲从小天资聪慧，小学时学习成绩很好，尤其是数学成绩突出。16 岁时因家境败落辍学到杭州铁路车站当练习生，期间，父亲凭借自己良好的数学基础，只用了 3 个月的时间就学完了原定 6 个月学完的会计业务，车站的老会计因为一直没有培养出能代替他的入，已经多年没有休假了，看见父亲掌握会计业务的速度又惊又喜，放心地把工作交给父亲休假去了。

多年来，父亲被称作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但他只有初中文化水平，他的经济学知识一方面是在三年的牢狱生活中从书本上自学来的，另一方面是 30 年代追随陈翰笙先生做农村调查时从实际中摸索出来的。我觉得父亲能在经济学研究方面取得如此的成就，除了他自身的聪明、勤奋、持之以恒外，遇到陈翰老这样一位启蒙老师是他的幸运。陈翰老在研

究问题方面反对引经据典，反对不做调查研究、空谈理论，父亲跟随他从一开始就是脚踏中国的农村，从调查出发，从实际情况出发，扎扎实实地研究问题。有人曾奇怪，怎么父亲这一代经济学家多是江苏人，那是因为陈翰老带出了一批人，他们除了父亲外，还有孙冶方、钱俊瑞、姜君臣等。解放后，父亲的职位已比陈翰老高许多，但凡是与陈翰老一起开会时，父亲绝不坐在中央，总是让陈翰老坐中央，而且张嘴讲话，第一句肯定是：“陈翰老是我的老师。”

父亲是中国经济问题的专家。一位曾在英国攻读经济学的博士对福特基金会的美国人说，你要想了解中国的经济问题，你就必须读薛暮桥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父亲对中国经济问题的了解，完全来自于实际工作和不断的调查。说起来别人也许不会相信，父亲这个大经济学家在“文革”前从未读过《资本论》，这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著作，父亲是在“文革”期间关“牛棚”和在干校劳动改造期间读的。我们家里有很多经济学的书，但父亲很少读这些书，他阅读的东西一般都是国民经济统计资料、调查报告等从实际中来的文字。他写作时，桌子上除了一本稿纸、一枝笔，就是一本统计资料，到外地去写书，就带半箱子稿纸，一把笔，一本统计资料，所要写下的一切都在他的脑子里。他在 1975 年恢复工作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到基层去调查研究，他分两次去了山东、江苏、安徽三个省，在对“文革”后的国民经济情况做了深入了解之后，才动笔撰写《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发行了近 1000 万册，曾被中宣部定为干部必读的书籍，可能很多人家里至今还保

存着这本书，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本书的写作经历了多少挫折和自我否定。大概早在上个世纪 50 年代，中宣部曾有意让父亲写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由于当时各方面条件都不具备，所以这件事从未提上日程。尽管如此，写本教科书的想法一直萦绕在父亲心头。“文革”后期，父亲随国家计委机关去了“五七干校”，初期劳动改造的热潮过去之后，干校的生活相对平静，这时，父亲就想起了他的心头之事。于是，劳动之余，他坐在小马扎上、伏在床上，开始了教科书的写作，他写了一稿又一稿，每一稿写完他都把稿纸用线装订好，再做好封面、封底，然后悉心用一块黑底红花的头巾包好。我去干校探亲时，看见他埋头写作，看见他笨手笨脚地装订稿纸，心里只觉得他那么老实，只会读书，还如此倍受造反派的折磨，那时我还小，对父亲心里的追求并不明白。就这样，他大概写了六七稿，从干校回到北京时，行装中他最呵护的就是那个黑底红花头巾包着的小包。当然，最终那些在干校床上写的东西都被否定了，写本教科书的想法也被放弃，“文革”结束后，父亲决定写一本总结历史经验的书，这就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

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中，父亲系统地批判了建国 20 多年来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在当时认识的基础上批判了计划经济体制，从书中读者可以看出他不断思索、不断追求、勇于否定自己的精神。父亲从 1948 年在西柏坡时就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开始筹备建立新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直到“文革”被打倒，他一直在计划经济体制里辛勤地工作，为建立和完善计划体制呕心沥血。正因为如此，他也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有着切身的体验，17 年间，他曾

有过两三次对计划体制非常委婉的批评，但都因形势所迫，一露头就收了回来，即便如此也付出了一些政治上的代价。1976年“文革”结束后，父亲终于摆脱了“左”倾思潮的束缚，开始一步一步地系统深入地批判计划经济体制，1980年后，更是亲身参加到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工作中，任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顾问。同年夏天，由体改办起草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中明确指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这个《初步意见》和父亲代表体改办在各省市区第一书记会议上做的《说明》虽然没有公开发表，但从改革的历史来看，可以说是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父亲这个老牌的国家计委副主任，站出来批评自己过去从事的事业，否定计划经济体制，不但体现了他不断探索、勇于批判的精神，也更使这种批评和否定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父亲是一个以思考为生活方式的人，工作时思考，写文章时思考，理发、散步时也在思考，就是在被批判、住牛棚时也不放弃思考。但由于历史的限制，他顽强的思考并未为他创造出一个思想体系，当他知道在他的有生之年不能实现这个创造以后，他就自我批判，就寻求，就吸收。他不怕否定自己，当时代证明他的看法与现实相悖时他就一次又一次的重新起步，重新思考。当然，思考的结果有变化也有执著，在变化和执著中他始终把握着分寸，这个分寸的界限就是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利益。

对于父亲在学术上的成就和治学精神，吴敬琏老师有着非常经典的概括。他在1994年10月召开的“祝贺薛暮桥同志从事经济工作和经济理论研究六十年座谈会”上有一个书

面的贺词，贺词说：“您对二三十年代我国江浙一带发达的市场经济有切身的体验，又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素养，对于解放后的经济发展，更由于亲身参与最高领导层决策而对政策演变的来龙去脉如数家珍，然而您从来不凭感觉办事，也从不固守老经验。我感到您最了不起的地方是，即使到了70开外的高龄，仍然能够不断汲取新的知识，不断更新自己的观念，使您的思想始终站在我国理论界的前列。到了耄耋之年，还以极大的热情参与理论和政策的讨论。您在1990年针对当时保守思想回潮写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和《致中共中央常委的信》这两篇宏文，把有关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理论和政策论述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我认为，您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您具有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应当具备的基本品质，这就是认真求实和不断创新的精神。”

我曾经问过父亲，你认为你的身份究竟是共产党员，还是学者。父亲回答说：“我很想做个学者，但我首先是个共产党员。”确实，父亲自1927年加入共产党那天起，特别是30年代后有了学者身份、40年代后成为党的高级干部以后，一直是给自己这样定位的。这种定位使他70多年来，始终把党和人民、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无论自己的命运如何，都与党的事业荣辱与共。但是，在信念坚定的同时，这种定位也给他造成很多矛盾，特别是当他的理论观点与党的正式文件不协调的时候，这种矛盾甚至会导致痛苦。

1982年5—9月间，按照当时国务院领导的授意，为配合党的十二大的理论准备工作，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会同国家体改委组织了一次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型理论讨论会，

讨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方针。参加讨论会的有300多人，累计召开大小讨论会不下70次，讨论历时4个月。会议开始时是在十二大以前，9月份十二大召开后，这个讨论会于9月底结束。理论界的同志都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众所周知，父亲的理论观点是主张社会主义经济应当是商品经济的，而当时的中央精神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父亲知道自己是党的高级干部，应当与中央保持一致，所以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前，凡是公开发表的文章都遵守了中央当时的提法，自己的一些不同意见只是在允许的范围内以补充解释的形式提出。但即便如此，在1981年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整理的一份材料中，他还是因为强调市场调节而被列为第四类人中，同时在小范围内受到批评。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受命组织这个讨论会感到非常为难。当然，为难归为难，对于父亲这种老共产党员来说他只有一种选择：在5月4日的动员报告中，父亲为自己的主张做了自我批评，表示“这个说法有毛病”，但他同时向大家提出一系列需要讨论的问题，希望大家敞开讨论。

我猜想这种矛盾决不止一次，这只是比较典型的一次，应该还有更痛苦的。我记得在“文革”后的1978年初，当时“四人帮”虽已被打倒，但党在经济工作方面的指导思想并没有改变。在2、3月间，父亲去参加五届人大，听罢当时国家计委领导在人大做的计划报告，父亲回到家中非常生气，以致拍着椅子的扶手失声痛哭起来。他说，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个报告还是陷在分钱分物的数字里，不讲政策，不图指导方针的改变。我当时在工厂做工，父亲说的我听不大懂，不知该怎样安慰他。以父亲那样平和、内向、长

于忍耐的性格，急到痛哭的地步真是急到极致了。因为急，所以“文革”后一恢复工作，他就到基层去调查，摸清国民经济的情况；因为急，十一届三中全会一闭幕，他就到处做报告、写文章，呼吁改革旧的经济体制。70年代末80年代初，虽然那时党内政治生活开始正常了，但父亲还是因为他的改革主张受到了几次批评，有党组的正式批评，也有多年的老领导的不满甚至拒之门外。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尽可能地坚持了他的主张，很多时候是在忍耐和等待中坚持的。

在党的纪律和个人观点的矛盾之间，父亲无论如何退守，都尽量坚守着一条底线，那就是实事求是。父亲是通过社会调查迈入经济学的大门的，所以，几十年来他已养成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考方式和研究作风。阅读他的报告和文章可以看出，文章的行文也就是他的思考路线几乎成了一个定式，讲一个问题先讲现在的实际情况，再讲关于这个问题的历史及政策演变过程，然后提出自己的意见。比如，他在1982年7月给张劲夫同志的信中，对《物价管理条例》中仅把“稳定物价”放在首要地位，不提合理调整物价提出不同意见。他先分析了当时的财政、物价情况，理解“稳定物价确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的原因，再叙述了从1950年以来我国物价政策是怎样在“稳定”和“调整”二者之间把握的，在物价上涨时着重于“稳定”，在物价趋稳时着重于“调整”，指出：“《条例》不是《暂行办法》，应该看得远一点，说得全一点。”“不提合理调整物价是不完全的。”

与许多习惯于从理论推导中得出结论的经济学家不一样，父亲更习惯于从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得出自己的观点。他不太注重概念，遣词用句也不大准确，他注重的是实际运行过程

和结果，注重从实际中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到处呼吁改革，几乎都是从20多年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讲起，他从20多年的曲曲折折中得出一定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结论，深感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迫切性；80年代中他反对通货膨胀政策，也是历数近七八年的宏观经济数据，甚至追溯到“大跃进”时期和山东解放战争时期的情况，提出应该“管住货币、放开物价”而不是“管住物价、放开货币”。

学者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共产党人则要改变世界。由于父亲将自己定位于一个共产党员，所以他对社会经济现实总是保持介入的状态，始终致力于改革经济体制、推动经济发展的事业。有人很奇怪，父亲这样一个老计委，怎么能如此坚定地主张商品经济？其实并不奇怪。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当他为之献身的事业竟然走到与其初衷完全相反的道路上去，并且由他和整个国家一起吞下自己参与种下的苦果，给他造成的刺激会更深，促使他反省的动力会更大，推动他改革的愿望会更迫切，他对改革目标的认识也容易达到常人难以达到的高度。

父亲像所有他们同时代的共产党人一样，由于历史的局限性，由于他们个人经历、观念、性格上的局限性，也犯过不少的错误。父亲就说过：“任何一个经济学家不可能完全超越时代的限制，我也不能例外。现在看来，建国以后我在各个时期写的文章中的观点，有一些就是不正确的，甚至是错误的。这些不正确的观点，有些是当时屈从于政治压力，不能畅所欲言造成的，有些是受教条主义和极‘左’思想的影响造成的。”他虽然是杰出的时代人物，但他从来对自己都有

非常清醒、冷静的认识。

在我看来，父亲固然是共产党人，但他更是智者，在他身上有着较强的知识分子特性：

他始终保持着独立思考的习惯，虽然有时他处于“沉默”或“失语”的状态，但他对事物从来都有着自己独立的见解和判断：

——他有着相当浓厚的民主思想，他对很多问题的解决办法都带有明显的多元化倾向：

他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但他不是举重若轻的战略家，他只是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国家 and 人民谋福利的实干家：

——他不大懂政治，更不玩弄政治，不会拉帮结派，不会阿谀逢迎，更不会整人；

——他淡泊名利，忍辱负重，当受到不公正的批评时，绝不会认为自己比党高明，他对党的服从并不一定是对权力的屈从，而是对真理（当时认为是真理）的认同，或是以大局为重的自我牺牲，事后，他也绝不会为个人恩怨去算历史旧账；

在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历史中，亦儒亦吏、亦官亦学一直是一个传统。但在我国第一代的领导干部中，这样的人并不多。父亲就是身上带有浓厚知识分子特性的共产党人。共产党人的党性与知识分子的特性在他身上的融合，有时引发矛盾，有时生成痛苦，但可能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升华

给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一封信

7月5日蒙邀陈述意见，深感机会难得，很想就一些根本性的重大问题，提出切实的建议，但因内容复杂，临时边想边说，该说的没有说清楚，不需要说的说了不少。回来后总想设法补救，再三考虑，决定写信再向你们陈述数月来苦思冥想所获一得之见。

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以来，将近两年，治理、整顿已经初见成效。但正如吴敬琏同志发言所说：浅层问题开始得到解决，深层根源则远未消除，形势很难说已经根本好转。所谓浅层问题得到解决，是指物价涨势得到控制，工业生产开始回升，人心趋于稳定；所谓深层问题远未消除，则在于经济效率仍旧很低，宏观调节未上轨道，条块分割日趋加剧。如果这些方面在近期内不见好转，仍有可能酿成新的危机。

为了解决以上深层问题，需要追根溯源，探究这些问题的症结所在，然后才有可能对症下药，加以根治。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10年中，以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为目标，进行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促进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特别是前5年采取边调整、边改革的方针，在大力进行经济调整的同时，放宽行政管制，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新的经济政策初试锋芒，就使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蒸蒸日上，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也有了明显改善。这些成果，为进一步进行全面改革创造了良好条件。

遗憾的是，在全面推进改革的条件已经成熟的大好形势

下，领导上却把注意力放在倡导追求无效率的速度和脱离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高消费上，十二届三中全会预定要进行的种种改革反倒一再推迟。这样，在削弱指令性计划以后，没能及时建立在市场作用的基础上用财政税收、银行信贷等经济手段进行宏观调节的指导性计划体制，留下一块空白。加之经济过热，致使国民经济陷入混乱状态，不得不从 1988 年秋季开始再次进行环境治理，不惜因此放慢增长速度。目前物价涨势虽被抑制，但工业回升乏力，而企业亏损和财政赤字却急剧增加。今年 1—8 月，工业总产值增长 2.6%，预算内工业实现利润总额比去年同期下降 56.8%，亏损企业亏损额比去年同期上升 102.4%，亏损面仍高达 34%。看来企业发展后劲不但没有增强，反而明显削弱了。这种情况说明，我们的经济情况并未根本好转。

我认为，当前国民经济的困境是由于改革在 1984 年以后停顿中断，宏观调节机制失效造成的。如果不能改变这种情况，膨胀——萧条的循环只会越来越深化，而且存在着陷入停滞膨胀而不能自拔的危险。事实上，这已不仅是理论上的推断。过去几个月内，某些深刻的矛盾正在表面平静的掩盖下积累和发展。例如，去年企业亏损补贴已从 400 多亿元上升到 600 亿元，今年势必大大增加；还有数以百亿计的各种“挂账”，实际上是强行占用银行资金，进行变相补贴。不寻求根本治理之策，而是老用这种饮鸩止渴的办法来换取社会安定，终有坐吃山空之日。一旦财政金融体系承受不了，必然引起新一轮的通货膨胀。过去，生产超高速增长下的通货膨胀，治理还比较容易；将来如果发生低速增长下的通货膨胀，治理就更加棘手。这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是很难

承受的。

最近大家对东欧剧变议论纷纷。我认为仅仅以资本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来加以解释是不够的。在我看来，东欧挫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未作彻底改革，老是跳不出乱物价、软财政、软信贷的圈子。这些国家采取对传统体制修修补补，或者搞一点零敲碎打的改革的做法，至多只能延迟矛盾的爆发，把国民经济引入慢性危机，而不可能求得经济状况的根本改善和同资本主义竞赛的胜利。当这些国家的领导认识到必须进行改革时，却发现群众对依靠现领导进行社会主义制度范围内的改革已经失去了信心，不愿给予起码的支持，因而追悔莫及。认清了这一点，才能把握亡羊补牢的时机。我们必须认准形势，当机立断。

我所谓的当机立断，是指抓紧目前花了很大代价才取得的需求与供给比较接近的时机，推出以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计划管理体制为目的的综合改革。从根本上来讲，就是在加强财政、银行的宏观调控的条件下，用放开价格的办法来理顺价格，让企业公平竞争，优胜劣汰，而不能再用“大锅饭”、“铁饭碗”的老办法，由国家“统”起来和“包”起来。

现在看来，迫切需要进行的改革，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价格改革和企业改革。

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理顺不合理的价格体系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不如此就不能理顺整个经济关系和取得改革的胜利。改革前5年是逐步向放开价格的方向前进的。消费品由于农业、轻

工业迅速发展，出现买方市场，价格放开后仍保持稳定。同时，由于压缩建设规模，生产资料供应缓和，议价趋向回落，与统配价格逐渐靠近。可惜 1985 年以后在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下，不仅双轨差价扩大，还不得不对已放开的价格严加管制，使逐渐趋向合理的价格又发生严重扭曲。在此情况下企业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等要求都无法实现。

现在许多长线产品价格高利大，短线产品价格低利小，不能引导企业调整产业结构，提高整个社会的效益，相反进行了反向调节。这些年来价高利大的产品的生产和建设，从“老 3 件”到“新 3 件”，乙烯、乳胶制品不断刮风，而煤、电、油、交通运输等卡脖子部门却因无利可图，无人愿干。这样“长线”日长，“短线”日短，结构日益扭曲，效益难于提高。与此同时，“官倒”、奸商猖獗，利用差价大发横财。权、钱交易，腐败深入干部队伍的肌体。现在情况虽已有所好转，但尽管市场疲软，产业结构并没有根本改善的迹象。而且只要扭曲的价格体系不改变，新的“长线”仍将不断涌现，资源浪费严重，效益低下的状况也不可能有明显的改变。

过去不敢大胆调、放价格，主要顾虑在总需求膨胀的条件下，放开价格会引发严重的物价上涨。目前，这方面的条件有很大改变，市场疲软为理顺物价铺平了道路。因此，我建议抓紧这个有利时机，价格政策从管制转向调整，短线产品适当提价，疲软商品鼓励降价推销。此后再进一步转向让绝大部分商品的价格全面放开，力争在“八五”前期基本上理顺价格。

现在消费品的价格仍是绝大部分放开的，明年的价格调

整重点不是消费品，而是生产资料，这对人民生活的直接影响不大。疲软消费品价格放开，还可以促使他们的价格有所下降。生产资料的计划分配部分提价，将影响加工工业的生产成本，但如基建规模能够继续得到控制，议购议销部分会自然降价。如果建设规模控制得好，涨价与降价可以互相抵消，使用议价物资的企业成本可以下降，包括议价在内的整个价格水平可以基本稳定。

价格改革是企业改革铺平道路。我们企业改革的大方向，是要使国营企业从“吃大锅饭”转变到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公平竞争、优胜劣汰，不如此我们就不能同资本主义国家竞争。不顺价格，企业改革的大方向是不可能实现的。前几年由于价格扭曲，没有一个平坦的市场，企业苦乐不均，不能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公平竞争。在这情况下，要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经营者，就发明了承包制度，给每个企业规定一个起跑点（承包基数），要它们“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收多留、欠收自补”。承包制虽然能够鼓励企业自主经营的积极性，但很容易引起短期行为，为了超额完成承包基数，在承包期内不愿意投资进行技术革新，甚至把正常的设备更新也推迟了，使设备老化，这是很不利于促进企业的现代化的。目前大家已经认识承包制缺点，提出要“完善”承包制。我认为不创造条件使竞争逐渐规范化，企业改革是找不到出路的。当然，我们的企业改革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就不再多谈。

第二，财政税收体制改革。

现在除物价仍在反向调节外，财政税收也在反向调节。税收是调节产业结构，引导各行业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

但在 1980 年实行“分灶吃饭”，地方政府是收税入，它们所属的地方企业是纳税入，这样就把关系完全搞乱。对烟、酒之类的产品征收重税本来是为限制生产，但因生产愈多地方财政收入愈大，反而变成鼓励生产，一时间使小烟厂、小酒厂遍地开花。1983 年实行“利改税”，想要恢复税收对产品结构、产业结构的调节作用，但因当时物价尚未理顺，企业苦乐不均，在产品税和所得税外再实行调节税，以致鞭打快牛，企业怨声四起。1987 年又改行财政逐级大包干体制，使“分灶吃饭”的弊端更加制度化。在这种体制下，各地竞办小加工厂，垄断本地原料，多方争夺能源、外汇等投入品、许多本地企业用高级原料生产低级产品，使效率高的外地企业反因缺乏原料而被迫减产。如果本地企业的产品质次价高，难于同质高价低的产品竞争，主管政府往往运用行政权力，限制外地产品进入，或者指令所属商业部门收购本地产品，用搭配等办法强行推销。在这种情况下，各级政府都画地为牢，把统一的国内市场分割成几百、几千小块，被人们叫做“诸侯经济”。此外，几个大行业的部门包干体制，也促使部门保护主义强化。

市场疲软，本来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大好时机。但由于目前为了社会安定，害怕企业破产、工人失业，加以地方保护主义，使优胜劣汰的自然筛选根本无从进行。这也是当前经济结构难于优化的一项重要原因。

下放财权，实行分级财政，本意是刺激地方和部门增收减支的积极性，“分灶吃饭”和财政包干确也有这方面的作用，但因这种体制按企业的行政隶属关系征交收入，多照顾地方和部门收入的增长而少照顾国民经济整体效益的提高，

从而不能同国家财政总收入的增加恰当地联系起来，相反形成了地方、部门、中央在有限收入总额中争份额，你多我少、你少我多的格局。近年来一种叫做“藏富于企业”，即先减税让利、然后用摊派等手段回到自己手里的做法广为流行，侵蚀了中央财政收入。加之在物价大幅度上升时期，即使“递增包干”，只要上交的递增率小于物价上升率，中央的实际财政收入也是逐年明增暗减。现在国家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已从 1978 年的 35% 下降到 20% 以下，中央的财政收入在整个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也大大缩小。针对这种情况，领导部门赞成实行拟议已久的“分税制”，即按税收性质划分各级财政收入来源。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实行“分税制”的意义，不在于“收权”和使中央在有限的“蛋糕”上多切一块，而是通过理顺财政关系，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益，“把蛋糕做大”，然后才有可能在保证地方和部门有足够财力支持其功能发挥的条件下，增大中央财政收入。在实行分税制时，中央所要集中的，是总量调节权，至于处理具体开支项目的权力，不是要收，而是要在明确规则的前提下放手让地方去行使。

第三，金融改革。

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是最重要的宏观调节杠杆，我们还没有学会利用这个经济杠杆。1984 年～1988 年在需求过旺时没有坚持管住货币，一再大幅度放松银根，企图以此来保持生产的超高速增长，结果通货膨胀严重到提存抢购，不得不进行急刹车。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必须管住货币，放开物价，这是客观规律。只要实行商品经济，违反了它就不能不受到惩罚。我国在战争年代就认识了货币发行与物价上

涨的相互关系，建国初期和 60 年代初期都曾用紧缩银根的办法来创造稳定物价的奇迹，希望今后要牢记这个历史经验。

明确了管住货币的方针，还有个贯彻执行的问题。货币发行权必须集中于中央，由中央银行运用各种手段确保货币政策目标得以实现。各级专业银行必须按照国家的产业政策和企业的经济效益来慎重选择投资和贷款对象，不应当放任地方政府和各级业务部门任意干预。我国银行现在还没有健全的金融管理制度，仍沿用行政按层次分配贷款指标的办法。这一方面使“钱到地头死”，资金无法流动，另一方面又使货币总量难于有效控制。近年来在指令性的财政拨款大大缩减以后，地方政府和各级业务部门又向银行下达指向性的贷款任务。这比指令性财政拨款后患更大。指令性财政拨款是经过计委综合平衡的，而指向性的银行贷款没有经过任何机关综合平衡，只是根据局部利益决定。银行贷款应向经济效益高的方向投放，而指向性的贷款常常是各行其是，不考虑产业结构和投资效益。在调整产业结构过程中，如果不能加强中央银行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权威，不能让专业银行以产业政策和投资效益的高低作为决定贷与不贷、贷多贷少的业务准绳，是决不能根治投资效益太低这个顽症的。

专业银行的信贷政策，也应有利于充分运用竞争的力量，改善经济结构和企业经营。在执行稳定的货币供应政策的前提下，存贷利率应尽可能反映供求关系，当然亦应利用我国人民较高的储蓄倾向，减少筹资成本。差别利率不宜滥用。对于投资大、回收慢的特殊行业，宜于设立特别的政策性融资机制加以扶植。

目前许多领导同志已经认识到了把工作重点放到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结构问题和效率问题的必要性，但是目前还下不了迈出较大步子的决心。据我观察，下不了决心的主要顾虑是两个，一个是政治方面的，另一个是实际工作方面的。

从政治方面说，有人顾虑这样的改革是不是符合社会主义的方向。我们在政治经济学教育中，讲过多年商品经济意味着生产无政府状态，似乎强化市场价格的调节就会损害经济的计划性。这其实是一种完全过时了的观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决议，早已明确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同时也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就是说，我们要在合理的价格机制的基础上，主要运用财政、信贷等经济杠杆，代替大部分指令性计划，保证国民经济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现在国民经济出现混乱，并不是因为市场机制的作用发挥得太多，而是在指令性计划大大缩小了的条件下，依托市场、运用经济杠杆的指导性（诱导性）计划并未建立起来的缘故，才造成了目前计划失控、比例失调的紊乱，超过我们认为“无计划”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事实上，像现在这样经济效率低下和经济结构混乱的状况，在西方国家也是罕见的。我希望中央重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反复阐明过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方向，大胆推进改革。

从实际工作方面说，人们顾虑利用市场力量进行结构调整，会造成失业人数增加。弄得不好，有可能超过人民的承受能力，引起社会动乱。我认为这个问题应当从两个方面看。

首先，目前企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所发生的困难，都是不按商品经济的规律办事，保留“大锅饭”、“铁饭碗”制度造成的。为了摆脱困境，虽然必须小心谨慎，力保社会震动

不超出群众能承受的限度，但不大胆推行改革，彻底打破“大锅饭”、“铁饭碗”是不行的。几年来逐步推行“合同工制”，本来应当有解雇的自由，但因号召企业自己“消化”，实际上解雇极为困难。过去几年提倡公平竞争，并颁布了破产法，但除裁减了几万个皮包公司（职工多系机关干部）外，破产企业寥若晨星，即使有破产，破产后主管机关仍要盈利企业加以“兼并”，把包袱重新背起。这些作法是延续“大锅饭”、“铁饭碗”制，极不利于鼓励竞争，提高经济效益。从局部看，从地区看，从短期看，好像是为保护社会安定，但由于造成的后果，必将引起经济危机，甚至可能破坏政治安定。所以，我们应当痛下决心深化改革，摆脱这种困境。现在怕冒小风险，将来必将面临更大的风险。

其次，在我看来，我国人民对失业是有一定承受能力的，对党的经济政策是能够理解和支持的。建国以来，由于人多地少，农村一直存在大量隐蔽性失业人口。3年“大跃进”中2500万农民进城做工，1961-1962两年他们被裁减返回家乡参加农业生产。这些被裁减的人两手空空，只能依靠家庭，原来4个人的饭5个人吃，并没有一个地方“闹事”，这真是难以想象的奇迹。现在农村情况较那时大有好转，农民的储蓄和底财有了增加。去年以来由于压缩基建规模，已经有乡村建筑队几百万人返回农村。他们通过几年辛勤劳动，很多人有上万元银行存款，生活并不困难，所以并未叫苦。乡镇企业自负盈亏，价格涨落也自己掌握，有的还建立了一套乡镇社会保险制度，所以遇到今年的困难，比较容易承受。在城市，情况要艰难一些。应该加速建立健全社会保险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近几年许多企业已经建立合同工制，这些

合同工依法可以解雇，酌给补助。目前有些城市已将企业的部分福利基金交给地方统一管理。有些城市已建立人才交流中心，介绍待业人员就业。应当进一步健全这些制度，以减少解雇多余职工或企业宣告破产所造成的困难。

总之，在当前的条件下，要在改革上迈出决定性的步子无疑会遇到一些困难和障碍。但是只要我们采取适当的措施，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是可以把社会震动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以内的。而且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拖下去只会加深矛盾，促成严重危机的爆发，只有痛下决心，动员全党全民的力量来克服困难，才能摆脱困境，走向繁荣，除此而外是别无选择的。

以上所说，是长远目标，有些措施只能分步前进，但必须方向明确，不能安于现状，更不能知难而退。我的信已写得太长，但事关国家前途，不得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万望见谅。

薛暮桥

1990年9月

《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对话》
丛书编委会

编委会名单

总顾问 李成勋 吴易风 黄允成

总策划 韩天雨 毛增余

主编 毛增余

第六辑主访人员：杨献东

序言——

（一）

2003年7月是我国老一辈著名学者杜润生先生的九十华诞，虽然杜老先生不算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但他却是一位老资格的经济工作者、科学规划者、杰出的理论家，更可贵的是，早在青少年就读师范学校时，他就从事革命活动，是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组织领导者之一。

在之后的抗日宣传到1942年的整风运动中，党组织对他作出了肯定的评价，认为杜润生“领导能力强，思想敏锐突出，有理论素养”。

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中央中南局秘书长兼土改委副主任，在领导土改的运动中，他提出了分阶段进行土改的主张，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1951年2月，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中央的批语中指出：“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土改的正确秩序，本来应当如此。”

但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在1956年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辩论中，杜润生由于赞同邓子恢的稳步前进的主张，而受到批判。更可怕的是，在后来的“文革”中，他惨遭陈伯达之流的迫害，成为中国科学院里第一个被打倒的人。

值得一提的是，杜先生在1956年调任中科院秘书长后，参与了我国科技12年发展规划的制定工作，并且在1961年主持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工作的14条意见》的起草工

作，当年 7 月经中央批准，在全国试行《科研 14 条》，正确坚持了对待知识分子的“双百”方针，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所以在科学界和知识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被誉为“科学宪法”。

曾经有人问过杜润生，在中科院的十年里，最大的成就是什么？他回答是破除了迷信，活跃了理论思维，促使中华民族早日站在世界的前沿！

对于上述几件大事，杜老先生都清楚地记录在他的文集中，他认为记住往事，无非为了一个目的：借鉴历史，以明察未来。

1983 年杜润生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主要负责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政策研究，他为倡导和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做了大量工作，为深化农村经济改革，重建农业经营主体，推进农村经济的市场化进程，从理论和实践上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还是小城镇要战略性发展的构思和倡导者之一。

杜润生一贯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使得他一直保持着深入调查研究的好习惯，即使在年近九旬时他仍亲自下农村实地调查。人们称他是个老当益壮、壮志不已的人。

（二）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谷书堂教授奉行理论与客观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始终坚持深入探索、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并主张积极吸取西方经济理论中科学适用的内容和方法。他长期致力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在商品

经济、价值理论、分配理论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等方面有许多理论建树，颇具学术影响。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他就提出了“把物质利益原则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根本经营原则”的观点。50年代末在“大跃进”中强调价值规律的作用；60年代初期支持生产价格论；在改革开放初期，他较早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概念；他早在1987年就提出“按要素贡献分配”的观点，并始终同意“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这些具有超前性的学术思想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建立、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谷书堂教授的另一个重要学术贡献就是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方法、结构的研究和理论体系的重建。他在这方面有不少文章和著作。

“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风声。”近十几年来，中国经济学界成长起来的一批年轻人包括校外的研究生都请谷书堂教授为他们的著作写序。而谷先生对所有的著作评价公允客观，实事求是指出其不足，对年轻学者的点滴成就，他都备感欣慰和高兴，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年轻人的提携之情。

所以在庆贺他执教50周年的座谈会上，许多学生都汇聚在一起，表达了对导师谷教授的感激和崇敬之情。谷先生那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献身教育的精神、宽厚坦荡、处事公允的品质已成为年轻一代的楷模。

正可谓“大鹏出海犹未湿，骏马辞天气正豪”。

（三）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朱绍文教授早年留学日本长达12年，凭自己的勤奋学习打下了扎实的学术功底，改革开放

后，又数次赴日本学习考察，参加研讨会，他不仅是中国研究日本经济问题的资深专家，而且对西方经济学也非常熟悉，对亚当·斯密、李斯特和马克思等名家的理论也颇有研究，更难能可贵的是朱教授据理批驳萨缪尔森等人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歪曲和攻击，捍卫马克思经济学。

同时，他也把日本引进西方经济学的成功经验和“泡沫经济”破灭的惨痛教训介绍给国人，以引起关注，这对当今中国来说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

这位 89 岁高龄的老先生经常这样嘱咐后辈年轻学者：“一个人要想成名并不太难，但如要学有所成，就必须耐得住寂寞，甘坐冷板凳，应把名家经典著作作反复阅读了 3~5 篇，以真正、全面地掌握其内涵，再加以分析运用。”

（四）

林少宫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数理统计学家和计量经济学家，担任中国现场统计研究会名誉理事长和中国数量经济学会顾问，现为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顾问、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并兼任数量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在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林少宫教授不仅在理论研究上造诣深厚，出版学术著作近 20 部、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而且在统计理论的实际应用方面推广了正交实验设计，为国家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同时还“得天下之英才而育之”，培养了数十名优秀的研究生，其中田国强、谭国富、艾春荣、徐滇庆等都已成为知名经济学家，并在国际学术界崭露头角。由于他在理论、方法、应用和教学各方面所取得的杰出成就，其事迹先后被收入《世界（教育界）名人录》、《中国世纪专家传略》等传

记丛书。

林老于 1922 年 12 月出生于北京，1944 年毕业于重庆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经济系，并于 1947 年赴美留学。他先就读于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后来于 1952 年在伊利诺伊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随后到俄亥俄州地顿大学任讲师，讲授统计学、经济学原理和美国经济史。在伊利诺伊大学读书期间，在两度同窗好友（重庆中央大学和伊利诺伊大学）杜度（北京大学教授）的指引下，结识了尔后的诺贝尔奖得主 F. 莫迪利亚尼（F. Modigliani）和经济学大师 L. 赫维茨（L. Hurwicz）。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莫迪利亚尼最近还在一本书的前言中，回忆他们当时许多“有趣的共同经历”；赫维茨为了他们之间“近半个世纪的亲密友情”（赫维茨语）而在 2000 年来华中科技大学进行第三次访问，参加了数量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成立典礼。作为伊利诺伊大学的学生，他得到了他的博士论文导师的如下评价：“相对其后来所处的环境而言，他是伊利诺伊大学的一位杰出学生”，“精明而又求知心切”。

（五）

2002 年 6 月的一天，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在给茅于軾的一封信中说道：“我对你在贫困山区创办小额贷款的项目深感兴趣，……我已叫世行在京的机构与您一起探讨，如何沿着你的经验进一步开展合作……”许多人和沃尔芬森一样，是通过农村扶贫的事了解茅于軾的，并赞赏他的慈善仁爱。确实，茅老师以扎实深入的扶贫活动（还包括在北京开办保姆免费培训学校），实践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和社会责任。与现

今不少热衷于商业活动的学者相比，茅于軾不愧为是“三个代表”的忠诚实践者。

他出身名门之家，早年受教于著名的南开中学，打下了良好的人生基础，但在中青年时期，他又经历了很多磨难、曲折和坎坷的人生，但他坚强的意志始终没有消沉过。

茅于軾认为经济学基本上是自己悟出来的，他虽然没有经济学的学位，但他的经济学随笔出类拔萃。茅于軾对中国制度的了解，对自由市场的深知，对国民贫困的分析，对社会腐败根源的探究，对计划经济的解剖，对日常生活经济本质的揭示，对民富国强方案的建议，无不深刻、冷静、明晰、逻辑井然、深入浅出。

茅于軾说过，任何一种物质享受都容易达到饱和。但精神享受却没有极限，他认为处于精神享受高端的是“对真理的发现”，他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从不停步，甚至超越了经济学的领域。所以，有人称他为“中国经济学家中离真理最近的人”，“当代中国一个最值得尊敬的人”。在2002年底，茅于軾曾被评为《南方周末》年度人物之一。而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王建国把他称作“经济学界的鲁迅”。著名学者盛洪在庆贺他七十寿辰的文章中总结了她的“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认为“茅老师的所有这些贡献，都将融入我们的社会与文明，并将超越生命，与社会和文明一起永存”。

面对众人的称赞，茅于軾只是谦虚地说：“我是一个极普通的人，我犯过不少错误，至今还在后悔。我应该也写一本忏悔录，这需要勇气。我的勇气还不足，从这点就说明我是一个普通人。”

从数学规划，经过经济学，来到人权、道德和制度的研

究领域，茅于軾的思想跋涉刻画出一条独特而自然的轨迹，它连通了坚实严密的数理基石和高贵隽永的道义灯塔，不仅使照耀民主道路的思想火花更加闪亮，也铭刻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经世济民的耿耿情怀。茅于軾先生不愧为中国经济学界理性务实的旗帜！

（六）

提起薛暮桥老先生，现在年轻一代熟悉他的人恐怕为数不多，他是我国早期著名经济学家。可以说与著名的孙冶方先生齐名。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从解放前夕一直持续到现在，长达半个多世纪。其代表作《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被认为是对中国经济建设起到重大影响的经济学著作之一，发行量逾千万本！

早在 1955 年，他受中宣部委托，与孙冶方、于光远三人合写了新中国第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977 年初，处在理论创作激情状态的他找到了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胡耀邦同志，提出了想写一本《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的著作，得到了耀邦同志的极大关心和支持。

薛暮桥运用马列主义其原理，从实际国情出发，探讨了以往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研究了当时还没有解决的一系列重大经济问题。他认为首先要强调社会主义必须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因为它无所不在！

作为我国经济理论界的权威人士和政府高级官员，他不仅对城市的经济状况了如指掌，对农村的经济形式也是烂熟于心。所以此书第一版印的 5 万册，不到两个月就一抢而空！当时，日本的《经济新闻》曾发表说：“中国有一本书，跑遍

全北京都买不到！”就是指薛暮桥所著的这本书。后来人民出版社不断加印，到 1983 年时，总销量已近 1000 万册，且被译为英、法、德、日等多种文字出版。

薛老自己谦虚地认为只是“指出改革旧体制的必要性”，但是正是这本书在 70 年代末，发出了时代之先声，在理论上为经济政策“拨乱反正”发挥了积极作用并预示着经济改革时代的到来。

薛暮桥先生颇具先见性地认识到：我国虽然公有制占主体。但公有制具体的形式复杂化、多样化决定了经营方式必须多样化。不仅是因为不同所有制某些特点会互相渗透，而且还因为横向经济联合会日益发展，所以他早在 80 年代中期就说过“有一点资本主义也不用怕”，“所有制形式复杂一点是好事”。从他这两句话到“十五大”报告的出台，已有十多年时间，进一步证明了他老人家预见之高超。

薛老晚年最大的贡献是，在 1990 年的一次中央高层研讨会上，年已 87 岁高龄的他，与刘国光、吴敬琏教授一起，不受“左”的思想束缚和困扰，据理力争，最终为 1992 年秋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所以在 1994 年 10 月薛老“从事经济工作和经济理论研究六十周年座谈会”召开之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同志在百忙中还亲自登门祝贺。

在 1998 年 12 月纪念改革开放 20 周年之际，由众多权威专家学者评选出的“影响中国经济建设的十本书”，薛老的代表作《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名列榜首，而另一本当选的吴敬琏教授的《论竞争性市场体制》，其序言就是请薛老所写的。薛老与孙冶方、顾准一样，也是吴敬琏的学术思

想引路人之一。

另在与茅于軾、谷书堂教授及以前与刘国光等著名学者的访谈中，他们都或多或少地提到了薛老的为人和功绩。我们原来也非常想与薛老作简单的访谈，但非常遗憾，岁月不饶人，我们不忍心再去打扰百岁老人，“对话”就没有做。

征得薛老女儿薛小和女士的同意，特附上薛老的一篇代表作，以飨读者朋友（虽是十年前左右的文章，但今天看来仍是精辟之作）。承蒙小和女士的支持，我们再向读者奉上一篇她特为父亲百岁寿辰而作的短文，这对读者了解薛老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里，我们仅表达后辈学人对德高望重的老前辈薛暮桥先生的深深敬意！

编 者

2003 年 12 月